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路甬祥 (005)

用新思维新管理促进新经济发展

——对我国当前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张大卫 陈文玲 (014)

· 宏观经济 ·

推动创新设计实现新产业革命下跨越发展

王晓红 (022)

构建“四大地区”和“三大战略”协调互动新格局

高国力 (037)

“十三五”时期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路与任务

姜 江 韩 祺 (050)

· 国际经济 ·

2015 年度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

亚洲竞争力评估课题组 (064)

中国在全球治理与 G20 中的作用及影响

李罗莎 (081)

· 智库信息 ·

《透视中国》书序

林毅夫 刘遵义 樊 纲 (092)

创新经济理论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高端论坛暨陈文玲著作发布会综述 (100)

国计与民生——黄国雄教授追思会暨中国流通理论创新和

实践发展研讨会综述 洪 涛 (111)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0)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5)



CONTENTS

Wisdom Made in China and the creation of China *Lu Yongxiang* (005)

New thinking and new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y
Zhang Dawei and Chen Wenling (014)

Promoting innovation design and realizing the leap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ng Xiaohong* (022)

To construct the new coordination and interaction pattern of “four regions”
and “three strategies” *Gao Guoli* (037)

The ideas and tasks of China’ s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Jiang Jiang and Han Qi* (050)

Evaluation report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sian economies in 2015
Asian competitiveness assessment task group (064)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China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G20 *Li Luosha* (081)

Preface of “Perspective of China” *Lin Yifu , Liu Zunyi and Fan Gang* (092)

To Innovate economic theory and promote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100)

National planning and people’ s livelihood ——The Memorial Of Professor Huang Guoxiong
and a review on the Symposium o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ractice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 China *Hong Tao* (111)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20)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5)

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路甬祥

摘要：现代科技创新强国无一不是制造强国，实现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既是建设制造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必然要求。智能制造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加快推进中国智造将有力支持中国创造。加快推进中国创造须加强基础前沿研究，提升科技原创力，突破基础核心技术；提升创意创造和创新设计引领自主集成创新的能力；建设支撑中国创造的科技与产业创新体系；建设中国先进制造文化和信誉等。

关键词：科技强国 中国智造 中国创造

作者简介：路甬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支柱，是引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是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实现绿色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及源头，是提升科技与产业创新能力的主战场，也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产业基石。现代科技创新强国无一不是制造强国。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进军号。《中国制造 2025》明确提出，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成为具有全球引领影响力的制造强国的第一个十年战略规划和发展路线图——主攻方向是两化融合、智能制造；根本目标是实现“中

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因此，实现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是建设制造强国的必然要求。

一、智能制造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方向

（一）智能制造发展的历程

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以蒸汽机为动力、机械化为特征的机器制造。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了电气化、流水线、大批量制造时代。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计算机、数控机床、现场总线等技术将制造业推进到多品种、小批量、柔性制造（FMS）阶段。为适应市场需求快速变化和剧烈竞争环境，柔性制造需要具有更高的灵活性、敏捷性、精益性和智能性。1988 年美国人赖特（P. K. Wright）和伯恩（D. A. Bourne）出版了首部《制造智能》专著，其内涵目标是通过集成知识工程、制造软件、机器视觉和控制，实行无人干预的智能制造。1990 年，日本发起“智能制造系统（IMS）”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力图把日本的专业技术与欧盟的精密工程技术、美国的系统技术结合起来，开发可跨国合作的先进智能制造系统。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工业国家及地区加入了该项计划。当时的互联网尚处于发展初期，智能化还仅局限于单台、数台设备或在一个屋顶下的一条或数条制造生产线，但就此开启了智能制造的先河。

1988 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智能制造”研究，同年科技部将“智能模拟”列为国家科技规划重要课题，1993 年设立“智能制造系统关键技术”基金重大项目，2010 年“智能制造及装备”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领域。

进入 21 世纪以来，科技与产业创新日新月异，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创造了万物互联的信息物理环境（CPS），促进了全球知识信息资源的开源共创和近零成本分享，为重塑智能制造服务提供了新的技术环境和产业生态。生态环境友好材料、超级结构和功能材料、高端复合材料，以及 3D 打印等精准高效的增材减材工艺技术创新，为智能制造提供了新的物质和工艺技术基础。制造业正在形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个性化、定制式的智造服务的新形态。

（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积极推进智能制造

美国推出《工业互联网计划》，德国推进《工业 4.0》，日本发表《制造业白皮书》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法国发布《新工业法国》战略，韩国实施《制造业创新 3.0 战略》等等，这些战略规划的重点虽各有不同，但共同点是加大科技投入，提升科技与产业创新优势，适应知识网络环境，致力于发展以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能制造服

务，提升品质、效率和附加值，力图重振制造业竞争优势，重塑全球制造的新格局。可以肯定，21 世纪前半叶，工业制造文明将进化为网络协同智造文明，中国制造业发展转型正迎来与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制造服务转型交汇的新机遇、新挑战。

（三）网络协同是智能制造的新特征

网络协同智能制造是在数字化、网络化、知识化的基础上，依托市场用户、制造过程、社会文化等知识信息大数据，计算、模拟专家的知识逻辑、分析判断、推理决策等智能行为，并依靠嵌入传感与机器视觉、数字仿真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数控装备与机器人等，实现信息知识管理、产品设计、生产规划、加工装配、质量保障、物流管理、经营服务等全流程协同智能制造与服务。网络协同智造需要开放合作、协同共创、绿色低碳、分享共赢的理念，创建全球互联互通、公平自由、互利合作、安全法治的信息物理环境与经济法律环境。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协同智造已从局域终端编码智能发展到依托全球宽带、大数据和知识规则的终端/云端协同计算智能；从制造方主导转变为以用户和市场主导，由设计方、制造方、用户方乃至网络创客等协同共创、分享共赢的智造服务；将从制造过程的智能化拓展到设计制造、信息能源、经营服务等多领域跨界融合的智能；从单个生产线、单个企业的智能制造拓展到全球网络协同智能制造与服务。从而可实现真正意义的零库存、零次品、零故障、零差错，更高品质和效率的绿色低碳、精益制造，实现少人、无人的个性化、定制式大批量智造与服务，为用户创造最佳体验和新的价值，大幅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加快推进中国智造

（一）加快推进中国智能制造的必要性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近年来中国制造增加值全球占比已超过 20%，为国内外市场提供了大量高性价比商品和装备。载人航天、超级计算、北斗导航、海洋深钻、高铁核电等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制造大国。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制造仍大而不强。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质量效益，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基础核心技术支撑能力，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仍差距明显。据《世界经理人》《2015 中国制造业信息化现状调研》结果显示：中国近九成制造企业信息化处于初、中级水平，信息化覆盖业务较窄，而且各系统信息处于割裂状态，

集成度低。2015 年，中国制造业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率仅 1/3，大中型制造企业也刚超过 50%，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制造业数控化率已达 80%~90%。

数字化、信息化是实现智能制造的基础。《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目标是加快两化融合，主攻智能制造；到 2025 年，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从目前的 58% 提高到 84%，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从目前的 33% 提高到 64%；实现“两提升、三降低”目标，即生产效率、资源综合利用率大幅提升，研制周期大幅缩短，运营成本、产品不良率大幅下降。

第一，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可实现复杂零件的高品质制造。在航空航天、船舶车辆等行业，许多结构复杂、加工质量要求高的零部件，采用在线检测、工况实时智能控制，可显著提升制造品质和效率。今天，智能手机、超级本、智能电视、机器人等金属部件已大都采用智能生产线实行高品质、大批量制造。

第二，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可促进绿色制造。中国制造业能耗约占一次能耗的 63%，单位产品能耗高于国际水平 20%~30%，2/3 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工业。智能制造采用最佳工艺方案，能耗物耗和效率的智能优化，可实现材料节约循环利用、能源智能管理；将从源头促进绿色发展，支持实现 2025 年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 2015 年下降 34%，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40%。

第三，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可适应客户个性化、定制需求。可以按客户要求实现智能设计，依靠智能装备（智能生产线、机器人、3D 打印等）和软件实现大批量定制，缩短交货周期，大幅提升企业的赢利和竞争能力。例如：青岛红领集团运用数字化、人体和版型大数据、智能信息物流等技术，实现客户个性化精准定制，生产周期缩短至 7 天，定制业务年均收入和利润增长均超 150%，成为服装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成功案例。

第四，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可促进向智能服务型制造转型。依托智造知识、信息和网络带动促进设计研发、咨询管理、网络监控、数据分析、软件计算等服务创新，向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拓展，提升制造产业链的整体价值，促进转型升级。例如：通用电气（GE）利用嵌入传感和网络实现发动机状态在线监控，发展了“GE 航空发动机健康保障系统”，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不但为航空公司创造了价值，还大幅提升了 GE 航空发动机的设计制造和服务能力。1991—2009 年，通过实行“按小时支付”等商业模式，航空发动机业务年收入从 69 亿美元猛增到 187 亿美元，服务收入占 60% 以上。

第五，加快推进智能制造，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统计，2015 年中国制造业人均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 1/12、日本的 1/6、德国的 1/5，差距和提升空间巨大。通过推进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数字制

造+互联网、智能制造+云平台/云服务等，将有力地支持实现“十三五”期间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7.5%左右，“十四五”期间增速6.5%左右。将在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环境下，有效应对发达国家依靠智能制造重塑竞争优势和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制造的双重挑战。例如：海尔集团创建了1+7智慧平台，实现智能家电的客户个性化定制与服务，仅以其旗下的沈阳冰箱厂为例，单线产能提高80%，用工减少60%，库存减少80%，质量提高30%，为企业和用户创造了新的价值，成为中国家电智造的先行者。

（二）加快推进智能制造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第一，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深化改革，政府引导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中国制造2025》已对中国未来十年智能制造发展，提出了明确战略目标、基础核心技术、重点产业领域、相应的政策举措和发展路线图。地方政府应根据《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放眼国内外市场全局，做好本地区智能制造发展规划，选准重点领域，支持创新突破，形成特色优势；同时，要防止跟风趋同、盲目发展，造成新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完善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法规环境。构建网络互联互通、数据共创分享、智慧物流、云服务等产业生态。为企业并购境外智造企业、“一带一路”合作共赢、跨国经营提供更好的信息法律咨询与服务。应当加大对智能制造基础共性技术的支持力度，提升对完善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制造业云平台、电商物流、质量与标准、网络信息安全等的支持、服务及保障水平。支持先进制造企业创新发展面向智能产品、面向制造过程与装备、面向经营服务过程的智能技术，攻克基础核心技术。提升设计研发和集成创新能力，创造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智造服务业态。引导扶持智能制造产业健康发展，培育良好的智能制造创新链、产业链，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智能制造企业集聚发展的示范区。充分发挥先进智造企业和智能制造示范区的带动作用。认知产业发展规律，总结成功经验，分析国外案例，传播推介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好案例、好经验，加快推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整体跨越。

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吸引培养数量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适应智能制造发展需要的设计研发、制造工程、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虚拟现实/人工智能（VR/AI）、计算服务等工程技术、经营管理和应用技能人材，加强以提升岗位职业素养和技能为目标的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

第三，必须发挥信息网络优势。发展众创众筹，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拓展智能制造创新基础和活力。

第四，必须培育先进智造文化和优良的产业生态。降低制造企业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

三、加快向中国创造转变

智能制造将有力地支持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提升全球竞争力以及绿色化、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将有力地支持中国创造。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中国制造实现由跟踪模仿向并跑—超越—引领转变，由产业链、价值链低中端向中高端跨越，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其核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

《中国制造 2025》提出：到 2025 年，制造业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两化融合迈上新台阶。在全球产业和价值链中地位明显提升。到 2035 年，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中等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到 2050 年，综合实力居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实现中国创造。

（一）创造国家引领世界

18 世纪，英国因为发明创造了蒸汽机、纺织机、机床、火车、轮船、钢铁冶金技术等，崛起为工业强国，成为机械制造的引领者。19 世纪，德国、美国因为发明创造了内燃机、汽车、飞机、电机电器、电力系统、制造流水线、高分子合成材料等，引领了以电气化、流水线为特征的制造业变革。20 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因发明创造了半导体、计算机、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等，引领了向柔性制造方式转变。中国在载人航天、北斗导航、高铁、核电等领域，依靠自主创新、开放合作、举国协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集成创新，成功进入全球先进行列。

（二）创新企业引领市场

波音、空客依靠美国和欧洲的先进材料、航空发动机、航空电子等基础核心技术和基于知识的飞机创新设计制造能力，主宰垄断全球大型客机市场近半个世纪。比尔·盖茨领导微软公司创造开发了用户友好的操作系统、办公软件和浏览器，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PC）软件服务商，引领推动了 PC 制造产业的发展。华为公司确立全球战略目标，坚持高强度研发投入，自主研发新核心芯片、先进算法与软件，自主设计研发面向客户需求的整体解决方案，并依靠独特的企业文化和强大的创新执行能力，成为

领先全球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系统供应商，成为中国创造的典范。深圳大疆公司依靠突破摄像平台稳定技术、飞控软件、创新设计制造和网络销售服务等快速崛起，赢得了全球消费类无人机市场的 70%。历史证明，只有创新创造的企业和国家，才能赢得未来竞争优势，主导市场竞争格局，赢得超额利润和价值，成为产业的引领者。

（三）加快推进中国创造的几点建议

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失去了前几次制造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大国，已确立了建设制造强国目标，必须抓住制造业变革的新机遇，在主攻智能制造的同时，加快推进向中国创造转变。

第一，必须加强基础前沿研究，提升科技原创能力，突破基础核心技术。基础核心技术缺失、科学知识创新与前沿技术创新储备薄弱，是制约中国制造技术与产业自主创新的瓶颈和基础。必须加强对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的投入，着力支持信息、材料、微纳、生物、能源等前沿科技的研究，为高端制造原创提供知识与技术支持。必须发挥中国工业网络和大数据优势，应对知识网络时代产业创新的挑战，在网络、数据和信息安全等领域加大前瞻部署，力争在网络结构、数据算法、安全理论与技术等方面取得原创突破。为适应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及交叉融合创新，应积极支持物质生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人文心理、哲学伦理等跨界交叉融合研究，为技术、管理与业态创新储备新知识、孕育新创意、凝聚新团队。应支持以制造业创新前沿问题和战略方向为导向的定向先导研究，为中国创造发展储备前沿知识基础和战略技术。

第二，必须着力提升创意创造和创新设计能力。中国制造业走过了一条跟踪模仿，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跟跑并跑，快速发展的成功之路。但也带来了创意创造的自信心不足和创新设计的意识与能力薄弱，设计理论和方法、设计工具和仿真软件多依赖进口，缺乏自主创新引领世界的设计创造。任何创新创造必须先有创意和设计，创意设想常常是自主原创的起点，创新设计往往决定了制造的价值、竞争力和绿色化水平。创新设计可集成引领制造服务的系统创新，可以创造新的应用需求，甚至改变市场格局。创新设计是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环节。乔布斯领导苹果公司推出的智能移动终端系列产品，正是依靠创意创新设计，集成芯片、软件、全球先进材料与制造工艺，引领了智能移动终端产业，创造了全新的市场需求，赢得同行业 70% 的利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着力提升创意创造和创新设计能力，创造引领世界的产品和平台、工艺技术和装备、经营服务新业态。

第三，必须造就一批受世界尊敬的跨国制造企业、一大批世界“隐形冠军”和全球

著名制造服务品牌。中国创造需要一批在先进材料、清洁能源、信息网络、高端制造、航空航天、海洋工程与船舶、新能源汽车与轨道交通、农业环保与工程机械、医药与大健康、消费电子、文化创意、国防军工等重要战略领域，创新赢利能力、引领全球同行的高端制造支柱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制造业创新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协同共创，需要先进的产业创新生态，需要着力培育先进材料、专用工艺与工具、高端元器件、应用软件等领域从事专精特新产品和服务的一大批世界“隐形冠军”。还需要支持培育引领世界、服务全球制造的智慧网络、智慧物流、智慧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平台和软件企业。需要培育造就一大批全球著名、受用户信赖与尊敬的制造服务品牌。

第四，必须建设支持中国创造的科技与产业创新体系。中国大中型制造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到 1%；创新资源重复、分散、浪费现象严重，创新链“分割、断裂”；科技创新对制造业的支撑不足，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接力，科技成果转化不足 10%；有效运用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提升市场竞争的能力薄弱等等。加快向中国创造转变，必须激励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制造服务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用紧密协同的创新体系，依照创新制造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整合集成创新资源，完善规范灵活的利益分享机制，从体制机制上提升协同创新能力。着力构建面向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大数据、云平台，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基础、共性、前沿技术支持与数据信息服务。小微企业是创新创造的重要来源。应完善支持小微制造企业创新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优化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重点和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吸引社会资本，设立国家中小制造企业创新发展基金。

第五，必须改革创新工程与职业教育体系。实现中国创造，创新创业人才是关键，立德树人是根本。培育爱国敬业精神，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增强诚信合作、共创分享意识，培育创新创业的自信心、想象力和创造力，比传授知识和教授经营策略更重要。实现中国创造，不仅需要富于创新创业精神的领军人才，还需要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勤奋敬业、创新开拓的软硬件工程师，金融财会、律师中介、数据分析计算、经营管理人才，也需要数以千万计经受良好职业教育，接受职业岗位培训、继续教育，不断更新知识技能、技术精湛的技师和技术工人。必须认知科技、制造技术和产业创新的规律与方法，积极跨界拓展融合知识技能基础，全社会协同培育，倡导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创新与创业精神。

第六，必须建设中国先进制造文化和信誉。制造服务作为人类的一项重要社会产业创新实践活动，需要遵循伦理法律和先进理念的指引。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人民

生存发展、创新创业的平等权利，是科技与产业创新的伦理基础。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尊重创业，始终是激励科技与产业创新的先进社会文化。共创分享全球知识信息资源，市场公平自由有序竞争，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公共和私人财产权，始终是激励科技与产业创新最重要的基石。守法、诚信、唯实、求真，依然是知识网络时代 CPS 环境中，科技与产业创新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是对科学创新发展、开放合作、共赢共享、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概括，在向中国创造转变进程中应自觉遵循、全面贯彻。制造文化反映一个国家制造业的特质和价值取向。在两百余年工业化竞争合作、创新发展历史进程中，各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造文化。如美国制造文化追求创新引领，德国制造文化的标志是质量诚信，日本制造文化是精致实用，法国、意大利的设计制造展现艺术时尚等。21 世纪前半叶，人类社会将发展进化为知识网络文明时代，“绿色低碳、网络智能、融合创新、共创分享”成为制造技术与产业创新的新特征。面向用户的定制式、大批量网络协同智造服务将成为新业态，将更重视为用户和社会创造更好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人文艺术综合价值。我们应当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贯彻发展新理念与借鉴吸纳各国多样优秀的制造文化结合起来，培育建设创新创造、精益求精、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开放合作、共创共赢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要求、受世界尊重的中国先进制造文化和信誉。

责任编辑：艾 冰

用新思维新管理促进新经济发展

——对当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张大卫 陈文玲

摘要：当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已形成流通领域的新业态，并将逐渐发展为“E 国际贸易”方式，成为在国际贸易中掌握主动权的重要领域。如何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以适应和推动新业态发展，是在互联网+新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中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政策运筹能力的新挑战。为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有序发展，建议有关部门加强调查研究，制定出更为超前的带有引导新业态发展、抢占全球高点的措施，以支持和引导跨境电商地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思维 新管理 新经济 跨境电子商务 E 国际贸易

作者简介：张大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局长。

对我国迅速发展的跨境电子商务怎么看？怎么办？怎么管理？能否抓住跨境电子商务即将形成 E 国际贸易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抢占我国在国际化现代流通的主导权或规则制定的主动权，是关系到在更为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我国能否通过提高现代流通能力塑造核心竞争力的重大问题。对跨境电子商务和 E 国际贸易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经济学界和部分企业尚有不同看法，争议较大。到底是用旧的思维、旧的管理方式和旧的运行流程来适应新事物，还是以新思维和创新发展的理念适应和引领时代潮流、支持和促进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这是新形势下对现代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应该顺势利导推动加快发展，同时解决新经济成长中遇到的困难，这不仅是管理方法问题，还是重大的战略选择问题。

一、最近出台关于电子商务的政策， 是用传统思维和传统管理方式管理新经济与新业态

2016年初，有关部门出台了将于2016年4月8日实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的新政策（以下简称“新政策”）。制定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正式确定跨境电子商务的行业地位、理顺业务流程、规范税收征管，使跨境电子商务这一新商业模式和由此产生的新业态持续健康发展。对这一政策，广大跨境电商和几个先期开展试点的城市本是热切期盼的。但由于政策制订仓促，一些政策设计和具体措施背离了市场客观情况和试点工作实践，相关配套政策没有跟上甚至严重脱节，实施结果却与愿望大相径庭，使正在积极开展试点工作和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商产业链受到重大冲击。

出台新政策实施的当天，郑州、宁波、杭州、广州、深圳等五个试点城市现场货物入区单量为零，区内库存的97%无法继续销售。一周后的4月15日，虽经有关方面协调，采取了临时过渡政策，但业务量及入区货量仍比之前下降了50%以上，区内企业销售库存提价率达20%左右。区内企业开始陆续裁员，有些据称裁员达80%。与此同时，跨境电商不得不紧急布局海外仓，香港、首尔、越南等地海外仓价格上涨50%以上，需求面积增加300%，海外邮快递价格上涨30%以上。

随着各地保税区内库存及在途入区货物基本售罄，新签约货物又无法提供按照新政策通关所要求的各种许可单证，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随时可能出现“熔断”现象。如此，跨境电商累计投资几百亿元和辛苦创业创新的成果将遭受重大损失，数以十万计的年轻人将失去工作岗位。

其后，郑、宁、杭、广、深等城市试点管理平台和聚美优品、京东、天猫国际、网易、蜜芽、唯品会、小红书、贝贝网等跨境电商企业，就市场真实情况及导致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与各部委反复沟通，商务部、财政部等部委也确定了对新政策延缓一年执行的缓冲期，但由于新政策设立的本质还是将跨境电商按照传统业态方式进行管理，使这一新兴业态因缺乏安全感和乐观的市场预期，失去了快速发展的势头。

跨境电子商务向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发展，具有很强的创新发展意义。从实践上看，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一定會在吸引消费回流、扩大产品出口、培育加工贸易新产业链、创造国际贸易新规则上有所作为，成为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经济”的有生力量。但若新政策不进行大的调整，一年缓冲期之后仍在现有政策上修修补补，跨境电商及相关行业发展前景令人堪忧。

二、在新政策出台前， 跨境电商先期试点城市正陆续进入早期收获阶段， 郑州、杭州等试点取得了成熟、成套、成型的经验和做法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和跨境旅游人数的大幅增加，我国游客在境外购物消费的规模越来越大，加之互联网技术催生的网上跨境购物，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消费外溢现象。消费者购买的国外商品或由行李携带，或由“海淘代购”包裹邮寄，或由边境以蚂蚁搬家式的走私进入境内。国际网购的商品通过国际邮路进口，邮局按重量收费，但无法按额度收税，虽设了 10% 的行邮税，但海关面对数以亿计的包裹难以一一查验，行邮税只能征收到 0.1%。这些灰色清关行为冲击了合法合规的贸易秩序。

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大量中等收入水平人口增加后，国内生产商品的质量、性能、款式不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其次是我们的贸易方式、贸易政策和政府监管制度均滞后于形势的变化。面对这种情况，国家没有采取简单的“堵”的方式，而是冷静分析原因，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在制度和管理创新上下功夫，通过不断改善和调整国内供给侧结构，吸引消费回流。自 2012 年起，国家有关部门指导郑州、杭州、上海、宁波、重庆等城市先期开展了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工作。海关、商检与郑州等试点平台通力合作，创造的保税备货模式成效最为显著。2015 年底，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组织了各试点单位的验收，验收专家组对试点工作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认为这一模式可示范、可复制、可推广。

以郑州为例，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郑州市和河南省有关部门、中央驻豫口岸单位积极探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特别值得肯定之处：一是由政府和社会资本以 PPP 模式（公私合营模式）合作，搭建了“三合一”“秒通关”自动化查验和信息登录平台，实现了海关、商检运营平台的联网监管和便利化通关。二是在保税区内，国内大量知名电商汇集，将部分邮包业务转过来，带动了仓储分拨、物流配送、交易展示、支付结算、教育培训、配套加工等的蓬勃发展，拉动了数万人创业就业和新业态的成长。三是经济效益明显，郑州去年的业务量达到 5110 万单，进出口额达 40 亿元，关税（行邮税）收入达到 1.2 亿元（因有大量小额免征物品，综合征收率为 3%）；平台及物流企业营业收入 10 亿元，地税收入也达到 1.2 亿元。根据海关监测，在品种结构搭配合理的情况下，关税征收率达到 9% 以上，最高时达到 12.8%，基本上堵住了灰色渠道的漏洞。四是创造了有效的监管方式，采取事前备案、事中监管、事后追溯、区内经营企业承担第一责任的办法，解决了质量风险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全国在保税备货条件下，商

品的品类及制造、采购、运输和分拨后的消费者信息备案清晰，跨境电商 2015 年进口零售无一起事故发生，而邮快递渠道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五是汇集了海量的大数据，为下一步数据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交易打下了基础。我国是全球货物第一出口大国，利用跨境电子商务 B2C（企业对个人）模式扩大出口，形成建立在消费者市场集成基础上的贸易流量，既可以突破目前一些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又能通过下一代贸易方式发展形成的先发优势，合理占有大量的海外消费信息，洞察数亿人的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为我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一轮产业变革中促进制造业升级，开辟巨大的新资源金矿。

对杭州、郑州等跨境电商试点，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5 月 10 日在郑州视察时，鼓励郑州跨境电子商务不断探索，真正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李克强总理也在视察中对郑州模式和区内创新创业企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海关、商检与地方政府合作，创建“三合一”单一查验窗口、实现“秒通关”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称其“是制度的高地，而不是政策的洼地”，要求有关方面加强调研服务，不断总结创新经验支持跨境电商发展。张德江委员长要求，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应在倒逼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上下功夫。近年来，国务院还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央领导的指示和国家的支持，为全国跨境电商加快发展提供了动力。中办、国办也多次跟踪督导，以推动中央领导的工作部署。

在新政策出台前，跨境电子商务先期试点城市正陆续进入早期收获阶段：

1. 呈现出境内外投资迅速增加新局面。进口产品海外仓内迁，日韩澳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加工生产线商向我国转移的势头良好。持续下去，除境外投资增加外，也必然会带动我国产品标准和质量的提升及相关产业发展。

2. 由进口模式复制的出口模式已陆续打通流程。B2B 模式（企业对企业）下我国产品遭受严重的贸易壁垒，但在万国邮联物流渠道下，我国产品可以顺利进入境外消费市场。我国如能解决好邮政物流的国际运输价格、主要目的国终端配送能力、加快退税时效及完善出口环节金融服务等问题，势必会强有力地推动出口规模的扩大和物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如：郑州试点平台正尝试在海外设置保税仓开展试点出口模式，已得到俄罗斯及欧洲部分国家的高度认可。一些电商和国内大型快递物流商开始布局海外终端配送物流网络，以打破 UPS、Fedex 等国际快递物流巨头的垄断地位，推动在国内形成类似于孟菲斯、路易斯维尔的航空物流枢纽。

3. 带动了内陆口岸经济的发展。新的布局正在中西部一些试点城市周边展开。仍以郑州为例，由于跨境电子商务试点模式的推进，在保税区内集聚了国内外 1008 家各类电商和物流企业，以 B2C 为主要出口特征的玩具、电子产品、发制品、服装等产业集聚

发展，提高了内陆地区对接国际市场的能力，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国际加工贸易订单。如郑州已开始执行每年向阿联酋市场供应 500 亿美元熟食品，向俄罗斯供应 1200 万吨水果、蔬菜、食品的计划。这些订单既有 B2B 的，也有 B2C 的，B2B 与 B2C 两个模式相辅相依，共享发展机会。

4. 加快布局跨境结算区域中心。随着 B2B、B2C 进出口业务拓展，各种国际性结算业务将从海外仓所在地转移至国内。国内一些金融机构已瞄准这一市场，布局跨境结算区域中心。我国发展跨境电商开发的通关管理信息系统和物流流程在境外的复制，市场采购、生产、配送、消费所产生大数据的开发与利用，渐次建立的海外仓和不断拓展的中国销售中心，都是我国参与下一轮更为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的宝贵资源。

三、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和 E 国际贸易， 加快形成下一代贸易方式，是世界主要大国的新战略， 而中国的先发优势十分明显

当前，世界主要贸易国家都把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和 E 国际贸易作为本国的发展战略，对其高度重视，一些贸易大国或强国纷纷出台政策予以扶持。美国在 2015 年发布了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十年规划，目标是到 2025 年使跨境电子商务规模达到整个国际贸易额的 70%。欧盟、日本也相继做出了这样的规划。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当前，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在跨境电子商务竞争力方面排在全球前五名。国际有关机构预测，2015—2018 年全球的跨境电子商务将会按照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该机构还认为，从 2015 年全球电子商务发展指数看，中国制定的年均增长 30% 计划能够实现。

国务院 2015 年 6 月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预期 2016—2020 年我国每年跨境电子商务增速在 30% 以上。按照这样的速度推算，到 2025 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将达 70% 以上。这将为广大企业和个人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1994 年 4 月，我国首次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从此开启。2015 年，全国网民规模已发展到 6.8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超过 50%，网购用户规模达到 4.31 亿户，网络零售规模达 3.8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0% 以上。互联网应用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去中心化，体现在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上，像河南、重庆等内陆地区和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在跨境电子商务和 E 国际贸易发展上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同时，这种去中心化的特征在跨境电子商务当中又体现为国际贸易主体的多样性，以前做国际贸易的大多数是高大上的进出口企业，现在即使是中小企业，甚至是个人

人，均可以从事国际贸易，打开了开拓国际市场的一扇新“窗户”和广袤空间，这是人民群众在创新发展中的伟大创举。我们应抓住机遇顺势而上，切不可错失良机。

四、深刻认识跨境电商新政策存在的问题， 及时纠正

（一）新政策对税基和购买额度的限制，与国际邮快递及消费者行李自带相比存在明显的不公平

国家维持市场秩序，需要打击限制的是各种走私和灰色清关行为，堵后门、开前门。如前所述，由国家有关部委指导形成的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是对蚂蚁搬家式的边境走私、海淘代购、国际邮快递等行为的规范和完善，是使国家、企业、消费者共赢的制度安排，在国际采购行为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是一个合理替代的选择。

新政策对税基和购买额度的限制规定，与国际邮快递及消费者行李自带相比，存在明显的不公平。如购买额度，出国购买每人免税携带 5000 元，而邮政快递由于无法实现有效监管等同于不受限制。新政策则规定跨境电商每人每次限购 2000 元、年限额 20000 元。税收：海外消费、邮快递为零，而按新政策规定跨境电商实际纳税比一般贸易还高出 30%。监管条件：海外消费、邮快递无任何监管条件，一般贸易有通关单，而新政策规定跨境电商有正面清单、通关单、约束条件等最复杂的监管限制。这些都明显起到了鼓励国人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到国外“爆买”的效应，与我们吸引消费回流及营造公平经营环境的初衷不符。前者国家征不到税、无法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后者不仅能合理征税，还能带动仓储、分拨、物流、加工贸易等相关产业发展。

（二）跨境电商经营的不仅是一般贸易货物，更是供社会公众最终消费的商品

把保税备货模式经营商品看作是货物而不是物品，是新政策设立时判断的基点。但应认识到，它和企业与企业间的贸易及进口后准备投放到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不一样，集货模式更是千千万万消费者在网上选择后下了订单并付了款的个人消费品。跨境电商的作用是把这些碎片化的但具有物品属性的商品以集中采购、集约运输的方式，运至海关监管区内，形成更大规模的贸易流量，并使之纳入合理征税的轨道。这种模式打破了国际航空物流商的垄断，把碎片化的物品集中起来运至国内进行检验检疫，节约了消费者的成本，增加了国家、地方税收和仓储消费，带动了就业与加工贸易的发展。我们不能按照一般贸易模式下用传统的办式来管理现代新经济、新业态，不能按一般贸易模式下传统的办法来管理未来可能形成的新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而应认识、适应并把握这

一改变。

（三）对跨境电商已经进行的试验来讲，B2C 与 B2B 具有同样的意义，两者链接可以产生集成效应

鼓励跨境电商开展 B2B 业务、利用“互联网 + 跨境电子商务”的流通方式，促进一般贸易向 E 国际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实质在于改变交易手段和流程，提升现代流通的效率和效益。而 B2C 和随之而来的 C2B（个人对企业）更是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和国际贸易方式的重大变革。比如跨境电子商务中的零售就冲击改变了国际间的关税征收模式。跨境零售情况下，卖方在境外，按照目前国际贸易惯例增值税失去了征收主体，这个问题势必要解决。海淘是一个方案，它的方式是在境外设立海外仓，然后以 B2B 的方式将货物从世界各地运到仓中，再分成邮包寄至国内，完成 B2C。我国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则探索出用 B2B2C 的监管模式进行规范管理，这样就把税收和就业“争”到了国内。2015 年我国跨境电商用 B2B2C 和 B2C 方式实现的交易额虽只有 150 多亿元，但创造了新工业革命条件下国际贸易进出口零售的新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在世界进入大规模定制化生产和个性化量产的背景下，由 B2B 走向 B2C 乃至 C2B 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这也是我国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捷径。支持有关部门、企业和地方继续对关务模式、物流交付、进口渠道与信息数据管理进行改革探索，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当前国际上大的 B2C 平台对跨国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正逐步加强控制，中国跨境电商利用我们的市场优势、出口优势和大数据优势，完全有条件参与重塑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甚至形成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几年来，试点工作克服了很多困难，正渐入佳境，如果此时关闭试验和机会窗口，将令人扼腕叹惜。

（四）解决税率、通关单、正面清单等问题，关系到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升级

新政策关于税率、通关单和正面清单的规定都存在不少问题。

税率：新税率标准出台后，提高了跨境零售进口征收税基。与一般贸易和邮快递、行李携带等方式比有很大的不公。跨境电商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压扁”的中间环节，本应使消费者和国家受益，但因其税负不可转移，成本反而高出 20%~50%。这一政策忽视了一点，当商品以货物形式在保税区域内时，属于境内关外，商品以国际物流的方式存在，客观上仍有转移他国的可能性，只有当商品通过关检进入国内市场时才完成了交易。制定税率时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建议调低税率或是降低征收税基，改实际交易价格为一般贸易模式的 CIF（到岸价格）同等税基标准。

通关单：这是阻止当前进口商品无法入区的关键因素。跨境零售商品不少是境外市场再采购，谁来提供通关单？国外商户开具通关单，费用由谁来承担？零散商品的进口许可证、产品合格证等诸多证件漫长的获取过程如何满足新业态的时效？我们到国外市场购物行李携带或海淘代购邮递，需要这些证件吗？因而，建议尽快建立适应跨境电商特征的通关单制度。

正面清单：新近公布的跨境电商进口产品目录 1293 项，基本上是我国国内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目录对其设定了很多限制性条款，按照条款，跨境零售电商有 97% 的商品无法经营。这种限制的办法并不能引致消费回流。只有用市场开放倒逼的竞争方法，才能提高国内制造业水平。建议结合我国自贸区试点的经验和做法，按负面清单的办法进行管理，或是取消正面清单内的诸多限制。

国家的政策体系是否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于其是否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将其产生的新能量加以有效利用，进而累积成社会制度成果。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已形成蓬勃发展的新业态，几年来改革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将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E 国际贸易”方式，成为我国在国际贸易掌握主动权的重要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发展，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跨境电商发展的意见，又刚刚批复了 12 个城市的试验区，在这一领域有很多新的内容要试。在此背景下，如何用新思路、新视角看待新业态，用创新政府管理方式适应和推动新业态发展，是在互联网 + 新实体经济的群众创新发展中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政策运筹能力的新挑战。建议有关方面充分听取对跨境电商发展的意见，重视前期几个城市试点取得的经验，加强调查研究，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制定出更为超前的带有引导新业态发展、抢占全球制高点的措施，支持引导跨境电商持续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宏观经济 ·

推动创新设计实现 新产业革命下跨越发展

王晓红

摘要：创新设计已经成为引领和支撑网络信息时代新产业革命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现代设计的历史性重大飞跃。本文阐述了创新设计的基本内涵特征及发展创新设计的重大战略意义，总结了主要国家创新设计发展的经验和趋势，分析了“十二五”时期中国创新设计取得的快速发展、重大成就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创新设计发展的主要思路。主要思路包括：着力提升重点产业领域的创新设计能力，发挥创新设计在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作用，大力提高企业创新设计竞争力，实施创新设计人才战略，加快创新设计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强财政金融政策扶持，营造良好的创新设计发展环境等。

关键词：创新设计 新产业革命 产业转型升级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创新设计是现代设计的历史性重大飞跃，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发挥着支撑引领作用，将引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服务业态等重大变革，引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消费需求。当前，我们与发达国家共同站在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起跑线上，面临跨越发展、加速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得机遇。中国应牢牢把握这一战略机遇期，把创新设计作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突破口，强化设计在创新链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在网络信息时代实现弯道超车，抢占世界科技前沿和高端制造、新兴产业发展的制高点，由模仿跟踪者成为全球创新引领者。

一、创新设计的基本内涵

设计是创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甬祥（2014）指出，设计是人类对有目的创造创新活动的预先设想、计划和策划，是具有创意的系统综合集成的创新创造，也是将信息、知识、技术、创意转化为产品、工艺、装备、经营服务的先导和准备，并决定着制造和服务的价值，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随着社会从工业化时代进入网络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新经济迅速发展，信息知识大数据成为最重要的创新资源，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日新月异，全球市场多样化、个性化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持续增长，以及人类面临应对资源环境压力、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挑战，推动了设计创新价值理念的发展，创新设计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

创新设计是工业设计的新发展，在设计环境、涵盖范围、设计工具、设计方式、创新模式、价值增值路径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路甬祥（2014）基于产业发展的视角，将设计进化分为三个阶段，并阐明了创新设计的定义。第一阶段为农耕时代的传统设计，即设计 1.0 时代；第二阶段为工业时代的现代设计，即设计 2.0 时代（工业设计 1.0）；第三阶段为知识网络时代的创新设计，即设计 3.0 时代（工业设计 2.0）。创新设计涵盖产品设计、流程设计、工程设计、环境设计、服务设计等诸多领域，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软性制造、物理信息系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具有网络智能、绿色低碳、超常融合、开放创新、共创分享等重要特征，广泛应用于各类产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城市建设、国家安全等领域。

工业设计产生发展于工业化时代，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其主要针对工业产品设计，作用于提升产品外观、功能、造型、品牌、营销等方面，因此成为推动产品创新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1970 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ICSID）明确了工业设计的第一个定义：“工业设计是一种根据产业状况以决定制作物品之适应特质的创造活动。”1980 年 ICSID 又对工业设计作出如下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2006 年 ICSID 再次对定义进行修订，认为工业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目的是为物品、过程、服务以及它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构成的系统建立起多方面的品质”。2010 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中指出，“工业设计是以工业产品为主要对象，综合运用科技成果和工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知识，对产品的功能、结构、形态及包装等进行整合优化的创新活动”。

创新设计诞生并发展于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知识网络时代。“如果说，工业时代的

现代设计主要基于物理环境，那么全球知识网络时代的创新设计将基于全球信息网络和物理环境。”^①设计产业链由注重产品外观功能向全生命周期拓展，由产品设计为主向工艺流程、服务模式设计拓展；设计价值追求由注重企业成本效益向注重公共服务、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保、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转变；设计方式由工业化的大规模批量生产向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式、体验式的设计制造转变；设计创新方式由单一主体、资源独占、设计师主导向全球网络平台、资源开放、大众参与、共创共享、协同融合发展转变；设计与技术研发、制造过程、营销模式的相互关系，由被动式、分离式向主导型、引领型转变，向相互依赖、紧密融合发展。德国工业 4.0 认为，未来工业生产形式的主要特点是大规模生产的高度个性化产品，顾客与业务伙伴对业务过程、价值创造过程的广泛参与，生产和高质量服务的集成，物联网、服务网、数据网将取代传统封闭性的制造系统成为未来工业发展的基础，智能制造、互联制造、定制制造、绿色制造等将成为主要业态。

二、发展创新设计的重大战略意义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新旧动能转换、新旧产业交替、新旧体制更迭的阵痛，以及经济下行压力、要素成本全面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贸易出口下降等挑战，同时也面临全球经济增速低迷、局势动荡、治理结构分化和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挑战。随着跨国公司加工制造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以及发达国家掀起回归实体经济的浪潮，中国将面临发达国家重振高端制造和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制造竞争的双重挑战。因此，推动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更加迫切。加快发展创新设计，对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出口产品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探索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跃升，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第一，发展创新设计是有效应对德国工业 4.0、美国互联网工业革命挑战，实现新产业革命下跨越发展的关键环节。历史发展证明，人类文明进程也是设计进化的过程，设计创新是引发产业革命的关键因素，也是有力引领支撑新一轮产业革命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新的技术发明将引发设计革命，也将通过设计的集成创新而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去，由此而引发产业变革，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消费方式，颠覆传统的

^①路甬祥：《设计的进化与面向未来的中国创新设计》，《全球化》2014 年第 6 期。

方式。设计正是通过融合新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创新成果，不断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工业文明与知识文明。回眸 21 世纪以来，微软、英特尔、IBM、苹果、谷歌等一批信息技术（IT）及互联网企业依靠创新设计成果，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引领全球产业创新发展潮流。而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等企业曾拥有世界领先的工业设计成果，但由于没有抓住网络智能终端创新设计的发展机遇而相继衰落。苹果公司通过集成多个领域先进技术发明了智能终端，这一经典的创新设计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而且引发了全球服务业态创新。

第二，发展创新设计是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实现价值链提升，推动制造业由加工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由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向原始设计制造商（ODM）、原始品牌制造商（OBM）转变的关键环节。以创新设计为核心的服务型制造，成为新一轮制造业革命的主要特征，不仅全面提升制造业价值，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也将重塑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设计是产业和产品创新链的起点、价值链的源头，也是实现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为市场需求、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设计的核心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过程，因此也是架设在技术、服务、用户和社会创新之间的桥梁。创新设计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通过集成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业态，在供给侧为产品、流程、服务的全过程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将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有机地融为一体，由此推动制造产业链向服务延伸，推动制造企业实现研发、生产、营销、服务等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引领企业由单一生产、低附加值走向自主品牌、服务增值之路，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跃升。

第三，发展创新设计是推动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关键环节。中国制造业规模虽然是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由于产业链以加工制造为主，导致长期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矛盾十分突出，成为困扰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创新设计对于提高消费品质和服务质量、改善供给、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提高个性化、高端化的产品设计，能够满足消费者追求时尚、高品质的需求，引导海外消费回流，提高产品附加值；通过提供低碳环保、智能高效的服务模式设计，能够引导社会形成绿色、简约的消费风尚；通过提供网络、体验等营销模式设计，能够改善消费预期，快速扩大市场需求。

第四，发展创新设计是推动产品出口结构优化，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和贸易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从英国、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促进外贸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它们无一不将设计创新视为提升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当前，中国虽然是世界货

物贸易第一大国，但出口商品结构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全球价值链处于中低端水平的状况仍未改变。由于在钢铁、汽车、机械装备、纺织、家具、建材、玩具、日用消费品等传统产业，以及电子消费品、信息通信等新兴产业领域，缺乏创新设计和核心关键技术，导致出口产品附加值低、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和要素投入等问题，从而严重制约了中国产品出口质量、结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从服务贸易看，中国设计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设计服务出口尚未形成规模。目前，主要的设计服务出口国仍然是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发达国家。因此，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设计能力、推动企业创建国际品牌、增强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构建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贸易竞争新优势，将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制造业的被动局面。

第五，发展创新设计是有效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智能高效发展，构建网络信息时代新型制造体系的关键环节。目前，中国制造业以资源能源消耗为代价，“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增长方式仍很突出。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70%，远远高于世界约 33% 的平均水平；制造业能源消费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 63%，而中国能源利用率仅为 33%，落后于发达国家 20 年的水平；中国工业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 10 倍。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通过创新设计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从未来趋势看，通过创新设计发展个性化定制设计、网络设计、智能设计、绿色设计等新业态，推动制造业实现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和服务化；通过网络智能设计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度融合；通过设计可再生、可回收、可存储、可控制、可分配、自适应、分布式的能源动力系统，提高新能源、新材料的综合开发利用效率，建设循环低碳、清洁安全的能源体系；通过设计个性化、便利化的服务模式，满足大众多样化消费需求；通过设计创客、众包、众筹等新兴服务业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利环境。

三、发展创新设计的国际经验

（一）将创新设计作为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顶层规划设计

以设计推动企业创新、产业创新、社会创新和城市创新是发达国家的共同战略。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芬兰及瑞典等国家，长期以来将设计纳入国家创新战略之中，并制定明确的顶层设计、组织规划、促进政策和实施路线图。政府设计政策支持重点已经从工业设计向服务设计、战略设计等全面发展，并在设计基础研究、设计专业化、促进设计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1. 美国是对全球设计产生深远影响并持续引领创新设计的国家。早在 20 世纪 20 年

代末，美国陷入经济危机，为了刺激销售，大企业特别是汽车企业相继成立了设计部门，并出现了独立的设计事务所。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始终强调设计在制造业变革和新价值创造方面的突出作用。自 2004 年起，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国家工程院发布了《重组制造：设计对接材料和产品的桥梁》(Retooling Manufacturing: Bridging Design, Materials, and Production)、《价值创造：设计、制造与服务的融合创新》(Making Value: Integrated Innovation,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等系列报告；2013 年美国投资 3.2 亿美元成立“数字制造和设计创新研究院”；2014 年奥巴马宣布每年投入 25 亿美元推动“创客”发展，并拨款 10 亿美元组建国家创新制造网络，计划建设 15 个制造创新研究所，形成国家创新生态系统。

2. 欧洲是世界设计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芬兰、丹麦及瑞典等国始终保持全球设计领先国家地位。德国早在 20 世纪初就确立了“设计定标准，设计定质量”的战略，从而铸就了“德国制造”和奔驰、宝马、大众、西门子、博世等世界品牌。2013 年，德国工业 4.0 战略提出了开放创新、协同创新、用户创新的新理念，产品设计注重用户价值、满足个性化需求，推动了工业创新从生产范式到服务范式的转变，并把应用于网络智能制造的软件、系统作为创新设计的关键领域。英国政府把创新设计作为国家六大竞争力资源之一，目前在设计研究、设计教育、设计产业国际化方面均居世界领先地位。2008 年英国设计委员会制定“Design 2020”（设计 2020），对创新设计进行长期发展规划，并在《重启不列颠 2：设计与公共服务》报告中明确指出，将设计应用于公共服务的规划与路线图。此外，赫尔辛基、柏林、斯德哥尔摩、米兰等城市已经将设计纳入都市创新体系规划。

3. 亚洲以日韩为主，在全球设计创新中形成追赶之势。日本是世界设计强国，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把工业设计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基本国策战略，工业设计对于促进日本的汽车、电子产品、日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等迅速占领世界市场，并推动其在二战以后经济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致力于发展无人工厂、机器人等抢占网络智能设计制造先机，致力于开发智能建筑设计、地下城市设计、空间城市设计等，人性化设计、节能化设计、无障碍设计等成为日本设计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韩国 1998 年提出“设计韩国”战略，2000 年开始确立建成设计一流国家的目标，并明确创新设计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向，尤其注重支持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与创新设计融合。具体包括：提供设备技术支持、增加硬件基础设施投入、提供企业贷款、设立产业振兴院等。韩国设计振兴政策系统以政府为中心，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服务机构互相协作。设计政策重点是推行全民新设计运动、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强化产业竞争力、提高设计国

际竞争力、强化设计品牌竞争力。

（二）将设计作为推动企业创新、服务业态创新和产业贸易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1. 创新设计缔造了网络信息时代的一批世界领军企业。回顾互联网时代以来的全球重大业态创新与产业变革，无不产生于创新设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微软、英特尔、苹果、谷歌等一批 IT 及互联网企业依靠创新设计，在电脑操作系统、中央处理器（CPU）、移动智能终端、搜索引擎等领域长期占领全球市场的制高点和主导权。微软公司相继设计开发了 MS-DOS、Windows、Office 等系统，曾占居全球个人电脑软件市场 70% 以上的份额，1999 年创下 6205.8 亿美元的市值。苹果公司相继推出 iPod、iPhone、iPad、iWatch 等移动智能终端设计，并创造了基于 iOS 操作系统和 APP Store、iTunes 等的共创分享平台，不仅引领移动互联网产业创新，而且引发了互联网金融、网络物流、电子商务、分享经济等一系列服务业态创新。尤其是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网络约车、网络订票及订餐等新的服务模式，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出行、娱乐方式，为大众创造了低碳、经济、快捷、便利、可分享的生活品质。2012 年 8 月，苹果以市值 6235 亿美元超越微软列全球股市第一。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新型传感技术，通过“引擎健康管理”网络服务设计，赢得了全球大型发动机 50% 的市场份额。波音公司、空客公司应用全球网络协同设计制造出波音 787、空客 A380 等领先产品，长期占据世界大飞机产业的制高点。

2. 注重设计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自主品牌成长、推动企业国际化方面的关键性作用。丹麦的一项研究表明，设计的使用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宏观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采购过设计服务的企业营业收益超出平均值 22%。2003—2007 年，丹麦企业把设计作为流程创新和企业创新策略的占 66%，多数企业通过设计创新进入到 OBM、OSM（原始标准制造商）阶段，OEM 企业降幅明显。英国设计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企业重视创新设计的比例愈来愈高，设计国际化程度也非常高。有 50% 的制造企业认为设计在商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设计引领型企业 10 年间的股票价值增值 200%，有 4% 的设计公司在两个以上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据美国设计管理协会 2013 年发布的数据，福特、微软、耐克、可口可乐等“以设计为主导”的企业，10 年来股市市价表现高于标准普尔指数 228%。芬兰出口企业全部都有自主设计的产品，绝大部分传统产业使用创新设计，其中纺织服装和皮革、家具、玻璃、制陶行业等传统产业有 80% 以上使用设计师，金属制造、机械制造、电子设备、计算机相关产业及电器零部件、橡胶和塑料制造、汽车制造、健康、食品、建筑、木材等产业有 50% 以上使用设计师。

四、中国创新设计取得快速发展与重大突破

（一）国家创新设计能力显著提升，涌现出一批重大创新设计成果

随着国家创新战略深入发展，设计创新日益得到重视，设计政策、资金投入、创新环境等方面日益改善。中国已经在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轨道交通、海洋探测、信息通信、能源电力等领域的创新设计能力取得重大突破。北斗导航卫星、神州飞船、嫦娥探月工程、长征运载火箭、蛟龙号潜海等深空深海重大工程装备的创新设计能力已居世界前列；高铁作为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系统集成创新的成果，已经奠定了世界高铁产业领跑者的地位，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排头兵；在核电、消费电子、通信设备、工程装备、互联网等领域，已经产生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创新设计企业、产品和服务模式。2014年，国内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受理与申请量分别是2010年的2.73倍、2.11倍和1.34倍；2015年，中国专利申请总量2289346件，其中发明专利955342件、实用新型专利859925件、外观设计专利474079件，占比分别为42%、37%、21%。截至2015年，中国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58个、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1187家、工信部认定的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64家。

（二）企业创新设计能力显著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

1. 涌现出一批占据全球制高点的设计创新企业。随着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增强了设计创新意识，一批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通过不断推动产品、商业模式、管理模式创新设计能力，已经成为全球行业领袖。华为长期坚持创新设计形成了自主品牌，从一个中低端通信设备生产商成长为全球通信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2015年以3898项专利技术申请量列全球第一位。大疆公司通过集成无线传输、全球定位系统（GPS）、高性能航空摄影平台、模块化硬件、嵌入式控制软件等技术，设计出四轴消费应用无人机，近5年企业收益增长近百倍，成为全球同业领军企业。小米公司通过共创平台加快设计创新速度，2014年全球销售突破6112万台。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滴滴打车等互联网企业通过创新服务模式设计，引发了服务业态创新，成为全球互联网领军企业。支付宝、余额宝、微信支付创造了互联网金融新的支付方式；滴滴打车创造了节约低碳的出行方式；微信创造了新的社交、传播方式；淘宝创造了新的购物模式。阿里巴巴通过淘宝、支付宝、菜鸟、阿里小贷等新的服务模式设计，成为全球电商、互联网金融的引领者，上市市值达到2480亿美元，一度超过亚马逊及eBay的总和。

2. 企业在创新设计中的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日益突出。2015年中国企业发明专利申

请量 58.3 万件，占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的 60.2%；中国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5.9 万件，占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的 60.5%，较 2014 年提高 4.1%。企业设计研发经费投入显著增长，美的、TCL、康佳、创维等大型企业平均设计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 2.5% 以上。一些传统产业不断增加设计投入，其中家电企业设计投入平均占研发费用比重达 30%。据调查，广东制造企业对工业设计投入达到 50 亿元/年以上，设计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28%，全省在实施工业设计战略的企业中，有 80% 开拓了新产品市场、70% 降低了产品成本，企业有 40% 的利润和 25% 的销售增长来自设计创新。

3. 企业通过创新设计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显著提高。海尔、联想、一汽、吉利、奇瑞等一批制造企业，通过创新设计使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海尔集团在全球建立 18 个设计中心，平均每天申请 2.6 项专利。上汽集团 2010 年投资 4770 万元在英国设立海外汽车设计中心，推出“荣威 W5”、新“MG3”等车型，提升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的水平。2012 年以后，腾讯、中兴等计算机和互联网公司在美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反映出中国企业互联网创新设计已经走向全球市场。

（三）创新设计推动了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设计推动了中国轻工、纺织服装、电子信息制造、机械及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装备等传统产业升级。仅从中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看，目前主要集中在包装、服装、家具、交通工具等传统行业，通信设备、装备制造、电子终端产品、互联网等产品的申请量日益提高。其中，在海外申请量最大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企业的外观设计，尤其是电子终端领域创新设计十分活跃，华为的申请量已经超过三星，青岛海信、中兴、四川长虹等企业的申请量也已经超过松下。“互联网+”带来的设计创新层出不穷，手机、电脑/显示器等终端产品的图形用户界面申请量分别占 32% 和 23%，主要与应用软件、手机 APP（应用程序）等设计创新相关。创新设计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能力显著增强，其中，家具行业已在创新设计引领下走向“创造”之路，通过引入绿色环保材料及工艺、应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进入自主品牌、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的新阶段。通过家具与家电的整合、实体店与网络销售的整合、用户需求和设计研发的整合，以尚品宅配为代表的一批家具企业实现了从代工制造向自主品牌、定制设计、网络营销的转型。在服装产业，青岛红领集团等服装企业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实现全球个性化定制设计和销售，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四）设计服务业已经形成一定产业规模和较完善的产业体系

截至 2014 年，中国设计师达 1700 万人，其中工业设计从业人员约 50 万人，年均增速 10% 左右，平均每个企业拥有 1.1 名设计师；全国工业设计相关企业超过 7500 家、工

业设计公司超过 2500 家。专业设计公司已经逐步嵌入制造企业的设计创新链中，成为推动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越来越多的设计与制造企业形成长期、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制造企业进行设计开发活动，成为制造业创新链、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单纯提供设计服务向开发自主品牌发展，服务能力总体明显提升。设计园区成为推动制造企业设计创新的服务平台，对于集聚设计企业、为制造企业提供服务，提高区域创新能力、辐射带动能力，推动区域结构调整具有积极作用。设计教育快速发展，为创新设计提供了人才保障。截至 2015 年，有 228 所高校设立了工业设计专业，设立产品设计专业的院校有 333 所，设立机械设计专业的院校有 393 所。每年培养的工业设计专业毕业生数量为美国同期的 10 倍以上。设计交易市场快速发展，2012 年 12 月中国设计交易市场正式开业，有 79 家北京产权中介机构、71 家上海产权中介机构及深圳联交所旗下的 8 所交易平台已经开始为市场提供设计交易服务。

五、中国创新设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应该看到，中国与世界设计强国仍有很大差距，创新设计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制造业创新设计能力不足。总体来看，我们自主设计创造并引领世界的产品、装备、服务模式以及自主品牌、国际著名企业还较少。尽管彩电、手机和电脑产量等产品产量列世界第一位，但核心部件主要依靠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集成电路、民航客机、航空发动机、科学与医疗仪器、高端基础关键零部件等也严重依赖进口。比如中国代工生产的 iPhone 产品获得劳动力价值约为 2%，远远低于美国所获 60% 的设计研发收益价值；液晶彩电进口 32 寸彩电面板约 700 元，而国内售价 2000 多元，进口成本占售价的 1/3。

第二，企业创新设计投入不足。从中国企业新产品创新投入结构看，普遍存在重技术研发、设计投入不足的问题。企业技术创新缺乏与用户需求、市场环境的有效对接，没有发挥创新设计在生产制造、商业服务中的提升作用，其结果必然造成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实用性和推广性差、技术研发价值难以实现。大部分企业缺乏系统科学的创新设计理念，满足于引进和模仿，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能力不足。2015 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超过 2450 万辆，连续 7 年列全球第一，但汽车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 50%，汽车企业收入仅占全球行业的 8%。在手机、计算机、数控机床等领域，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缺乏原创设计理念，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 20%、计算机售价的 30%、数控机床售价的 20%~40% 都需要向国外专利持有者支付专利费。

第三，创新设计生态系统仍不完善。“产、学、研、媒、用、金”协同创新的生态链

还没有形成。目前，大部分设计研发活动仍然封闭在企业内部完成，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设计服务提供商协同创新不足，尚未形成完善的创新设计研究体系；在基础研究、共性关键设计研究方面缺乏持续的经费投入，难以产生具有全球领先的原创性设计，也难以为企业创新提供共性关键设计技术支撑；能够有效链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和用户体验之间的国家创新设计系统还没有形成；创新设计服务平台建设还不完善；在国家重大项目中，缺乏鼓励支持首台（套）产品的创新设计研制和示范应用的支持资金，使企业承担风险较大，导致创新动力不足。

第四，政府对重大创新设计缺乏统筹协调。在解决提升国家重点行业、重大装备的创新设计能力方面未能形成合力，未能打破部门、行业和学科间的壁垒，资源和资金投入分散，难以建立从研究、实验、设计到生产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创新模式。

六、促进中国创新设计发展的主要思路

要把创新设计作为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抓手，紧紧围绕推动自主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加强公共服务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构建国家创新设计战略体系，强化创新设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引领支撑作用，发挥创新设计在改善供给、创新需求、引导大众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创新设计构建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贸易竞争新优势。从宏观层面、产业层面、政策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系统规划、组织实施、制定发展路线图，加快提高设计国际竞争力，力争通过 10 年的时间进入世界设计一流国家行列。

（一）着力提升重点产业领域的创新设计能力

“十三五”时期，应通过创新设计提高关键技术创新、系统集成创新、服务模式创新的能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业态。在传统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设计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拥有自主品牌的领军企业，建设一批国家创新设计示范工程，加强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形成各行业的国家创新设计标准。着力提升钢铁冶金、纺织服装、家电、汽车、电力、建材等传统制造业及建筑、道路、桥梁等工程领域的创新设计能力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从规模、速度增长到技术、质量、品牌领先的转变，从商品出口向系统、服务输出转变；着力提升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智能电网、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设计能力，快速扩大产

业规模，加速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着力提高软件、芯片、集成电路、互联网、物联网、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创新设计能力，尤其要注重创新服务模式设计，通过服务业态持续创新创造崭新的市场需求，不断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引导绿色低碳消费方式；着力提升公共服务、国家安全、社会管理、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创新设计能力，创造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和装备支撑体系，建立先进设计规范和标准，提高国家安全、社会服务的保障能力以及生态环境效益水平；加快发展信息化设计、与过程集成的设计、复杂过程和系统设计等共性技术，自主研发用于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能管理等领域的设计工具，加强虚拟仿真、智能控制、嵌入式操作系统等领域的软件设计。

（二）发挥创新设计在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作用

第一，提高产品设计创新能力，推动产品结构、质量、品牌和服务整体提升。集成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通过提升关键技术和系统集成创新能力，提升产品功能、外观造型、品牌等设计水平，形成具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推广个性化定制设计、智能化设计、网络化设计，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仿真、智能控制等网络信息技术设计，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制造，提高制造效率。第二，提高流程设计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向绿色低碳、网络智能转型。鼓励企业、园区使用循环经济设计、优化工艺流程设计，形成低碳节能的生产方式；通过加强网络服务设计、推动网络协同制造，提升制造企业服务化和智能化水平；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设计，构建信息化、网络化、平台化的供应链管理系统，整合集成社会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资源，降低企业流通成本和要素成本。第三，提高服务模式设计创新能力，实现产品链、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融合和价值链全面提升。提升整体方案解决设计能力，推动产品全生命周期设计，实现从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到用户的闭环效应，从生产到服务的全产业链价值提升。加强互联网新兴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设计，鼓励依托互联网的直销服务、用户体验等商业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便利化服务，提高销售收入和利润增长空间。第四，推动设计与制造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服务型制造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一趋势将扩大制造企业的设计服务需求，同时也将使越来越多的设计服务提供商嵌入制造产业链，推动制造业由加工生产向服务型制造升级。应积极引导大中型制造企业通过使用设计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促进设计服务提供商与制造企业形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通过鼓励设计服务外包等方式培育和扩大国内设计服务市场。

（三）大力提高企业创新设计竞争力

第一，继续强化企业在创新设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为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设计研究及成果转化提供支持，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同参与国家创新设计体系建设，组织共性关键设计技术研发联合攻关，提升设计创新基础研究能力。第二，增强企业创新设计意识。积极主动适应产业革命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新常态，拥抱互联网经济，鼓励企业扩大设计投入，形成研发、设计双轮驱动的创新模式，提高产品和品牌竞争力。第三，鼓励企业整合国际国内创新设计资源。鼓励大企业建立设计部门和创新设计工程中心，通过收购国际设计团队、设立海外研发设计中心整合全球设计资源，增强设计国际竞争力，提升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鼓励中小企业购买专业设计服务。第四，鼓励企业构建“设计+研发+用户体验”的创新设计生态系统，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模式。第五，推动设计服务外包。服务外包是推动设计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高端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加速创新设计与产业融合的重要途径。应鼓励专业设计服务提供商积极承接制造企业设计服务、为中小制造企业提供设计服务、承接国际设计外包业务，提高设计专业化、国际化水平。

（四）实施创新设计人才战略

把培养创新设计人才放在首位，实施创新设计人才工程，优化设计人才结构，加快建设创新设计人才体系，推进创新设计人才体制和政策创新。第一，注重培养设计领军人才和适应性人才。将创新设计人才纳入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着力建设国际一流的设计学院，培育高精尖设计人才。推动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模式，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应积极探索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设计教育体制，鼓励高校加强与企业、设计机构紧密合作，聘请来自一线的设计师担任兼职教授，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孵化器，推动学生以创新设计成果进行创业。通过举办创新设计论坛、研讨会和工作坊等，促进业内交流互鉴。第二，建立国际化设计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在设计教育、文化、企业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多渠道、多形式地引进国外创新设计人才、设计机构，共享全球创新设计的智慧资源。通过开展重大设计项目的国际合作，建立国际智库、科研院所、企业的设计人才交流机制，建立与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的设计人才交流机制，与中国香港、台湾建立青年共同创新创业机制等，促进设计人才国际化。第三，建立创新设计人才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人人皆可成才、有利于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鼓励以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第四，建立常态化、普及化、网络化的设计师培训制度。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聘用国际设计专家讲学、组织设计师出国

培训，不断掌握全球设计的新趋势和新进展，掌握新的国际规范、国际标准等，发挥行业协会、民间设计教育机构、咨询机构的作用，利用互联网远程教育建立面向社会、覆盖广泛的社会培训网络。第五，树立“设计从娃娃抓起”的思想，加强现代设计博物馆、艺术与科学展示馆、新材料及新技术展示馆等与设计相关展馆的建设，普及面向全社会的创新设计理念和意识教育。

（五）加快创新设计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第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建成高水平国家创新设计中心，推动高校、科研院所面向社会开放创新设计资源，通过引导创新设计要素聚集流动，形成一批带动力强、特色突出的区域创新设计中心，打造区域性创新设计高地。第二，加强设计大数据平台建设，提高设计信息资源共享水平。重点围绕设计案例大数据、传感器大数据、材料大数据、商业大数据、专利大数据、信用大数据等，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设计技术体系建设。建设面向行业、政府的设计大数据平台，建设世界各国的与设计相关产业、文化、规范、标准等的大数据平台。推动产品数据的全数字模型化试点，推动工业技术模型数据库应用与交易平台建设，建立开源工业模型数据库，鼓励设计相关协会和网络采集会员的年度数据形成数据库。第三，加强创新设计通用研发、基础网络、技术交易、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平台建设。支持面向市场和企业的创新设计基础工具、软件研发，鼓励大企业建立技术转移平台、创业服务平台、设计孵化器，打造创业服务与创业投资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开放式服务载体，规范发展创新设计实物众筹、股权众筹和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平台。第四，加强各地设计创意园区平台建设，提高为设计企业服务的能力。加快建设园区设计网站、大数据、云计算、质量检测、环境测试、标准等服务平台，增加购置软件、快速成型等专用设备投入，提高信息、咨询、知识产权、融资、交易等服务能力，形成各类投资主体参与的平台建设机制。第五，加强跨领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创新设计资源协作平台建设，提高社会、企业、教育、文化艺术的资源共享水平，推动设计与商业、科技、人文、社会的互动交融，促进科研、教育、知识产权与设计成果产业化的有机融合。建设创新设计网络社区，加强设计资源的流动与合作。第六，加强创新设计推广宣传平台建设。以“中国好设计”“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为平台，树立创新设计企业、产品、装备、工艺流程、服务模式等标杆，发挥品牌和风向标的作用，引导大众认识好设计、购买好设计，引导企业创造、使用好设计。

（六）加强财政金融政策扶持

第一，在国家专项计划、科技重大专项中增加创新设计资金，加强财政资金对创新

设计投入，主要用于支持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基础研究、设计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创新设计成果产业化等方面。第二，设立国家创新设计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引导企业使用创新设计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的商业模式，支持重大创新设计成果产业化，奖励有重大贡献的创新设计人才，支持设计教育培训、设计国际交流等。第三，加强融资支持，鼓励银行、保险、担保等金融机构及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发支持设计服务的金融产品，为设计服务机构、中小企业提高创新设计能力提供金融服务；鼓励“众筹”“众包”“公私合作（PPP）”等新的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金支持创新设计发展。

（七）营造良好的创新设计发展环境

第一，营造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与保护的法制环境。应积极构建对接国际标准的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鼓励创新、杜绝抄袭剽窃的法律约束，综合运用专利、版权、著作权等各种保护手段，有效保护设计创新成果；通过缩短专利申请周期、简化申请手续、提高审查效率、延长保护时间等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调整过时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过于宽松的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标准及严惩严判设计侵权行为等，鼓励企业设计创新，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知识产权部门。第二，营造创新设计的社会环境。逐步建设质量为本、用户至上、诚信合作的创新设计文化，加强创新设计宣传推广工作，形成全社会尊重、应用、支持和激励创新设计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 路甬祥：《设计的进化与面向未来的中国创新设计》，《全球化》2014 年第 6 期。
2. 路甬祥：《创新设计与中国创造》，《全球化》2015 年第 4 期。
3. 中国工程院：《关于大力发展创新设计的建议（中工发〔2015〕23 号）》，2015 年 2 月。
4. 王晓红、张立群、于炜：《工业设计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与对策》，《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 2014》，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5. 王晓红、张立群、于炜：《工业设计——实现自主创新的引擎》，《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报告 2014》，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6. 王晓红：《中国设计：服务外包与竞争力》，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7. 王晓红：《强化创新设计，提升产业整体创新能力》，《中国经济导报》2015 年 8 月 14 日。

责任编辑：李蕊

构建“四大地区”和“三大战略” 协调互动新格局

高国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四大地区”构成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个地区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突出问题，今后应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十三五”时期，国家提出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构成的“三大战略”，目前相关领域各项工作进展顺利，需要继续稳步推进并防范应对存在的风险挑战。今后应着力加强“四大地区”和“三大战略”的协调互动，把握协调互动的内在机理和规律，明确协调互动的重点领域和举措，为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四大地区 三大战略 协调互动 新格局

作者简介：高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员、博士。

一、“四大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效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带动全国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1999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断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2003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挖掘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发展的潜力。2006年，国家提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不断强化中部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至此，形成了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四大地区”组成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一）东部率先发展战略

1. 主要成效

自 197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以设立沿海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特区等为标志，启动了东部率先的发展战略，对于我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东部率先战略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实力快速增强。地区生产总值、财政税收、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规模、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指标均发生了历史性飞跃，有力拉动了全国经济的快速增长。1978—2000 年，东部地区保持了年均增长约 10% 的增速，广东、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经济总量保持全国前列。二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增强。产业结构层次明显提升，传统优势产业进一步优化升级，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华为、海尔、联想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快速成长。现代服务业比重逐步提高，金融、物流、商务、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新兴业态加快壮大，服务业就业、税收、利用外资等指标的占比明显提高。三是形成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产业和人口吸纳能力不断提高，城市间交通、产业和人才等经济联系显著增强，一批现代化、国际化大中小城市发展壮大，城市的建筑风貌和服务功能加快完善，充分展示了我国现代化开放城市的形象和品味。四是对外开放的水平日益提高。开放型经济的结构持续优化，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经济体系，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比重从 1978 年的 32.0% 提高到 2015 年的 82.8%。“引进来”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走出去”的国家和投资明显增加，一大批全球跨国公司总部或者分支机构进驻，经开区、高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对外开放的平台不断完善，成为重要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窗口。五是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走在全国前列。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国有企业、财政税收、投融资等领域的改革，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设立的经济特区，到新世纪以来相继设立的上海浦东、天津滨海、广东深圳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到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力地强化了东部地区体制改革排头兵的地位。

2. 突出问题

东部地区今后一定时期继续充当“领头羊”地位，需要理性面对和积极化解下面三个突出问题：一是转型升级动力不足的问题。东部地区历经 30 多年的快速增长，土地、劳动力等成本明显上升，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均面临需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问题，产业结构和层次、空间布局结构也亟需优化提升。目前东部地区处于传统动能日渐式微、新动能尚未培育接替的阶段。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东部地区有可能在传统产业、传统动力和路径上徘徊更长时间。二是资源环境压力

空前严峻，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东部地区以占全国 9.6% 的土地承载了全国 40% 左右的人口，过去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粗放利用资源、生态环境破坏成本没有付费的条件下，导致了土地、水、能源浪费和低效利用并存，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地下水漏斗区造成地面沉降、海水倒灌问题突出。另外，近海岸线围填海无序扩张，近海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存在很大的生态隐患。三是日益突出的“城市病”问题。全国大多数超大和特大城市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交通拥堵、房价高企、雾霾加重、垃圾围城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功能和形象，不利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特别是全国 2.7 亿农民工中超过 1 亿分布在东部地区，部分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数量较大，有的城市甚至非户籍人口远远超过户籍人口，带来教育、卫生、居住、就业、治安等多方面压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较为艰巨。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

1. 主要成效

我国从 1999 年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阶段是 2000—2010 年，主要任务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夯实西部地区发展的基础。从基础设施建设看，能源、交通、水利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开工建设，青藏铁路、三峡工程等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工程建成投入使用，显著改善了西部地区对外经济联系和内部互联互通条件，提升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位势。从生态环境保护看，继续加大“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青藏高原、三江源、祁连山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得到有效保护，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退化得到有效控制，西部地区在全国的生态屏障功能显著增强。2000—2010 年，西部地区 GDP 年均增速为 11.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阶段是 2010 年至今，主要任务是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依托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优势，西部各省市积极发展新能源、绿色有机食品加工、民族医药等特色产业，涌现出一批国内外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同时，重庆、西安、成都等中心城市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迅猛发展，促进了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2010—2015 年，西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从 18.6% 增加到 20.1%，年均增速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突出问题

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区域。今后一段时期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总体发展水平和能力较

低。尽管西部大开发实施 15 年以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是由于西部国土面积辽阔、人口分散、区际差异大，区域内部的增长很不平衡，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总量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二是城乡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程度高。由于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和贫困人口比重较高，再加上农村地区布局分散，造成城乡差距明显扩大并显著高于全国的平均差距。西部与东部的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在逐步缩小，但是西部与东部的农村面貌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不断扩大，不利于西部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三是市场化配套条件、机制水平、理念意识等明显不足。以市场为导向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体系尚未健全，企业的配套和集群发展能力不够，政府的行政管理效能相对较低，企业家和居民的开放、创新、创业的意识相比沿海地区差距明显。

（三）东北振兴战略

1. 主要成效

2003 年，国家提出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目的在于焕发老工业基地的活力，增强东北地区的发展动力。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也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3—2010 年，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城区老工业区发展、独立工矿区治理等重点工作稳步推进，厂办大集体、社会保障体系、林区垦区等领域的改革先行先试，奠定了东北振兴的良好基础。2003—2010 年，东北三省 GDP 从 1.27 万亿元增加到 3.76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保持在 9.2% 左右。第二阶段是 2010 年至今，东北地区阶梯式下行，固定资产投资急剧下降，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稳定增长，东北地区下岗失业没有出现大面积冲击社会稳定状况，城乡居民的再就业和转产能力有所增强，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等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稳步实施，棚户区改造、暖房子等民生工程成效显著，东北地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断提升。2014 年，国家颁布《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给予东北地区更多实质性政策支持，缓解东北地区经济下行的压力。2010—2015 年，东北三省 GDP 从 3.76 万亿元增加到 5.81 万亿元，尽管占全国比重有所下降，但是经济总量仍然保持稳定增长。针对东北经济下行的严峻态势，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明确了“十三五”及今后一定时期东北振兴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将会对东北振兴的战略实施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2. 突出问题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工业的摇篮、东北亚合作的前沿地带，承担着引领全国老工业基

地转型发展的重任，目前处于下行的通道中，下一步需要重点应对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原、重、低的问题。东北产业对于资源和原材料的依赖性强，钢铁、煤炭、石油、森工等行业比重高，产业加工程度较低，导致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低，产业应对市场的竞争力不强。二是所有制结构单一、民营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东北地区自建国以来国有企业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没有真正到位，造成国企经营机制不灵活、竞争力差。相对应的民营中小微企业数量和规模明显不足，缺少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三是开放度不高、外向型经济落后的问题。东北地区尽管沿边，但是由于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动荡，东北地区的沿边开发开放优势没有得到发挥。而且，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偏重，进出口贸易、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偏小，不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四是体制机制落后、思想观念陈旧的问题。东北地区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影响，许多领域的体制机制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另外，东北一直以来地大物博，滋生了粗放发展、大手大脚的浪费陋习，小富即安的知足意识较重，缺少开拓创新的勇气魄力。

（四）中部崛起战略

1. 主要成效

2006 年，针对中部六省出现的经济“塌陷”，国家宣布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目标在于发挥中部地区区位、产业等优势，加强与东西部的经济联系，提升中部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实施 10 年来，主要取得以下成效：一是重点区域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强化。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取得有益经验，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试验区建设稳步推进，最近刚刚颁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进一步密切武汉、长沙、南昌“中三角”的经济联系合作。二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成效逐步显现。中部地区利用区位和成本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皖江城市带、湖北荆州、湖南湘南、江西赣南、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等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相继获批，成为带动中部地区产业聚集、结构优化的重要平台。三是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等领域先行先试取得有益经验。中部地区江河湖泊密集，青山绿水和鱼米之乡交融，鄱阳湖、洞庭湖等保护治理工程有序推进，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各项改革先行先试，一批循环经济、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城市、园区、企业加快建设。2005—2015 年，中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从 18.8% 增加到 20.3%，经济社会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2. 突出问题

中部地区作为我国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过渡带和结合部，下一步继续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面临以下几个突出问题：一是内部集聚能力不强，面临被“肢解”的风险。中部地区由于特殊的区位条件和发展阶段，山西省已经纳入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规划，安徽省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组成部分，湖南则随着京九、京广等轴带进一步密切与珠三角的全面合作。这一格局不利于中部地区形成自身的产业体系和特色，难以培育建设中部地区内部重要的经济区和增长极。二是成本优势、配套能力等因素竞争力不强导致东部产业“跳跃式”转移。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遭遇西部地区的激烈竞争，尽管中部在区位上具有优势，但是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优势比不过西部地区，有些西部城市在产业配套、融资支持等方面发展很快，吸引产业直接进入西部，这对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壮大现代产业体系提出严峻挑战。三是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比较劣势突出。中部地区既不沿海，也不沿边，目前的产业结构特点也不利于扩大与国外的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投资，尽管中部各省通过中欧班列、长江通关一体化等举措加强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但是竞争力和便捷化都有待进一步提升，这给中部地区融入全球化产业分工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表 1 2015 年四大地区经济总量及占全国比重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货物进出口总额	
	总额 (万亿元)	占全国比 重 (%)	总额 (万亿元)	占全国比 重 (%)	总额 (万亿元)	占全国比 重 (%)	总额 (万亿美元)	占全国比 重 (%)
东部	37.28	51.5	23.21	41.7	15.55	51.8	3.28	82.8
中部	14.71	20.3	14.31	25.7	6.26	20.9	0.25	6.4
西部	14.55	20.1	14.04	25.2	5.51	18.4	0.29	7.4
东北	5.81	8.0	4.08	7.3	2.71	9.0	0.14	3.4

数据来源：《2016 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年版。

二、“三大战略”的实施进展及挑战

“十二五”以来，为了应对国际国内新的经济政治形势变化，更好地适应、引领和把握新常态，党中央、国务院相继提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并陆续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意见、规划纲要和行动计划。三大战略中，京津冀协同发

展是以优化三省市分工协作格局为目标的重点区域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加强沿长江 11 个省市经济联系合作为目标的轴带区域发展战略，而“一带一路”战略则是影响全国所有地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发展战略。

（一）“一带一路”战略

2013 年下半年，我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 年 3 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原则，确定新疆、福建分别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推动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标志着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正式实施阶段。目前，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进展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先后与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引进来”与“走出去”规模快速增长。2015 年底，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的 25.1%，对外投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 148.2 亿美元、84.6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8.2%、23.8%。二是国内各地方相继制定“一带一路”对接方案，掀起“一带一路”建设热潮，通过开通中欧班列、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方式，着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目前，我国已有 16 个城市开通中欧班列，运行线路 39 条，累计开行 1700 列。三是“一带一路”的双多边合作机制不断建立，政府主导的相关论坛、博览会、节庆、培训、智库联盟等多种合作形式加快拓展，民间参与的文化、旅游、艺术等合作交流日趋活跃，显著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人员往来和交流。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从健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畅通“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共创开放包容的人文交流新局面三个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未来需要高度重视和防范面临的风险挑战主要包括：沿线地缘政治风险，特别是由于民族宗教冲突、能源供求变动、政权更迭动荡等引发的不确定风险；沿线国家对于中国具有防范和戒备心态，各种抵触和制裁有可能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我国企业走出去对于所在国的法律、环保、宗教等了解重视不够，影响长期稳定的生产经营和扩大规模；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面临其他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国内不同类型和地方的企业间存在恶性竞争等。

（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公布。2016 年 3 月，中央审议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原则，长江经济带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目前主要进展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加快，内河航运、沿江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管网等建设稳步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二是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规划正式公布，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三大城市群之间的通道联系、经贸合作逐步加强，促进沿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有效配置。三是沿江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不断加强，港口和岸线的开发保护意识逐步提高，沿江取水口、排污口的管理得到加强，跨界河流断面的水体污染治理不断改善。四是沿江对外开放的合作不断加强，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经验率先在沿江重点城市和港口推广，采用大通关、飞地园区、港口并购等方式，促进沿江整合优势资源集中开展对外经贸合作。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分别从建设沿江绿色生态走廊、构建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优化沿江城镇和产业布局三个方面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未来需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如下风险挑战：沿江各省市盲目攀比和恶性竞争，引发新一轮重复投资和布局造成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沿江港口、城市、园区密集布局，带来岸线的保护和水体污染治理的巨大压力；沿江上中下游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制约要素的流动和产业的转移；沿江生态补偿的标准、规模和可持续性尚未得到法律保障，不利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横向转移支付的规范实施等。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2015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进展明显的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明显加快，高铁、城市轨道、高速公路、国省道等多项重大建设项目开工或列入规划，进一步提高三地间要素流动的通达性。二是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稳步推进，北京对河北张家口、承德的生态补偿不断加大，大气污染治理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宽，跨界河流水体污染的防治力度明显加大，京津冀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纳入重点保护范围。三是产业疏解转移态势良好，一批低端业态从北京城市中心区转移至毗邻的河北城市，中关村、中科院等研发的高端业态和项目也加速在河北、天津孵化扩散，同时带动学校、医院、商业、文化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向外转移设立分支机构。四是专业领域的自发合作加快推进，京津冀三地在开发区、物流、商贸、教育等多个领域成立了联盟、社团、公司等不同类型合作组织，积极主动探索紧密对接合作的机制模式，吸引国内外各类社会组织和民间资本的参与。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优化空间格局和功能定位、构建一体化现代交通网络、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方面明确重点方向和任务。今后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面临的重大挑战主要表现为：三地功能定位的合理分工和错位发展能否有效遵守和执行；北京中心城区的人口、功能和开发强度能否得到有序疏解和优化；京津冀三地之间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三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能否得到有力保障和持续推进；如何协调京津两地与河北之间存在的集聚和扩散效应的规模、结构和效益上的平衡等。

表 2 2015 年京津冀及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及占全国比重

区域	地区生产总值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货物进出口总额	
	总额 (万亿元)	占全国比 重 (%)	总额 (万亿元)	占全国比 重 (%)	总额 (万亿元)	占全国比 重 (%)	总额 (万亿美元)	占全国比 重 (%)
京津冀	6.93	9.6	4.88	8.8	2.86	9.5	0.49	12.3
长江经济带	30.53	42.2	23.76	42.7	12.53	41.7	1.67	42.2

数据来源：《2016 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年版。

三、“四大地区”与“三大战略”协调互动的机理分析

加强“四大地区”与“三大战略”的协调互动，需要在空间上、领域上、时序上、手段上厘清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关联，构建新常态下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分析框架，为实现“四大地区”和“三大战略”协调互动新格局提供理论支撑。

（一）在空间上：全覆盖与部分覆盖

“四大地区”为主体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覆盖我国全部国土空间，是我国编制区域规划、制定区域政策的重要单元和依据。“三大战略”则是依托“四大地区”对于重点区域或者特定区域开发开放的战略设计，只是覆盖了部分的国土空间。“四大地区”和“三大战略”中的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在空间上均具有明确的边界和范围，而“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全国所有省市区，但在空间上更多地依托沿路、沿江、沿海等经济轴带和中心城市，因此也具有空间部分覆盖的特点。

（二）在领域上：全面发展与重点发展

“四大地区”对应的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涉及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对外开放等区域发展的所有领域，是对未来四大板块发展方

向、定位、目标和任务的战略总体安排。“三大战略”则是聚焦重点领域，解决突出问题，不追求面面俱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突出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产业转移合作三大领域，促进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长江经济带发展明确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重点建设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优化沿江城镇和产业布局；“一带一路”强调围绕“五通”，重点建设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立健全对外开放合作的有效体制机制。

（三）在时序上：同步推进与优先推进

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明确提出以来，四大地区都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配套出台了各自的区域政策，在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承担着各自的职能分工和定位。“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并对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的继续推进分别明确重点，要求各板块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战略”属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部署中的优先突破性安排，需要集聚各类优势资源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在探索人口和产业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为全国其他类似地区提供借鉴和示范；长江经济带发展力图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前提下，统筹沿江东中西、上中下游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建立沿江交通走廊、产业廊道和城镇轴带，促进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带；“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我国劳务、技术和标准的输出，全面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构建优进优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四）在手段上：政策区与经济区

“四大地区”作为我国制定区域政策的基本单元，较好地履行了政策区的职能，对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存在区域范围偏大、区域内部差异性突出、区域政策针对性和精准性不强等突出问题，但在一定时期内“四大地区”仍然作为我国制定区域政策的主要单元，体现政府对于区域发展的引导和约束作用。“三大战略”尽管也是依托各级行政区进行推进，但是总的导向是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打破行政区划分割的壁垒，通过构建不同类型的经济区来促进战略的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依托首都二机场、曹妃甸、天津临港产业区等各类产业合作区，加强三地资金、技术和项目合作；长江经济带发展重点发挥上游生态产业园、上中游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各类功能区带动作用，促进上中下游地区间市场化合作；“一带一路”重点依托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各类开放合作区，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和支撑。

四、“四大地区”和“三大战略”协调互动的重点领域和举措

“四大地区”和“三大战略”的协调互动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同阶段面临的目标和任务各不相同，需要选准协调互动的重点领域和抓手，制定可操作、可持续的对策举措，集中资金和政策实现重点突破，并在部门联动、考核评估、动态调整等方面建立配套保障机制，实现我国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新格局。

（一）探索京津冀人口产业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东部率先发展的示范作用

针对京津冀地区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交通拥挤加剧、产业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严重等突出问题，加快消除行政分割的壁垒，建立高效的地区间分工协作机制，逐步形成跨省级行政区区域合作的有效模式和措施。结合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目标，着力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率先在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两个方面加强合作，提升京津冀一体化程度和宜居宜业质量。同时，在产业转移、园区共建、人才流动、社保接续等四个方面集中配套相关规划和政策，促进京津冀地区要素有序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及时总结京津冀地区跨省级行政区的合作模式和经验，特别是在解决“城市病”、超大或特大城市功能疏解、资源共享等方面为全国其他城市群和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借鉴，对于带动东部其他类似地区协同发展、持续推进东部率先战略、率先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建立健全长江流域上下游地区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强化长江经济带对于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区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结合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要求，从根本上保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落实，需要加快建立长江流域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规范和加大中央财政对于长江上游地区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重点保障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和基层政权运转。率先推进下游地区对于上游地区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建立综合考虑水量、水质、财政收入、人口规模等多种因素的补偿标准，促进形成包括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等多种形式的生态补偿方式。扩大生态产地标识、生态产品定价等市场化生态补偿方式，通过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生态补偿体系的构建，为我国建立江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也有利于打造长江沿江绿色生态廊道，不断缩小长江上下游地区发展差距，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协

调有序发展。

（三）制定不同省区“一带一路”差异化推进方案，不断提升“四大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

目前，全国各省区市相继制定“一带一路”实施和对接方案，并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中欧班列运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今后应立足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实际，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资源、产业等特色优势，妥善处理好沿线国家和线外国家、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等重大关系，切忌盲目攀比和一哄而上。沿海省区市要发挥沿海区位好和开放度高的优势，重点推进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加快建立战略性航运通道和港口支点，优化提升进出口贸易结构和对外投资结构，加快输出优势产能、标准和服务，促进建立境外市场营销网络。内陆各省区市要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对接合作，整合畅通中欧班列，优化提升中欧班列的货运结构和效益，保障沿线国家能源原材料的稳定供给，为我国优势产能和装备制造国际合作提供稳定市场需求。“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我国新时期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举措，将有力促进“四大地区”实现进出口贸易优进优出，优化“引进来”结构和布局，扩大“走出去”规模和效益，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四）强化西部开发的优先地位和东北振兴的突出地位，推进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协同联动

结合“十三五”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四大地区”和“三大战略”协调互动应继续将西部开发放在优先地位，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同时，立足问题导向，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东北地区经济继续下行，将东北振兴放在突出地位。目前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西部开发司、东北振兴司、基础产业司等负责“四大地区”“三大战略”有关的规划、政策制定和协调，地方各级政府也设立了相应的主管部门和机构，负责与国家有关部委的联系衔接。针对行政管理分散、政策交叉碎片化、协调联系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建立水平和垂直分工协作相结合的政府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确保“最先一公里”“中梗阻”“最后一公里”不同环节高效畅通。进一步明确发改部门作为牵头机构的核心职责和功能，强调国土、住建、环保等有关配合部门的重点职责和分工，提出产业、交通、社会、民政等其他政府部门的相应职责和分工，提高各类领导小组、部际联席会议等多种协同形式的运行效率，加快适应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新要求。

（五）完善“四大地区”对于“三大战略”的基础和支撑功能，促进区域协调互动的科学评估和动态调整

“四大地区”覆盖全部国土空间，自新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格局和政策体系。“三大战略”是我国“十三五”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出的重要应对举措，将在今后长时期影响我国的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今后应立足“四大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效、特征、问题和挑战，发挥基础支撑平台作用，因地因时制宜形成稳步推进“三大战略”的实施路径和模式。“四大地区”和“三大战略”的实施及协调互动涉及有关的规划、政策、项目、资金等实施成效，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目标和任务，需要针对战略实施的不同阶段进行全面评估或者专门评估，根据评估结论及时进行战略目标、重点任务的调整，保障区域协调互动可持续推进。加快建立科学可行的评估体系，重点突出区域差距变化、产业分工合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成效，确立区域间可量化、可对比、可持续的评估指标，形成综合客观、科学合理、简单可行的数理评估模型，促进支持评估的数据库、指标库、信息库的共建共享。推广应用遥感技术、卫星图片、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提高区域评估的精准度和可信度。鼓励第三方开展独立性评估，完善评估后及时调整机制，建立评估结果及时反馈、根据评估结论动态调整的灵活方式。

参考文献：

1. 孙久文、胡安俊主编：《区域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5 年版。
2. 李国红、单菁菁主编：《中国商务中心区发展报告 NO. 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编：《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研究报告 2015》，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4. 李国平等著：《产业转移与中国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5. 倪鹏飞主编：《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NO. 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责任编辑：沈家文

“十三五”时期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路与任务

姜 江 韩 祺

摘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过去五年，我国科技实力大幅上升，创新能力快速提高，创新理念深入人心，创新工作部署贯穿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但总体看，有重大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仍然偏少，与主要发达国家差距仍较大，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任重道远。迫切需要做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明确未来五年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和任务部署，完善激励创新的市场竞争环境，强化企业主导的协同创新机制，夯实创新驱动的科教人才基础，建立健全创新驱动导向的评价体系。

关键词：创新驱动 发展思路 改革举措

作者简介：姜 江，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 祺，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十二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这既是新形势下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贯穿“十二五”“十三五”乃至未来 10 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尽管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也依然面临比较突出的问题和制约，必须进一步明确发展的思路重点任务部署。

一、“十二五”时期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回顾

（一）科技实力大幅上升，但是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偏少

“十二五”时期，我国科技投入大幅增长，为创新驱动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其中，研发经费支出指标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从2010年的7062.6亿元增至2015年的14220亿元，实现翻番增长。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10年的1.73%上升至2015年的2.10%，与发达国家研发投入强度3%~4%的水平相比，差距进一步缩小（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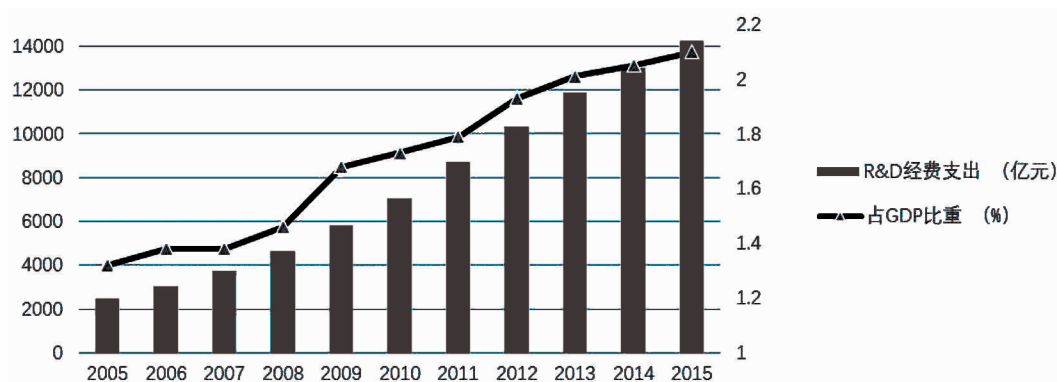


图1 2005—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及其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企业对研发投入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有助“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企业支出研发经费增速水平持续高于政府所办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增速水平。2014年，企业支出研发经费总计10060.6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增速分别比政府办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高出2.8个和6.1个百分点，较2010年实现翻番增长，年均复合增速远高于政府办科研院校研发投入增速。企业对全社会研发经费增长的贡献为84.2%，较2010年的71.4%提高了12.8个百分点，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夯实。

此外，表征我国科技实力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高水平论文引用数、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技术市场成交额等指标均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其中，发明专利授权数由2010年的135110件增至2014年的233228件，年增速达14.6%，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9件，比2010年增加2.8件；中国科学家发表的国际论文稳居世界的第2位，被引用总次数国际排名从第8位上升到第4位；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由4924亿元增至6605亿元，年增速7.6%；技术市场交易额由3907亿元升至8577亿元，增长了1.195倍（表1）。这些都为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储备了诸多有利条件。值得注意的是，除高速铁路、特高压输电、北斗导航等以外，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表现出引领态势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等重点领域中，属于我国原创的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仍偏少。

表 1 2005—2014 年我国科技活动基本情况

	发明专利（件）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 （亿美元）	技术市场成交额 （亿元）
2005	53305	2182	1551
2006	57786	2815	1818
2007	67948	3478	2227
2008	93706	4156	2665
2009	128489	3769	3039
2010	135110	4924	3907
2011	172113	5488	4764
2012	217105	6012	6437
2013	207688	6603	7469
2014	233228	6605	8577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5》。

（二）创新能力快速提高，但与主要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创新指数研究》课题组测算，2014 年中国创新指数为 158.2（以 2005 年为 100），较 2010 年增长 20%。其中，创新环境指数、创新投入指数、创新产出指数和创新成效指数分别为 155.2、157.8、177.2 和 142.2，分别比 2010 年增长 18.5%、19.3%、29.2%和 12.7%。表明我国创新环境持续优化，创新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创新产出能力明显提高，创新成效进一步显现。^①

从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创新绩效国际排名情况看，尽管“十二五”时期我国创新能力快速提高，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5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② 为例，中国创新能力排名仅为 29 位，较 2010 年排名第 43 位有显著提升。其中，排名比较靠前的指标是：阅读、数学和科学平均水平，排在第 1 位；国内专利申请量，排在第 1 位；1996—2013 年高引用文章指数，排在第 16 位；劳动生产率增长

^① 国家统计局：《2014 年中国创新指数为 158.2》，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12/t20151229_1297321.html。

^② Johhson 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WIPO.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5, Effective Innovation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

率（PPP），排在第1位；高技术和中技术制造出口占制造业比重，排在第15位；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排在第4位；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排在第17位；企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排在第3位；企业提供的培训比重，排在第1位；高技术进口比重，排在第8位。排名靠后的指标的是：保护投资者的程度，排在第114位；支付税收的容易程度，排在第94位；创办企业的容易程度，排在第105位；企业裁员的成本，排在第118位。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创新联盟记分板 2015》^①指出，2010年以来，中国创新绩效正在加速赶超欧盟，特别是在青年博士毕业生数量和研发投入力度方面的指标已全面领先欧盟。在海外许可和专利收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国际科学合作、专利申请和高等教育等方面，仍然显著低于欧盟，但这个差距已经越来越小。

根据《美国科学工程学指标 2016》^②统计显示，我国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从2010年的7.0%上升至2014年的10.3%，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大国，但与美国（32.1%）的差距依然较大；三方专利拥有量占世界的比重从2010年的2.9%上升至2012年的3.6%，但仍然仅为日本的12%，美国的13%，德国的34%；知识产权许可费国际收支大幅增长，2013年达到138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近6成，但总量仍仅为美国的13%，日本的44%。

（三）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提高，但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任重道远

从全要素生产率看，按照传统不包含知识资本的算法，我国（狭义）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程度呈下降趋势。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③2002—2008年，在我国平均11.0%的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贡献6.4、0.4和4.2个百分点，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比例为58.6:3.2:38.2；而2009—2013年，这一比例调整为76.8:2.3:20.9，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显著降低。中国社科院数量及技术经济研究所运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法测算的相关数据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较快下行，国家为稳增长采取大规模投资计划，“强资本投入”并未遏制中国经济下行态势，反而使得经济带有明显的“粗放”特征。

按照最新将研发贡献计入生产率的算法，将知识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R&D资本）

^①UNU—MERIT. 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 2015. http://ec.europa.eu/growth/industry/innovation/facts-figures/scoreboards/index_en.htm.

^②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 <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16/>.

^③祝宝良：《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潜力测算》，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内部报告。

引入总量生产函数来测算广义技术进步以及各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可以认为，在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研发投入不断加大的支撑下，（广义）技术进步贡献率总体维持较高水平（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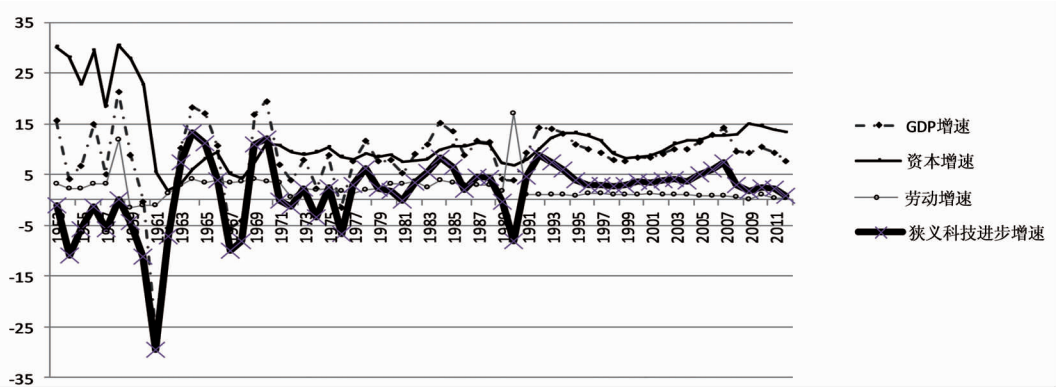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 GDP、资本存量、劳动人口增速和狭义科技进步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有研究整理而得。

表 2 1979—2012 年中国（广义）科技进步贡献率（%）

年份	科技进步贡献率	年份	科技进步贡献率
1979	28.5	1996	29.0
1980	21.4	1997	29.9
1981	-2.7	1998	33.2
1982	36.6	1999	39.4
1983	50.4	2000	44.6
1984	54.7	2001	39.7
1985	46.9	2002	41.8
1986	22.9	2003	40.2
1987	37.8	2004	36.9
1988	37.5	2005	44.4
1989	-13.2	2006	47.6
1990	-211.8	2007	52.4
1991	50.0	2008	43.1
1992	60.9	2009	43.2
1993	52.5	2010	44.3
1994	45.8	2011	46.7
1995	34.9	2012	47.9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有研究整理而得。

（四）创新理念深入人心，创新驱动发展的工作部署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在“十二五”期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大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先后制定实施《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直面当前制约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体制机制问题，详述了9章30条的重点任务和改革部署；修订颁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将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下放给具有法人资格的科研事业单位，明确规定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中科技人员提取劳务费的比例不低于50%；出台《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进一步推动资金链引导创业创新链、创业创新链支持产业链、产业链带动就业链。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5月至今，国家层面已经出台30余份相关文件促进创业创新（表3）。

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发表了重要讲话。2015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讲话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2015年10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的启动仪式上指出，“要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结构性改革激发全社会创造力，打造发展新引擎”。2016年1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专题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眼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结合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推动各类企业注重技术创新、生产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创造新的有效供给，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升级”。

无论从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还是领导人讲话中，都可以看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当前的国家战略，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和重要地位也一再被强调。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随着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业界学界纷纷响应，各种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有效激发了社会活力，释放了巨大创造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这也意味着中国开始走上全面创新之路，创新发展将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的关键驱动因素，是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全面发展的根本支撑和关键动力。

表 3 促进创新创业的主要政策

政策公布时间	政策名称	政策文号
2013 年 5 月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3〕4 号
2014 年 2 月	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4〕7 号
2014 年 7 月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20 号
2014 年 10 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49 号
2014 年 11 月	国务院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4〕52 号
2014 年 11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14〕54 号
2014 年 11 月	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4〕60 号
2015 年 1 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4〕64 号
2015 年 1 月	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	国发〔2014〕70 号
2015 年 3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9 号
2015 年 5 月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5〕23 号
2015 年 5 月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	国发〔2015〕24 号
2015 年 5 月	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	国发〔2015〕25 号
2015 年 5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15〕36 号
2015 年 5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41 号
2015 年 5 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5〕42 号
2015 年 6 月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发〔2015〕32 号
2015 年 6 月	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5〕33 号
2015 年 6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46 号
2015 年 6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	国办发〔2015〕47 号
2015 年 6 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银监会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5〕49 号
2015 年 6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	国办发〔2015〕50 号
2015 年 7 月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5〕40 号
2015 年 7 月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5〕41 号
2015 年 9 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5〕53 号
2015 年 10 月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取消 62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5〕57 号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而得。

二、“十三五”乃至未来 10 年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大改革举措

“十三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将发生深刻变化。以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加速发展，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深刻影响并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类交流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亟需依靠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构建我国竞争新优势，开辟经济社会发展新空间。

未来 10 年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必须要正视我国创新驱动发展中还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重点解决创新的主体、动力、重点领域和市场环境等问题，按照“制度优先、重点明确、各归其位、分步实施”的原则，做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下决心强化“倒逼”机制和“动力”机制。争取到 2020 年，在知识产权保护、垄断行业改革等重点方面取得明显突破，扶持一批创新能力强的骨干企业，让创新者真正看到希望；再用五年时间，争取构建有利于创新驱动的制度框架，使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具备相当的原始创新能力，到 2030 年基本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当前，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应着眼于以下 4 个方面，重点推进 15 条重大改革举措。

（一）完善激励创新的市场竞争环境

激烈与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激励企业孜孜不倦于创新的原动力。为此，要全面打破行业垄断，抑制区域市场分割，加快形成有利于激发创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产业准入和监管政策。

1. 加强垄断行业监管，打破地区封锁

当前，我国仍存在诸多不利于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现象。例如，一些垄断性企业通过纵向垂直整合抑制上下游中小企业进入和发展。再如，可再生能源发电、医疗器械、药品招标等部分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地区保护行为，等等。为此，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力度，有效防范通过并购获取垄断地位并损害市场竞争的行为。细化自然垄断行业监管的有关规定和执行办法，对属于不当进入范围的行为要限期剥离等。另一方面，要打破地区封锁，明确界定属于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地区保护行为和范围，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规定和做法，加大对地区保护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快形成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拓宽发展空间。

2. 加快形成激发创新的价格形成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偏低，不仅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压力增大、人地关系紧张等问题，给落后产能留下生存空间，也阻碍了新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抑制企业对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制度创新的追求。为此，一是要逐步将资源开发、转化、运输和利用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温室气体减排等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建立反映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的资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二是要建立“污染者支付高额费用”的制度，进一步对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提高建设用地补偿标准。三是要持续加强劳动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和有关机构对各地区落实最新最低工资、劳保制度的监督检查，完善针对创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

3.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到位，集中体现为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国家知识产权局一项针对近 4000 余件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案件的研究显示，97%以上的专利和商标侵权案件和 79%以上的著作权侵权案件由于难以证明实际损失和违法所得，被迫采用法定赔偿方式判赔，而最终赔偿数额往往远低于实际损失。此外，商业秘密保护法律体系缺失问题也长期掣肘企业创新。事实上，企业的创新成果，只有少数能够申请专利保护，多数成果是以商业秘密的形式出现（又被称作 knowhow），比如新配方、新工艺、技术资料、图纸、企业客户资源等。据部分遭遇过商业秘密侵犯的公司反映，举证困难、审理周期长、违法边界不清等，使得受害企业难以获得及时有力的法律保护。为此，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违法侵权打击力度；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刑事立法，加大对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处罚力度；针对侵犯知识产权产品生产源头、产品集散较为集中的重点地区，建立定期督查和信息通报机制，加大对重大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曝光和宣传力度。此外，应切实强化商业秘密保护，改变现存分散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整合现有司法资源，明确界定商业秘密以及侵权行为的认定及量刑标准。切实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法律与我国刑法、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衔接。

4. 改革产业准入和监管，向普惠性竞争性产业政策转型

过去，我国政府相关机构对产业的扶持或管理手段更侧重于从市场准入环节切入，存在“上大压小”的规模导向。但是，在产品质量和安全引导、节能减排导向等事后监管方面执行力不足，严重滞后于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迫切要求。大量实践证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选运动员”式的产业管理方式效率会逐步减弱，必须以建立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目标，从以下两个方面强化市场竞争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倒逼作用。一方面，要加快改革产业准入和监管制度，将前置审批为主变为技

术政策和法规监管为主。继续深化行政审批、核准、备案制度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核准程序，进一步提高审批、核准效率。对产业准入环节的管理从目前的项目前置审批方式转变为针对产品质量安全、节能减排等指标进行严格审查管理的事中监管方式。另一方面，加快对生产环节的环境指标、能耗水耗指标、安全指标等建立约束性指标考核机制，对未达标的生产经营者通过法律、行政监管手段等施以严惩。建立适应国际竞争趋势的国家强制性质量和技术标准体系，强化标准执行力。

（二）强化企业主导的协同创新机制

企业是创新的发动机。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往往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促进创新经济繁荣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应进一步发挥企业在重大科技攻关、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活动中的作用，促进企业成为支撑科技成果转化、成果转化的关键纽带，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打造有利于产学研用密切合作的创新平台。

1. 提升企业在重大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地位

建立政府企业间的对话平台和常规咨询制度，是国际通行做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我国企业家很少参与到科技和创新决策过程中，国家科技规划、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的专家、技术人员往往来自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选择优先技术发展领域特别是项目技术路线时，往往更多地追求技术指标先进性，对市场适用技术的开发需求考虑不足。为此，要加快建立国家科技和创新决策咨询制度。探索在相关政府部门设立首席科学家和咨询委员会，为各部门的创新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明确企业人员参与咨询委员会的人员比例不低于 50%，确保企业的科技和创新需求能够得到真实反映。此外，在编制科技、产业规划及创新项目申报指南时，起草组和专家咨询组中都应该吸纳一定比例的企业专家参与。同时在科技规划和项目申报指南发布前，应该充分和公开地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的意见，以更好地反映市场对技术发展的需求。

2. 构建企业牵头的协同创新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经费配置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创新平台和科技人才都远离企业，不仅导致科研成果偏离产业化实际需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还使得龙头企业、旗舰企业难以发挥产业创新骨干和纽带的作用，不利于产业技术水平和国家创新资源投入产出效率的整体提升。一方面，今后需将有明确产业化目标的科技计划更多交由企业主导。对于面向重大战略产品或大型工程的计划，更多地采取政府补贴、贷款、融资等多元化投入方式，让企业成为创新资源配置的主体。改革先研发、后产业化的研发模式，把企业需

求作为技术创新项目的来源，对没有企业用户的项目不予立项。另一方面，建议推动实施“创新企业百强工程试点”，鼓励试点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兼并重组科技型企业、牵头组建产业技术联盟、成立专利池和向上下游企业许可专利技术等，建立上下游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创新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的协同创新链条，带动产业走创新发展道路。

3. 加大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支持

融资难、融资贵是阻碍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可以考虑通过以下手段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扶持，包括：继续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计划，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进一步完善创业投资的税收激励政策，扩大税收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研究降低关于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限制。对投资种子期、初创期创新活动给予特殊税收减免。进一步增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融资功能。强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并购功能。在条件具备的地区探索向中小企业发放“创新券”，适时向全国推广鼓励和支持企业购买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及服务，逐步扩大创新券试点。此外，要加快推进创业孵化、知识产权服务、第三方检测机构等的专业化、市场化改革，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4. 打造产学研用紧密合作的创新平台

过去，为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强产业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国家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先后布局建设了近 400 家重点（企业）实验室、470 多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40 多家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这些都为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但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发展新趋势，我国传统创新平台比较分散的布局模式、不适应市场需求、缺乏超前规划、协同不够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此，要密切对接新一轮产业变革，在部分战略性、新兴的产业领域，围绕构建产业链和技术创新链，探索以企业主导、院校协作、多元投资、军民融合、成果分享的新模式，组建若干国家产业创新中心，集聚相关创新资源，建立更加广泛的产学研用结合新机制。还要积极构建创新网络，探索建立现有重点（企业）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的开放共享创新网络，打破领域、行业和区域分割，推进建立相互联动的协同创新机制，有效整合利用各类创新资源，真正发挥创新平台的应有作用。此外，在部署重大科技项目方面，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探索依托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和创新网络进行组织实施的新机制、新模式，真正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三）夯实创新驱动的科教人才基础

创新人才是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中坚力量。要针对长

期以来制约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流动、应用的关键问题，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科研人员双向流动，积极吸引海外人才和高学历人才到企业发展，改革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导向机制。

1. 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创新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匮乏是我国人才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教育受传统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竞争等方面影响，以应试教育为主，脱离社会实际比较严重；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窃取抄袭现象频现。社会上缺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创新意识普遍淡薄。与美、英、日、德等国提倡素质教育，重视哲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培养，多用辩论式和实验式教学，创新文化盛行等做法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为此，一是要继续推行素质教育。把教学建设和“创新教育”办学理念相结合，在教育思路、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教育环境、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要体现素质教育的内涵。二是要结合项目和重大工程培养研究生。建立以高校或科研院所为主导，同生产紧密结合的联合教学体，拓宽教学环节，加强社会实践环节。三是要建立多元化、多规格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快推进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打通中职、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的通道。

2. 鼓励科研人才双向流动

在国外，科技人才在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频繁流动的现象比较普遍。而我国，企业的科技人才很难再走进高校和院所、事业单位，后者的人才一旦走向企业，也很难再回到“体制内”。阻碍人才双向流动的障碍主要来自制度方面，包括高校和科研院所采取的职称评定制度，“行政化”“编制身份”制度等，使得企业的人才在高校很难获得相应的职称认可及岗位待遇。此外，社会保障体系“双轨制”，也使得“体制内”人才一旦流向企业就再难享受国家养老、医疗，甚至还要面临多年未缴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断档”的问题。为此，要加快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加快高校和科研单位“去行政化”改革，加快实行评聘结合制度，取消行政级别和编制限制。改革事业单位职称评定制度，鼓励其引进经验丰富的企业优秀科技人才；允许事业单位的科技人才到企业去兼职，鼓励其“下海”创业。改进专家教授薪酬和岗位管理制度，允许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或创办企业。逐步消除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方面的差别，清除流动障碍。

3. 大力吸引海外人才和高学历人才到企业发展

吸引海外人才是集聚全球创新要素的重要内容。但目前我国在吸引外籍人才方面还

面临办理签证难、审批周期长、要求多以及外籍人士在华创业审批难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未来一段时期，建议加快放松外籍高端人才办理签证的管制，尽快制订并出台《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草案）》。积极开展外籍高层次人才创业试点，允许持有“绿卡”的外籍高层次人才投资创办科技型企业，享受与中国公民同等的待遇。同时，要鼓励企业大力吸引博士研究生等高学历人才。针对当前企业缺乏高水平的研发活动、给予高学历人才薪酬偏低等情况，力争更多的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在企业，支持企业牵头国家科技项目，以提高企业对博士研究生的吸引力。引导地方财政对企业引进博士研究生给予一定时限的生活补贴。

4. 建立健全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导向机制

总体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科技成果处置权限受限，二是高校、科研院所转化科技成果的动力不足。基于上述原因，首先，要加快明确各类科技成果的使用、处置和收益权限。加快在全国范围内授予事业单位可转化科技成果的完整权属，取消对大学、国有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科技成果等非经营性资产划转为经营性资产的规模限制。借鉴美国拜度法案，逐步建立我国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强制”转化制度。其次，要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收益比例。进一步上调高校、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入股奖励比例下限，对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研机构 and 高等学校，职务发明成果转让净收入用于奖励重要贡献人员的比例，从现行不低于 20% 提高到不低于 50%。明确职务发明人的权利归属及义务、职务发明人奖励报酬制度及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进一步规范职务发明奖励的约定内容、约定方式和约定程序，鼓励支付方式创新。完善有关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制度。此外，要进一步拓宽创新成果利益分享渠道。

（四）健全创新驱动导向的评价体系

1. 现有经济绩效考评指标体系不能反映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情况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现行 GDP 核算办法不能适应新的趋势需要。近期，美国已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式作了修正，将企业、政府、非盈利机构的研发费用支出视作固定资产投资，娱乐、文学、艺术等创意产业也纳入投资统计。欧洲部分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作法。基于此，我国也要根据国际形势对 GDP 核算方法进行修正，更多体现创新价值。二是国有企业仍然主要实行“保值增值”的考核机制，不能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现行考核体系下，国有企业高管对创造近期业绩有迫切需求。迫于任职期限和考核要求，不愿意对风险大、周期长的创新活动投入资源和精力。三是地方政府总体仍然采取以 GDP 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地方政府依赖高投资追

求GDP高增长的强烈冲动，对创新重视不够。GDP导向的评价机制，引导地方将大量资源投向短期快速提高产值的资源密集、资本密集、污染严重的重化工，对需要持续投入、长远见效的创新工作重视不足。

2. 我国亟需建立考评创新驱动发展情况的指标体系

我国经济分析和考核过于看重规模和总量指标，对效率指标重视不够。从国际经验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评价对比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竞争力中，都越来越重视创新投入、产出对一国综合实力的影响。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欧盟、世界知识产权委员会（WIPO）等在内的若干国际权威机构都开始建立衡量各国创新实力的指标和统计发布机制。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出了“美国科学工程技术指标”，欧盟提出了“全球创新记分牌”“欧元区创新记分牌系统”等，世界知识产权委员会提出了“全球创新指数系统”等等。这些评价指标、测评方案往往从有关表征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研发投入、知识资产、企业投资、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活动等多个维度设计指标体系，并采用对各个子指标数值赋予权重的方法加以比较。

3. 建立创新驱动发展评价指标的初步考虑

一方面，要加快调整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方法。充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将研究与开发支出以及娱乐、文学和艺术品原件支出等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GDP的核算办法，加快研究制订形成我国新的GDP核算办法和统计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加快研究建立创新驱动发展评价指标。如前述，新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要强化对全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知识产权等体现经济质量、技术先进性等指标的评价，并及时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及其领导干部的业绩考评中纳入新的指标考核体系。

参考文献：

1. 王昌林：《进一步理清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思路》，《全球化》2014年第11期。
2. 王昌林、姜江、盛朝讯等：《大国崛起与科技创新——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经验与启示》，《全球化》2015年第9期。
3. House T W.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 Leading the World in Innovation. *White House*, 2006: 27.
4. Wansch – Vincent, Duttas, Lanvin B.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5 – Effective Innovation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http://www.wipo.int>.
5.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6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经济 ·

2015 年度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

亚洲竞争力评估课题组^①

摘要：为更好地发现和评估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竞争力的差距，最终促进亚洲各经济体经济、社会、政府机构的全面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制开发了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指数。根据这一指数，2015 年度亚太经济体竞争力排名结果为：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分列第 1~4 位；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以色列，分别位列第 5~8 位；中国的综合排名与上一年度排名持平，在亚太经济体中仍位列第 9。整体来看，亚洲经济体之间的排名保持总体稳定。

关键词：亚洲 经济体 竞争力评估

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也必须依靠竞争才能发展。从世界范围内看，亚洲各经济体表现出相对的综合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上，还体现在基础设施能力、社会发展水平等多个维度上。相比较而言，亚洲各经济体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综合竞争力有较大差别。评价分析区域各经济体的竞争力，不仅要考虑经济体现有的发展基础，还要考虑其今后的发展潜力，也不能仅停留在经济实力层面。可见，准确客观评价经济体综合竞争力有相当难度，需要较为科学合理地权衡各方利弊，并综合考量。

^①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研究成果。课程组成员有：王军、黄志龙、徐长春、刘向东、张焕波。

一、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指数介绍

（一）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目的及评估对象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主要经济体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之中，亚洲各经济体是否仍然保持良好的竞争活力，是否还能在商业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状况、社会发展水平及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方面进一步有所改善，备受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瞩目。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从 2011 年开始，连续 6 年对亚洲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评价分析，以期掌握各个经济体的综合竞争力动态变化。

表 1 亚洲经济体竞争力 2015 年度评估对象（按英文字母顺序）

序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序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	Armenia	亚美尼亚	20	Malaysia	马来西亚
2	Australia	澳大利亚	21	Mongolia	蒙古
3	Azerbaijan	阿塞拜疆	22	Nepal	尼泊尔
4	Bahrain	巴林	23	New Zealand	新西兰
5	Bangladesh	孟加拉国	24	Oman	阿曼
6	Cambodia	柬埔寨	25	Pakistan	巴基斯坦
7	China	中国	26	The Philippines	菲律宾
8	Georgia	格鲁吉亚	27	Qatar	卡塔尔
9	China Hong Kong	中国香港	28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10	India	印度	29	Singapore	新加坡
11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30	Sri Lanka	斯里兰卡
12	Iran	伊朗	31	China Taiwan	中国台湾
13	Israel	以色列	32	Tajikistan	塔吉克斯坦
14	Japan	日本	33	Thailand	泰国
15	Jordan	约旦	34	Tomor – Leste	东帝汶
16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	35	Turkey	土耳其
17	Korea, REP	韩国	36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联酋
18	Kuwait	科威特	37	Vietnam	越南
19	Kyrgyz Republic	吉尔吉斯斯坦			

从地理区划上讲，亚洲共有 48 个国家，加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三个地区，共有 51 个经济体。由于其中 16 个经济体诸如中国澳门、阿富汗、朝鲜、文莱、缅

甸、马尔代夫、黎巴嫩、巴勒斯坦、老挝、伊拉克、不丹、也门、塞浦路斯、叙利亚、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规模较小或者历史数据难以获得，暂时没有包含在现有评价体系之中。考虑到亚洲与大洋洲经济圈越来越紧密，我们在评估对象中增加了大洋洲的两个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终评估对象增加到 37 个经济体。因此，我们的评估主要是跟踪分析亚洲 37 个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变化，以此诊断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状况，以便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做出预判，分析它们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所做出的进步表现。

（二）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指数介绍

第一，指数构成。亚洲经济体竞争力综合评估指数由五个维度构成，即商业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状况、整体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五个方面。综合评估指数主要用于评价亚太地区 37 个主要经济体未来竞争力状况，描述 37 个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力地位，从而为各国政府、企业和组织找出与标杆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明确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政府等领域改进的方向。具体而言，亚洲竞争力评估指数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综合判断各经济体在亚洲区域总体竞争力排名情况；二是进一步判断各经济体经济、社会、政府等领域发展的结构性差异；三是纵向跟踪各经济体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程度及其前后变化情况。

第二，功能与作用。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指数的功能和作用是发现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各经济体经济、社会、政府机构的全面发展。该评估模型所用到的基础数据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有关各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数据，世界经济论坛等权威机构调查数据，以及有形市场数据库。该评估模型从商业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状况、整体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等五个维度，分项检验判断亚洲经济体各项指标的竞争力状况，然后采用加权平均计算方法获得评估指数，依此判断亚洲主要经济体综合竞争力的排名状况，提供有价值的综合性信息。

（三）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指标介绍

在评估指标体系设计上，我们选择了最能反映经济体竞争力状况的硬指标，尽量避免使用容易引起偏差的问卷调查指标。同时还设定了背景指标集，其中基础背景指标集有 2 个初始指标，主要包括各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GDP）和各经济体经济总量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份额。设定权重使用的基础背景指标集包括 GDP、总人口数、人均 GDP 和 GDP 占全球份额 4 个指标。其中，GDP 指标反映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总人口

数指标用于求解人均类指标，是反映人力资本的基数；人均 GDP 反映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用来区分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GDP 占全球份额说明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用于计算该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具体讲，亚洲经济体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指标集可以划分为五大类，每类分别有数量不等的初始指标（见表 2）。其中，商业行政效率指标集有 4 个初始指标，基础设施状况指标集有 11 个初始指标，整体经济实力指标集有 14 个初始指标，社会发展水平指标集有 10 个初始指标，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指标集有 5 个初始指标，加上设定权重使用的背景指标（有 1 个指标重复），累计共有 47 个初始指标。

表 2 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构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初始指标
商业行政效率（4）	企业开办效率（3）	企业开办审批程序数 企业开办批复时间 企业开办申请成本
	商业服务效率（1）	商业合同执行程序数
基础设施状况（11）	交通设施（2）	航班座位数 公路密度（公里/100 平方公里）
	通信设施（2）	固定电话（用户量/百人） 移动电话（用户量/百人）
	互联网设施（4）	个人电脑普及率 网民人数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网络速度
	电力设施（1）	人均发电量
	供水设施（2）	污水处理服务 安全饮用水
整体经济实力（14）	经济贡献指数（2）	GDP/全球 GDP GDP 增长率
	经济健康指数（5）	政府预算平衡/GDP 通货膨胀率 总税负/GDP 失业率

续表 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初始指标
	对外经济 (3)	政府债务/GDP 关税税率 进口额/GDP 出口额/GDP
	产业结构 (2)	服务业增加值/GDP 工业增加值/GDP
	金融环境 (2)	存贷款利差 国民储蓄率
社会发展水平 (10)	健康 (4)	结核病发病率 艾滋病发病率 婴儿死亡率 预期寿命
	医疗 (2)	外科医生数/1, 000 人 医院床位数/10, 000 人
	教育 (3)	初等教育入学率 中等教育入学率 女性就业率
	安全 (1)	交通事故发生率
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 (5)	人力资本 (2)	高等教育入学率 公共教育支出
	创新能力 (3)	国际专利授权数/1, 000, 000 人 创意产业出口 高科技产业出口

二、亚洲经济体竞争力 2015 年度评估总排名及分项排名

(一) 综合竞争力

与 2014 年度相比，亚洲经济体 2015 年度综合竞争力排名除个别经济体出现变动外，多数经济体综合竞争力排名没有变化。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综合竞争力仍保持在亚洲的前列，分别位列前 4 位，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以色列、中国、巴林

继续位列第 5~10 位。与以往年度不同，2015 年度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与 2014 年度有高度的一致性，尤其是前 10 名的排位基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意味着在没有突发事件的影响下，这些经济体凭借长期积累的存量优势，使其综合竞争力始终维持在亚洲的相对位置。卡塔尔的综合竞争力排在第 11 位，较 2014 年度提升了 3 个位次，马来西亚却下降了 4 个位次，仅位列第 15 位。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沙特综合竞争力排在第 12~14 位，其中前两个经济体守住了 2014 年度的位次，而沙特的排名较上年度提升了 1 位。排在 16~24 位的经济体分别是阿联酋、阿曼、格鲁吉亚、泰国、土耳其、阿塞拜疆、越南、亚美尼亚、约旦，与 2014 年度相比，只有阿曼和格鲁吉亚调换了位次，其余经济体维持原有排名不变。紧随其后的是蒙古、印度、菲律宾三个国家，分列在第 25~27 位，其中蒙古较上年度提升了 2 个名次，菲律宾提升了 1 个名次，而印度提升幅度最大，较上年度提高了 6 个位次。相应的是，吉尔吉斯斯坦、斯里兰卡、印尼和孟加拉国分别较上年度下降了 3、3、2、1 个位次，分列第 28 位、第 29 位、第 31 位和第 32 位。伊朗继续维持在第 30 位。尼泊尔、东帝汶、巴基斯坦纷纷较上年度提升了 1 个位次，分列第 33~35 位。而塔吉克斯坦却下降了 3 个位次，已跌至 37 个经济体中的倒数第 2 位。柬埔寨的综合竞争力仍位于 37 个经济体中的末尾，这与以往年度的排名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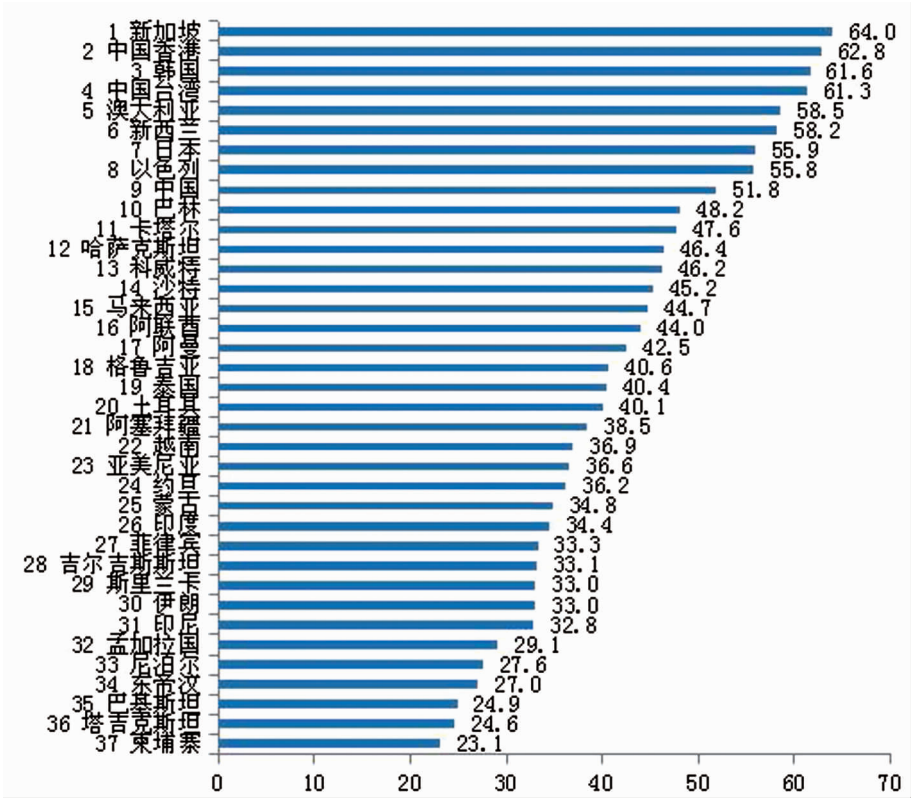


图 1 亚洲经济体 2015 年度综合竞争力指数排名

表 3 亚洲经济体竞争力 2014 年度综合评估指数排名表

经济体	2015		2014		2013		经济体	2015		2014		2013	
	排名	变化	排名	变化	排名	变化		排名	变化	排名	变化	排名	变化
新加坡	1	0	1	0	1	+1	阿塞拜疆	21	0	21	0	21	+1
中国香港	2	0	2	+1	3	-2	越南	22	0	22	0	22	+1
韩国	3	0	3	-1	2	+2	亚美尼亚	23	0	23	+1	24	+1
中国台湾	4	0	4	0	4	-1	约旦	24	0	24	-1	23	-2
澳大利亚	5	0	5	+1	6	-1	蒙古	25	+2	27	+2	29	-2
新西兰	6	0	6	-1	5	+3	印度	26	+6	32	+1	33	-3
日本	7	0	7	0	7	+2	菲律宾	27	+1	28	0	28	-2
以色列	8	0	8	0	8	+2	吉尔吉斯斯坦	28	-3	25	+1	26	+5
中国	9	0	9	0	9	+1	斯里兰卡	29	-3	26	-1	25	+4
巴林	10	0	10	0	10	-3	伊朗	30	0	30	-3	27	+1
卡塔尔	11	+3	14	0	14	-2	印度尼西亚	31	-2	29	+1	30	-6
哈萨克斯坦	12	0	12	0	12	+3	孟加拉国	32	-1	31	0	31	+2
科威特	13	0	13	0	13	0	尼泊尔	33	+1	34	+1	35	-3
沙特	14	+1	15	+1	16	-2	东帝汶	34	+1	35	-1	34	+2
马来西亚	15	-4	11	0	11	+5	巴基斯坦	35	+1	36	0	36	-2
阿联酋	16	0	16	-1	15	-9	塔吉克斯坦	36	-3	33	-1	32	+3
阿曼	17	+1	18	-1	17	0	柬埔寨	37	0	37	0	37	0
格鲁吉亚	18	-1	17	+1	18	+2							
泰国	19	0	19	0	19	0							
土耳其	20	0	20	0	20	-2							

（二）商业行政效率

新加坡、新西兰、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在营商环境综合竞争力方面继续保持在前 4 位（见图 2）。紧随其后位列第 5~10 位的经济体分别是马来西亚、格鲁吉亚、韩国、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阿塞拜疆，其中与 2014 年度相比，马来西亚和格鲁吉亚、韩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互换了位次，蒙古和阿塞拜疆仍维持在第 9 位和第 10 位。以色列、哈萨克斯坦、日本、泰国、亚美尼亚、中国台湾、土耳其、伊朗、塔吉克斯坦、约旦分列第 11~20 位，其中日本和伊朗分别较上年度提升了 4 位和 3 位，相反的是土耳其却再次下跌了 3 位，泰国相应也下降了 1 位。卡塔尔、阿曼、阿联酋、巴林、沙特、尼泊尔、斯里兰卡、

越南、孟加拉国和中国分列第 21~30 位；其中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较上年度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下降了 9 位和 7 位；中国在简政放权方面做出不懈努力，保持在第 30 位不变。巴基斯坦、印尼、印度、菲律宾、科威特、东帝汶和柬埔寨继续在该项排名中位列第 31~37 位，较上年度排位没有任何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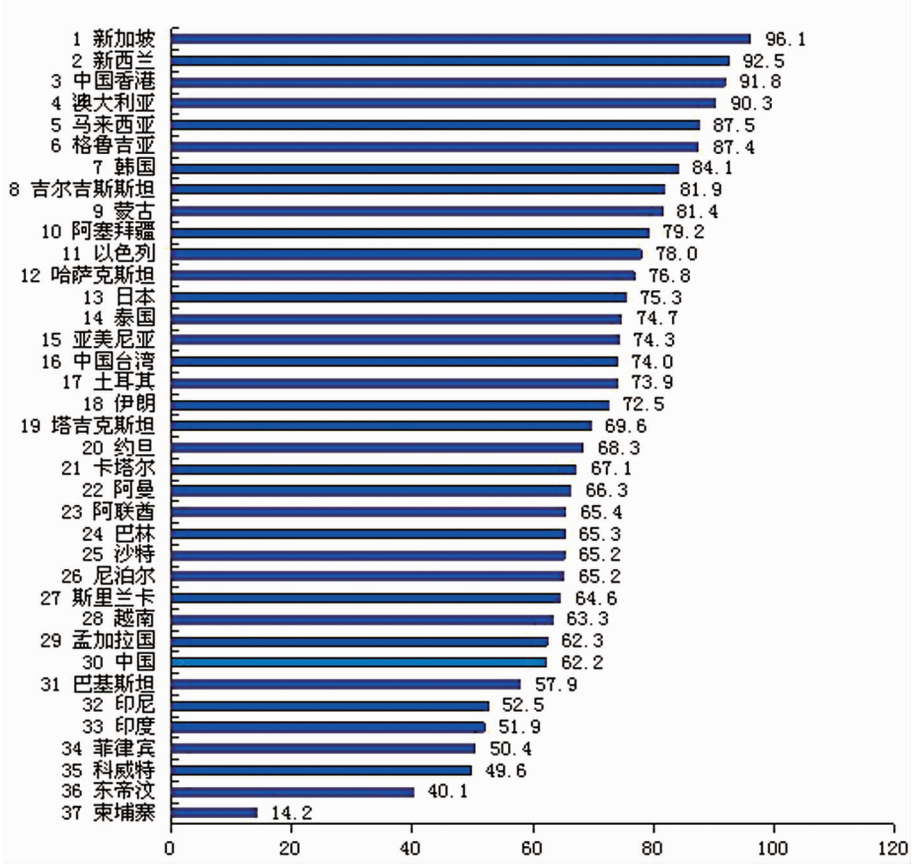


图 2 亚洲经济体 2014 年度商业行政效率指数排名

（三）基础设施状况

在基础设施水平上，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巴林、韩国、日本仍维持在前 6 位，基础设施生产率普遍较高。与 2014 年度相比，中国台湾提升了 2 位，超越巴林位居 37 个亚洲经济体基础设施能力的第 3 位，主要得益于在互联网设施接入使用方面的改善，尤其是互联网渗透率增幅较大。相比较而言，巴林和日本较上年度分别下降了 1 位和 2 位，而韩国却较上年度提升了 1 位（见图 3）。澳大利亚、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新西兰、以色列、沙特等国家持续保持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分别位列第 7~13 位，其中澳大利亚较上年度提升了 2 位，超越了卡塔尔和科威特位居第 7 位，其余经济体的位次没有发生变化。中国因公路密度提升、互联网带宽提速等设施改善，已由上年度的第 17 位攀升至第 14 位，超过了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阿曼，其中哈萨克斯坦、阿曼紧随中国之

后，而马来西亚排在第 18 位，被土耳其超过，土耳其较上年度提升了 1 位。约旦位列第 19 位，较上年度提升了 4 位。位列第 20~25 位的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泰国、伊朗、阿塞拜疆、越南，其中格鲁吉亚较上年度下降了 2 位，泰国下降了 1 位，亚美尼亚、伊朗、阿塞拜疆和越南排位均没有变化。菲律宾、斯里兰卡、吉尔吉斯斯坦、印度、蒙古和印尼分列第 26~31 位，其中菲律宾与印度较 2014 年度都提升了 2 位，而印尼下降了 2 位，斯里兰卡和吉尔吉斯斯坦均下降了 1 位。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柬埔寨、塔吉克斯坦和东帝汶分列第 32~37 位，其中塔吉克斯坦较上年度下降了 4 位，而巴基斯坦提升了 2 位，尼泊尔和柬埔寨各提升 1 位，孟加拉国和东帝汶的排名没有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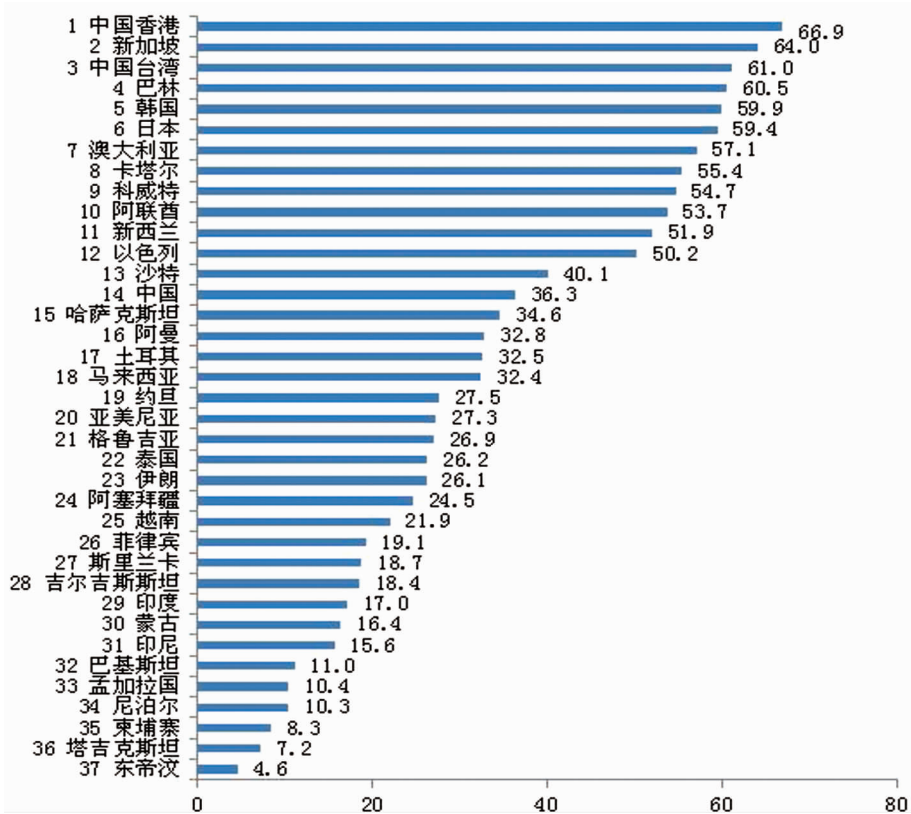


图 3 亚洲经济体 2014 年度基础设施状况指数排名

（四）整体经济活力

从整体经济活跃度和运行健康程度看，排在前 5 位依然是经济活力比较高的中国、中国香港、科威特、阿联酋和新加坡（见图 4）。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但仍维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高。其余排在前 4 位的经济体尽管增速并不算高，但是在经济活力和健康程度方面表现稳定，维持住了上年度的排名。卡塔尔、韩国、沙特、巴林、阿曼、中国台湾和印度分列第 6~12 位。与上年度相比，卡塔尔与韩国、中国台湾和阿曼互换了位次，而印度则由 2014 年度的第 24 位攀升至了第 12 位，改善幅度较大，

主要得益于印度政府采取的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促使国内经济重返高增长轨道，极大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在保持总体经济活力的同时，经济运行风险有所降低，从而使其经济整体竞争力大幅提升。泰国、马来西亚、东帝汶、哈萨克斯坦、新西兰、以色列、澳大利亚、印尼、阿塞拜疆、越南分列第 13~22 位，其中哈萨克斯坦较上年度下降了 4 位，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较上年度分别下降了 2 位和 3 位，东帝汶较上年度提升了 2 位，而印尼、阿塞拜疆和越南经济竞争力有所提升，较上年度均提升了 1 位。格鲁吉亚、菲律宾、孟加拉国、约旦、斯里兰卡、日本、柬埔寨、土耳其分列第 23~30 位。与上年度相比，格鲁吉亚和菲律宾的经济竞争力下降了 2 位，日本和土耳其的经济表现仍旧不佳，分别下降了 3 位，约旦、柬埔寨、孟加拉国的经济表现尚可，三者较 2014 年度的经济竞争力分别提升了 4 位、2 位和 1 位。蒙古、亚美尼亚、尼泊尔、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分列第 31~37 位，其中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较上年度下降了 2 位，巴基斯坦的排名也下降了 1 位，塔吉克斯坦经济竞争力却较上年度下降了 1 位，位列 37 个经济体经济竞争力的末尾。相反的是，亚美尼亚较上年度提升了 3 位，伊朗的排名也上升了 1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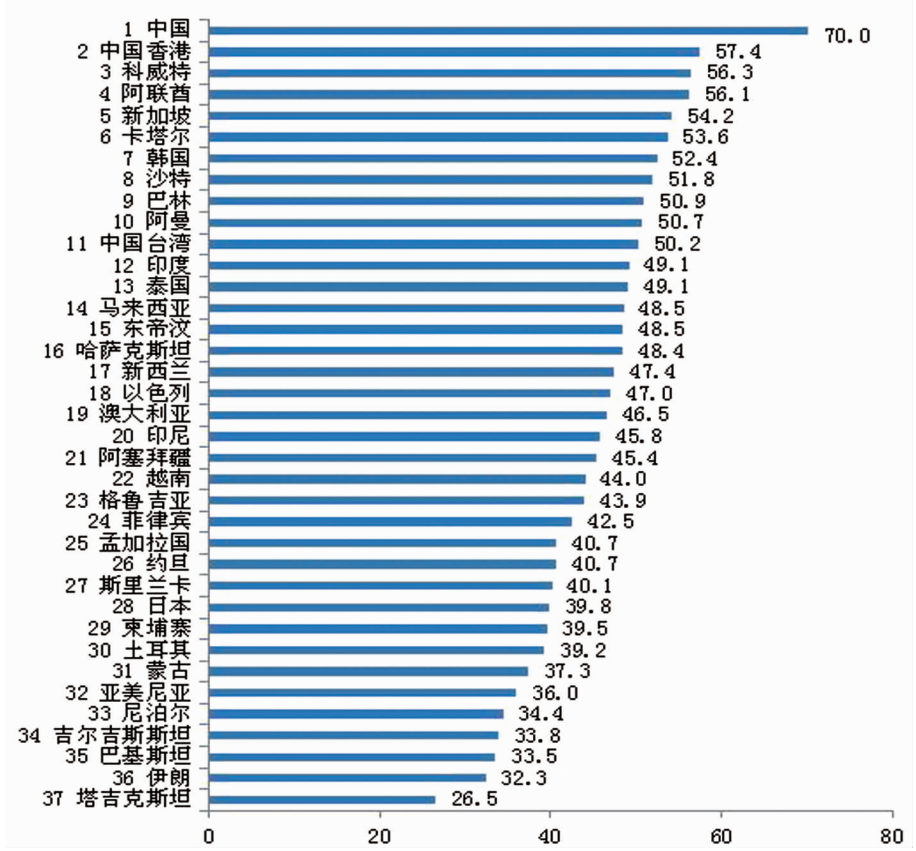


图 4 亚洲经济体 2014 年度整体经济实力指数排名

(五) 社会发展水平

2015 年度，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中国香港、新加坡、新西兰、韩国、中国台湾、阿塞拜疆、卡塔尔等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竞争力排名位居第 1~10 位（见图 5），与 2014 年度相比，新加坡和新西兰交换了位次，而卡塔尔取代格鲁吉亚进入了前 10 位，排名提升了 7 位，主要是得益于医疗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格鲁吉亚则相应跌至第 11 位。与 2014 年度相比，中国在社会发展方面的排位下跌了 1 位，位列第 12 位。亚美尼亚、巴林、斯里兰卡、蒙古、塔吉克斯坦、土耳其、越南和科威特分列第 13~20 位，其中斯里兰卡和塔吉克斯坦较上年度提升了 1 位，蒙古和土耳其较上年度下降了 3 位，越南和科威特互换了排位。尼泊尔、阿曼、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泰国、马来西亚、孟加拉国、沙特、柬埔寨、印尼、菲律宾分列第 21~31 位，其中哈萨克斯坦较 2014 年度下降了 2 位，尼泊尔和柬埔寨在该项排名中均提升 2 位，印尼和菲律宾则分别向后顺延了 1 位。阿联酋、东帝汶、约旦、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列第 32~37 位，与 2014 年度相比，只有东帝汶和约旦的排名互换了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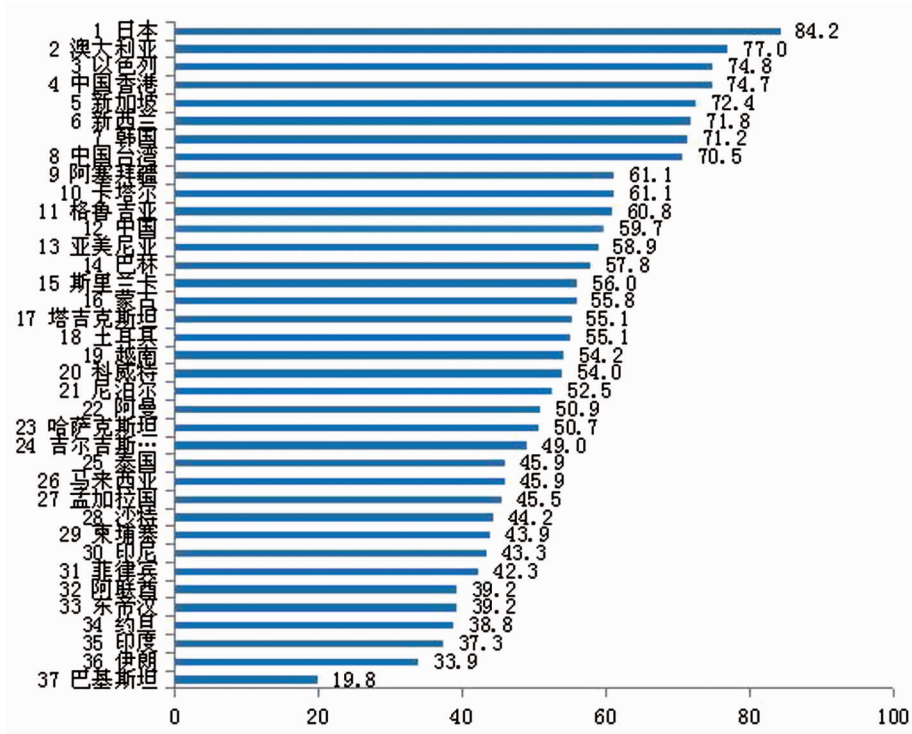


图 5 亚洲经济体 2014 年度社会发展水平指数排名

(六) 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

2015 年度，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新西兰和以色列依旧在创新能力方面表现突出，分别位居前 5 位（见图 6），与 2014 年度相比排位也没有发生变化。中国凭借在国际

专利申请量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的优异表现，超越了澳大利亚跃居第 6 位，澳大利亚反而下降至第 8 位，同时也被科技成果众多的日本超过。马来西亚、中国香港、蒙古、吉尔吉斯斯坦、泰国、越南、菲律宾紧随其后分列第 9~15 位。与 2014 年度相比，泰国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方面的竞争力下降了 4 位，而中国香港、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因此受益排名均提升了 1 位，越南因为高科技产品出口竞争力增加，从而使其在该项的排名提升了 4 位，而菲律宾更加重视教育投入，在该项排名中也提升了 1 位。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东帝汶、沙特、土耳其、约旦、伊朗、印度、亚美尼亚、印尼分列第 16~25 位，与 2014 年相比，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东帝汶，由第 14 位下降至第 18 位；上升幅度最快的是印度，由 2014 年度的第 26 位攀升至第 23 位，主要体现在公共教育支出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显著增加；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分别较上年度下降了 1 位，而哈萨克斯坦较上年度提升了 1 位。阿曼、科威特、巴林、尼泊尔、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柬埔寨、卡塔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联酋、孟加拉国分列第 26~37 位。其中巴林和尼泊尔、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在排位上互换了位置；科威特和阿联酋较 2014 年度下滑幅度较大，均下降了 3 位，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公共教育支出占比降低；孟加拉国因公共教育支出减少和高科技产品出口下降，致使 2015 年度排位也下降了 2 位；巴基斯坦较 2014 年度提升了 3 位，卡塔尔和斯里兰卡均提升了 1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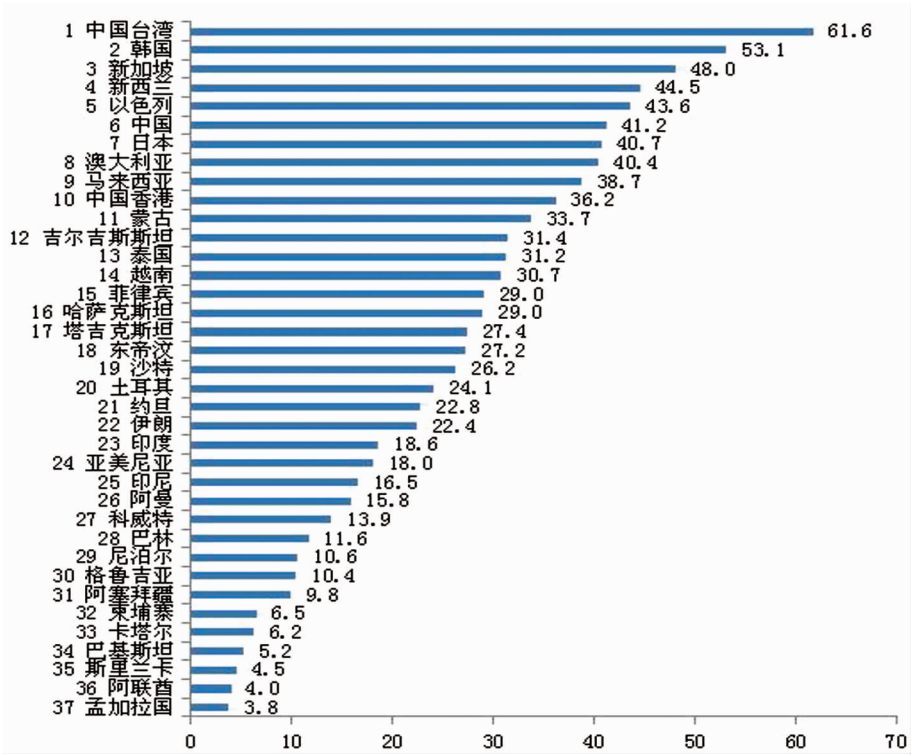


图 6 亚洲经济体 2014 年度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指数排名

三、亚洲经济体竞争力 2015 年度评估结果分析

整体来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自由开放政策下起飞的“亚洲四小龙”的竞争力仍位居前列，紧随其后的是社会成熟度较高的发达经济体。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发展潜力等方面的竞争力有所提升，但因为有较大的短板存在，其整体竞争力仍相对落后。从近 6 年所做的评估结果来看，亚洲经济体之间的排名保持总体稳定。随经济活力、创新能力、行政效率等方面的不断变化，个别经济体竞争力排名可能有所起伏，但整体竞争力表现还是相对稳定。

相比而言，中国、印度等大型经济体的综合竞争力排位通常表现相对稳定，而发展中的小型经济体的竞争力排位会出现较为大幅度的波动，表现出更大的脆弱性。如伊朗因受到石油禁运和中东动荡冲突等因素影响，其综合竞争力受到较大幅度的冲击，导致竞争力有所削弱。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经济体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往往在个别年份因遭受外部风险冲击，其竞争力在该年度的排名出现大幅下降，而受益于此的部分经济体的竞争力将会相应提升。

从发展视角看，亚洲各经济体都有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增长和维持综合竞争力优势的内在动力，大都在完善基础设施、消除腐败、简政放权、提高公共品质量等方面进行着不断的努力。

总之，同样面对种种复杂因素和内外部的严峻挑战，相比全球其他地区，亚洲仍有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亚洲各个经济体仍在寻求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办法，推进跨区域的设施联通和政策对接，加速形成以内需主导的亚洲统一大市场，争取摆脱全球经济疲软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仍然有理由对亚洲经济体未来竞争力的提升充满信心和期待。

（一）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综合评价位列前 4 位的仍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即传统意义上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

2015 年度，新加坡巩固其在亚洲经济体中的引领位置，连续 3 年稳居亚洲竞争力首位，连续 5 年保持着亚洲最高效的行政服务水平，具有最便利的营商环境；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包括卓越的公路、港口和航空等交通设施和便利的互联网接入、移动通信网络和国际宽带出口；经济增速达到 2.9%，通胀率处于 1% 的低水平，失业率维持在 2% 的较低水平，保持着财政盈余 52 亿新元和贸易顺差 551 亿新元；持续增加公共教育和基

基础教育投入；较强的创新活力，尤其表现在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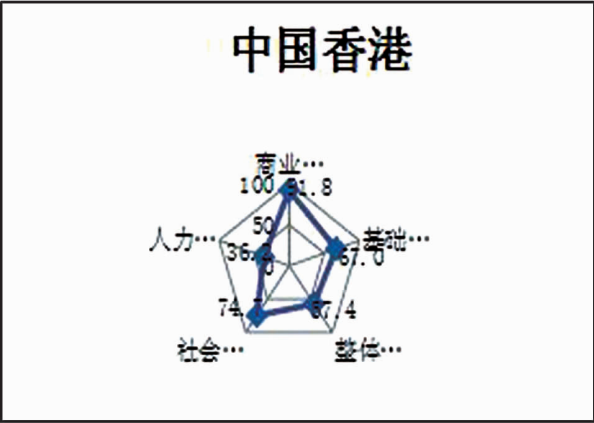


图 7 新加坡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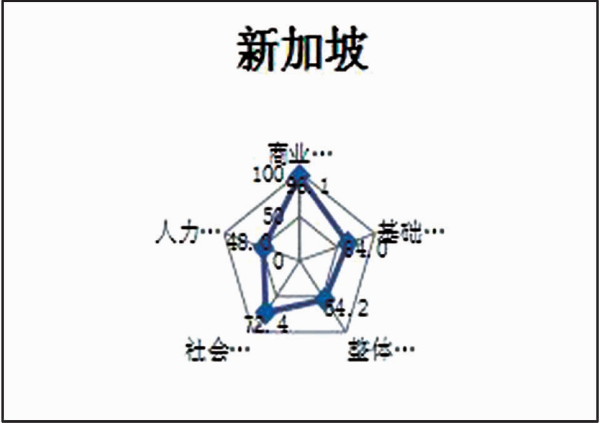


图 8 中国香港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中国香港综合排名居第 2 位，拥有高效、稳定和值得信赖的营商制度和金融市场，尤其是企业开办和注销非常便利；拥有世界一流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和高品质的信息基础设施平台；经济增速有所回落，政府盈余有所增加，失业率、通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拥有控制传染疾病和提供高品质医疗服务的成熟经验，社会治安表现优良；为建立真正的创新驱动经济体，中国香港尚需要改善高等教育和创新能力现状。

韩国仍然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教育入学率，公共教育投入仍保持高强度，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居亚洲前列，在创新竞争力排名中被中国台湾超越，但仍位居次席；拥有卓越一流的基础设施，交通、通信、互联网、电力等基础设施成熟完善；经济复苏向好，通胀率持续下降；在社会发展方面维持传统优势；在改善商业行政服务能力方面做出了努力，该项竞争力较上一年度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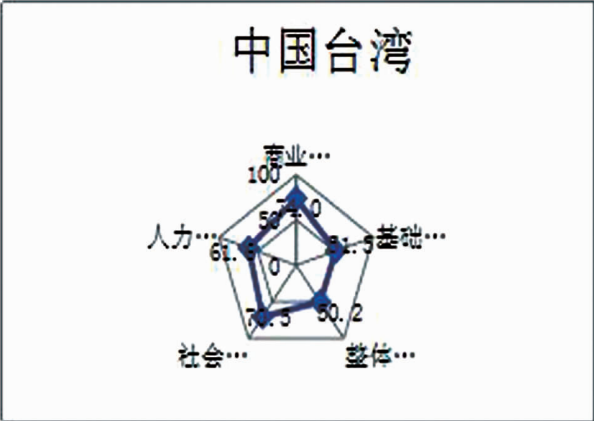


图 9 韩国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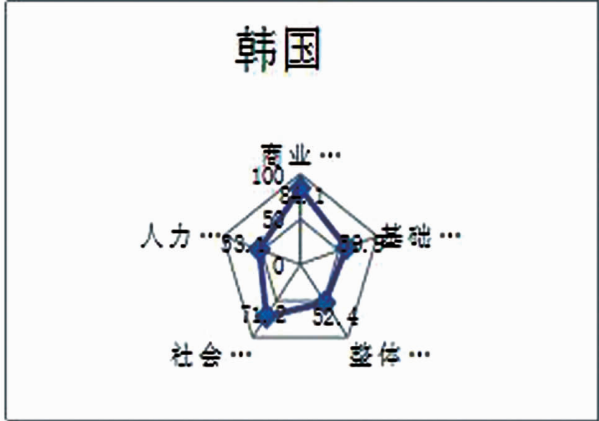


图 10 中国台湾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中国台湾继续保持在高科技创新和产品出口领域的强大优势，尤其是人均专利申请量领先于亚洲其他经济体，使其重返该项竞争力的首位；基础设施领域竞争力提升较快，在通信和互联网领域改善较大，排位攀升了 2 位；总体经济形势有所改善，GDP 年增 3.51%，通胀率 1.2%，失业率 3.96% 为近 7 年最低水平，政府债务也维持在合理水平；在营造更好的商业环境方面不如人意，从而拖累中国台湾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二）传统发达经济体

日本社会发展竞争力表现突出，位居首位；拥有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但因社会投资不足，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有限；日本仍保持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方面的传统优势，公共教育支出仍保持高强度，其每年的科研经费约占 GDP 的 3.1%，位居发达国家榜首；财政赤字和失业率均有一定程度下降，但经济运行风险仍然较大，尤其是安倍政府的经济刺激效应正在递减，经济表现仍然不佳，排名较上年再次下降了 3 位。

以色列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优良，一是社会发展维持在亚洲前三；二是在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方面，国际专利申请量增多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增加。此外，其商业行政服务效率较好；基础设施领域仍具有一定优势；近 5 年 GDP 增速一直呈震荡下行趋势，但宏观经济环境得到改善，政府赤字、债务、通胀率和失业率均有一定下降，经济运行风险不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维持较强综合竞争力的原因在于其长期积累的政府商业服务效率、社会发展水平和持续的创新力。澳大利亚继续维持基础设施的高水平，并有所改善，而新西兰持续改善通信和互联网设施水平。澳大利亚经济基本面继续呈恶化趋势，在经济增速出现放缓的同时，通胀率、失业率、政府赤字和政府债务均出现攀升，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有所下降；新西兰经济竞争力排名下降 2 位，通胀率较低而失业率较高。

（三）亚洲的金砖国家

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但仍维持中高速增长，通胀率温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高，其整体经济竞争力处于亚洲领先地位；新一轮全面改革开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因交通网络密度提升、互联网带宽提速等设施改善，基础设施排名攀升至第 14 位；中国正朝着创新驱动的经济体发展，不仅加大科研领域的资金投入，而且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连续三年超过 4%，由此带动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 5 年居世界首位，人均国际专利申请量也稳步提升。

印度 2015 年度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26 位，上升了 6 位，改善幅度较大。印度政府采取的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促使国内经济重返高增长轨道；极大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

率，经济运行风险有所降低，从而使其经济整体竞争力大幅提升；印度综合竞争力的弱势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层面，基础设施竞争力虽有进步，但仍相对靠后；印度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上升幅度最快，攀升了 3 位，主要体现在公共教育支出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显著增加，印度已成为全球软件、金融等服务业重要出口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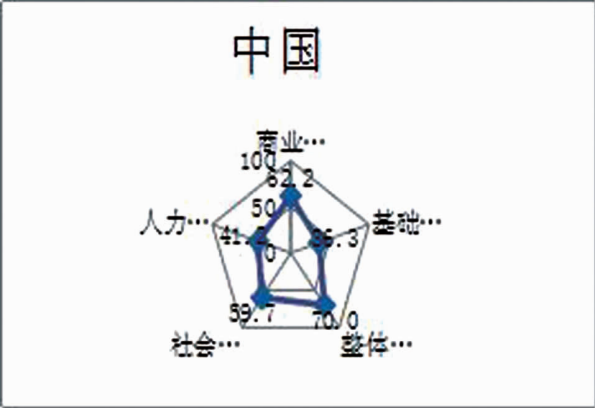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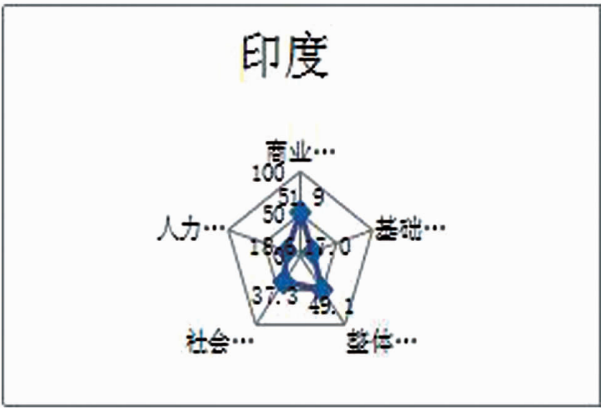


图 12 印度竞争力分项指数雷达图

（四）东盟新兴经济体

各经济体发展有强有弱。马来西亚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商业行政服务、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整体经济实力、基础设施等方面，而在社会发展方面相对落后；泰国优势在于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商业行政服务和经济活力方面；越南在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和社会发展两方面表现尚可；菲律宾的优势在于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和总体经济表现；印尼较突出的是经济基本面表现尚好。

（五）西亚、中亚资源输出国

西亚、中亚主要资源输出国综合竞争力表现欠佳，该地区大部分经济体持续遭受地缘政治和政局动荡的冲击，而依赖资源输出的经济体还面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排位最高的是巴林（第 10 位），排名最低的是塔吉克斯坦（第 36 位）。卡塔尔、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沙特、阿联酋、阿曼则集中在综合竞争力排名的中上游，分列第 11、12、13、14、16、17 位，而同属西亚的约旦和伊朗处于中下游位置，分列第 24 位和第 30 位。

（六）南亚其他国家

斯里兰卡综合竞争力排名较上一年度下降了 3 个位次，排名第 29 位，其社会发展水平表现最佳；孟加拉国综合竞争力较 2014 年下降了 1 位，位居第 32 位；尼泊尔综合竞争

力较 2014 年上升了 1 位，排名第 33 位，其社会发展水平较上一年度上升 2 位，排到第 21 位，相对高于其综合竞争力排名；巴基斯坦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35 位，各分项指标均排在 30 名以后。

参考文献：

1. 王军等：《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 2016 年度报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2. 赵磊：《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中信出版集团 2015 年版。
3. 赵晋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经济影响与对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 年版。
4. 夏飞、张建中等：《中国南海海陆经济一体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5. [美] 罗奇著，束宇、马萌译：《未来的亚洲：新全球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中信出版社 2009 年版。
6. 郑鼎文：《大变局与东亚经济战略》，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7. 李意：《海湾安全局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
8. 高华证券：《亚洲 2016 年经济展望：努力通过政策填补增速缺口》，2015 年 11 月。
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djusting to Lower Commodity Prices*, www.imf.org Oct. 2015.
1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ia: Bolstering Resilience amid the Slowdow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Asia and Pacific*, www.imf.org Oct. 10, 2015.
1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Growth Holds Its Own in Developing Asia,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Supplement*, www.adb.org Dec. 2015.
1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www.imf.org Oct. 2015.
13.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5 - 2016*, www.weforum.org/gcr.
14.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Human Capital Report 2015*, www.weforum.org/hcr.
15. World Bank Group, *Doing Business 2016: Measuring Regulatory Quality and Efficiency*, www.doingbusiness.org Oct. 2015.
16. World Bank Group,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The Global Economy in Transition*, www.worldbank.org. June 2015.

责任编辑：艾 冰

中国在全球治理与 G20 中的作用及影响

李罗莎

摘要：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缺失，都严峻考验着当前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倒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重构的思考。G20 将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纳入其中，使平台更具代表性，为世界主要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协调宏观经济决策机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机制和平台。但是，G20 作为一种新生多边全球治理模式，在机制上仍然存在缺失。建议 G20 进行议题设置机制、特色决策机制、包容发展机制及秘书处机制建设。

关键词：全球治理 世界格局 G20 机制

作者简介：李罗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一、全球治理改革

（一）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近现代国际治理体系形成的原点，可追溯到中世纪罗马帝国内战演变成欧洲 30 年（1618—1648 年）战争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该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基本原则，以法律形式废除了教会高于国家主权的神权，开创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国家体系。二战之后，国际社会成立了联合国（UN）、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对战后世界秩序发挥着稳定而有效的国际治理作用。然而，UN、WTO、IMF 和 WB 的宗旨并未超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则。

可以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现代国际治理体系的奠基石。

在 20 世纪全球化进程中,UN 在政治上、WTO 在贸易和投资上、IMF 和 WB 在金融上,分别充当了造法者、执法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它们独自或相互协调处理全球性问题,通过争端解决机制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大规模抬头,使各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具有联动效应,从而阻止了全球金融危机演变成又一场大萧条。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国际组织的存在与作用,便形成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者和最强的管理者。

但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公正性,没有改变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体制的局面。进入 21 世纪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中的缺失更加严重地凸显出来。此外,全球性问题,除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和难民问题外,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网络信息安全等也都呈现远超出民族国家治理能力范围的特点。以主权方式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治理能力都明显受到限制。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新时代的挑战,从而挑战国家主权原则,认为主权原则是战争根源并损害生产力发展的思潮在理论界开始流行。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缺失,都严峻考验着当前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倒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重构的思考。促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人类发展方式转变与全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寻找解决方案。

(二) 全球治理改革的前景

从目前可预见的因素分析,全球治理改革前景会有如下特征。

一是全球治理改革前景必须适应全球公平主义发展大趋势。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成为国际主流思潮,但进入 21 世纪后它受到公平主义的挑战。美欧因自由主义失去贸易优势转而提倡公平主义,全球加剧的两极分化,也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众相较经济发展更为渴求实现社会公平。

二是全球治理改革前景要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代化。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不同步的问题。全球化本质上是不顾及国家边界存在,旨在消除不利于货物和资本流动的任何障碍,当前全球性问题早已突破民族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但同时世界政治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依然强调国家边界和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世界政治需根据当下现实来实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代化。

三是全球治理改革前景必定建立在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基础上。美国一家独大的国际政治格局已基本结束,人类社会步入多极化世界。有学者提出,多极化世界格局其实是

建立在一个拯救国集团基础上，是由美国、中国、俄罗斯及欧盟组成的，代表当前全球经济总量的 57%、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 55% 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59%，对全球治理改革前景有决定性影响。

四是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前景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当前，中美在完善改革全球治理格局方面具有广泛战略共识，表明中方无意挑战二战以来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也意味着美方欢迎中方在现有国际组织框架内和不断拓展多双边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承担相应责任。双方均支持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的首要平台。

五是创新观念有利于对全球治理改革前景做有益探索。当前，被称为“议题式联盟”的观念认为，全球化时代没有全面的敌人，也没有全天候的朋友，一切关系都将视具体“议题”而定。这意味着各国关系将不再是“结盟关系”，既不是历史和文化同一性结盟，也不是排他性军事结盟，而是视具体“议题”而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外，“网络体系”的观念认为，当今世界无论国家、企业或个人，都无法独立于网络而存在。这意味着全球治理不能再局限于国家体系而必须扩展至网络体系，而网络体系将可能影响人类社会形成利益共识和集体感，最终可能实现全球命运共同体。

二、G20 的成立意义及机制缺失

（一）G20 成立的重要意义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治理平台由美国独霸转为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G7）治理模式。这一机制是以西方大国经济利益为轴心的单一治理模式，它所制定的全球议程就是西方联盟利益在世界范围实现的外在表现。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入盟 G7，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全球治理议程，使得 G7 转变为 G8（八国集团），改变了 G7 单纯发达国家成员的成份，打破了 G7 单一的治理模式。当时，G8 经济总量占据全球 70% 以上，具有代表性。而在 2008 年全球经济遭受“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时，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已与 G8 不相上下。在此情况下，通过 G8 进行国际协调就缺乏代表性，使得 G8 力不从心，倒逼国际治理平台加速变革。于是 2008—2009 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召开了 G20 领导人峰会。G20 峰会诞生于世界金融危机危难之时。

成立于 1999 年的 G20 集团，其成员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的利益平衡，约涵盖世界人口的 2/3、世界经济总量的 90%、世界贸易总量的 80%，旨在通过寻求合作来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G20 峰会使世界经济避免出现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局面，凸显了 G20 这一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作用。G20 之所以能够超越

G8 而取得如此成就，核心在于其将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纳入体系，使 G20 平台更具代表性。G20 峰会被寄予厚望，是因为自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远超过发达经济体，而 G20 为世界主要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协调宏观经济决策机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机制和平台。

金融危机与 G20 的创建，展示了全球治理多边模式形成与加速的轨迹。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认识到，解决国际金融问题不仅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参与，还需要有影响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参与。从而 G20 作为“一种系统内的重要的国家之间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体系框架内的非正式对话机制”产生了，这是全球治理多边模式的形成与加速。全球金融危机的真实意义在于，改变了资本主义“西方民主”话语的“霸权”。一个真正意义的世界多元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将在更高层次上显现。世界发展的领导力量，将不再仅仅是以美国为首的“G7”，“G20”作为一个整体已涉身其中。在新兴经济体实力日渐凸显的形势下，新的国际格局展示了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二）G20 机制的缺失

G20 作为一种新生多边全球治理模式，在机制上仍然存在缺失。首先是代表性缺失困境。全球治理需要面对不断变动的全球性问题，制定新的全球议程，处理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但 G20 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代表世界各国的全球治理机构，可它又需要完成代表世界各国来制定全球治理议程，这使它无法跳出灵活性与代表性缺失的困境。其次是政治权力转移滞后于经济权力转移困境。G20 体现了一种世界政治经济权力转移的过程，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有所上升，更准确地说，是新兴国家获取了一定话语权。这个话语权就是经济权力，但话语权不一定完全有效，这个有效性就是政治权力。实现话语权有效性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发达国家让渡其主导国际秩序的权力，需要在新兴经济体均势力量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后才可能实现。

G20 机制缺失的历史缘由。首届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把 G20 定性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非正式对话机制，表明 G20 机制仍然隶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非正式”为运行特点。在首届匹兹堡 G20 峰会又赋予 G20 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即领导人引领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由此，G20 的“非正式”机制体现在没有正式国际组织的常设秘书处，决策机制只能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而非投票表决。G20 的“领导人引领”机制则意味着一个以领导人核心的“金字塔”架构，G20 峰会更多担当着战略性沟通使命，部长级会议、协调人会议及工作组会议是其“金字塔”架构技术和行动的层级基础。因此，G20 只能在其机制框架内寻求一定程度的机制突破，而这种突破必须寻求西方发达国家与新

兴经济力量的平衡点，定位好并处理好 G20 自身与联合国等现有全球治理国际组织的关系，以及 G20 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关系。

（三）2016 年 G20 峰会的主题任务

2016 年 G20 领导人第 11 次峰会由中国主办。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已具备很强的号召力，已成为全球事务的主要决策者。中国赢得了广大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尊重。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 G20 布里斯班峰会上，提出“创新发展方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三项行动建议，受到广泛关注。国际社会更期待中国在主办 2016 年 G20 峰会上起到政策引领作用，能够提出一系列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倡议。主办 2016 年 G20 峰会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思路和新举措的大好时机，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G20 峰会正在经历转型，而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已 10 次参与 G20 峰会报道的巴西《圣保罗页报》记者克洛维斯·罗西说，“中国将带来一种思路上的转变。我们十分关注中国关于携手合作的新观点”。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指出，“在中国举行的 G20 峰会不仅是 G20 重生的契机，还将是真正的国际合作重生契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阿玛蒂亚·森表示，“作为今年 G20 峰会的东道国，中国有能力在推动构建包容性的国际秩序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贸易、援助等方面更有作为”。

世界经济的持续衰退，激发了 2016 年促使全球经济合作的呼声。中国定下了 2016 年 G20 峰会的基调：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及包容性问题的同时，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形成更加稳健的全球间贸易投资活动，这是此次 G20 峰会第一要务；同时，确立 2016 年 G20 峰会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创新”是要解决世界经济的动力问题。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传统产能严重过剩，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因此，只有通过创新驱动，在体制、机制、业态、科技、文化等多方面改革和创新增长方式，重新创造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才能提升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活力”是要解决世界经济发展状态问题。旨在倡导推动更高效和更有力的经济金融改革，增加世界治理机制活力；通过更加强有力的全球互联互通建设，催生欠发达地区增长潜能，提高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地位，增加世界经济增长活力；通过各国内部加快经济改革和转型发展，激发各自经济活力。“联动”是要解决世界经济互动方式问题。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经济问题日益复杂化、各国经济政策日益分化和碎片化、各种保护主义日益泛化的背景下，需要号召各经济体进一步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更好的宏观政策协同，共同应对短期金融风险和中长期经济增长失能风险，以推动各国经济实现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包容”是要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

衡、不平等问题，不仅要使各经济体共同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还将使世界经济增长红利更好地为各国人民共享。

中国作为 2016 年 G20 峰会主办国，在会议过程中，更加主动地设置议题，更有效地表达理念、政策和主张。中国会在 G20 框架内更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致力于建设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公平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会把促进增长和就业作为核心任务，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会把 G20 从危机应对转向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转型；会致力于推动落实 G20 布里斯班行动计划和全面增长战略，将与 G20 成员共同努力实现在 2018 年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 2% 以上的目标，不负国际社会对中国寄予的厚望。

三、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一）中国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关系

一是中国从未想推翻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获得的巨大发展红利，就是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框架内取得的。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观点和行为，主要都是有限提升中国自身在现有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或创建新的补充性（而非替代性）国际机构，“并非推翻现有体制或另起炉灶”。二是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是重在改革，是把推动国际治理变得更加公正、合理的目标与建立“命运共同体”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联系起来。三是中国是以“中国梦”来“更新”国际治理和国际秩序的。“中国梦”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文明梦。中华文明以“和”文化的深刻智慧，为当今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转型重构期所呈现的深度竞争与深度融合的复杂格局，提供一个“和”解的“中国方案”。

（二）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着力点

一是以更加开放、愈益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积极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二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并不等同于要颠覆现有国际机制，而是改革完善。中国重申坚决支持 UN、WTO、IMF、WB 这些国际组织继续发挥核心作用，促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及发言权，积极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是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要着力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的塑造能力，帮助国际社会更理性地认识及理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三）中国的全球治理新理念

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这是中华文明为全人类指引走出

“发展的焦虑”的唯一正确之路。中国在“一带一路”中展现“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新理念，主张人类必须超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及各种偏见藩篱。这是在 21 世纪全球治理舞台上，中国高高擎起的一面旗帜，展现中国积极谋求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贡献的大国形象。

（四）中国的全球治理行动

一是主动提出一系列创新理念。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G20 金融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场合时频频发声，提出全球治理新用语、主张和众多有关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倡议。

二是不仅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引领，身体力行。在 UN、G20、APEC、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发出“中国声音”、推出“中国方案”，在多边场合全面展现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联合国大会庄严宣告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坚决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参与制定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并组建 8000 人维和待命部队，承担联合国会费及维和摊款已分别上升到世界第三位和第二位。未来 5 年为非盟提供总额为 1 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充分展示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大国姿态。在金融领域，使人民币被纳入 IMF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推动 IMF 增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权的改革，成立“丝路基金”，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话语权显著上升。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积极参与热点问题解决。如，不断扩大建设性参与解决伊核问题、叙利亚危机、伊拉克重建、苏丹国内和解、阿富汗和解以及国际反恐。中国立场、中国方案和中国行动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是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这是中国作为全球治理参与者、引领者的重要体现，是把中国提出和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践行为政策主张、实际行动的重要途径。除经济议题之外，非传统安全合作、环境气候合作、生态治理合作等也需要全球答案。中国在创新全球议程方面不断探索，以让全球治理更加合理、公平，这体现了中国勇于承担大国责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将继续在全球议题上，主动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行动方案，以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

四是积极参与和推动强化关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的协调机制。包括：同发达国家加强政策协调，特别是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要加强宏观经

济政策协调，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同新兴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特别是与“金砖国家”加强政策协调，构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关系。

五是主动参与和引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及修订。当前，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投资规则的制定及修订在全球多边、区域、双边等不同范围内深入展开。在这些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及修订中，中国是主动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中国不是旁观者、跟随者，而是主动参与并作为引领者。在全球多边和区域、双边层面，中国全面参与包括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中国还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

六是主动引导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除了继续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外，还将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大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和中欧自由贸易区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与之关联紧密的沿线国家区域、跨区域及次区域的经贸合作，包括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

七是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取得重要进展。中美确认了不冲突不对抗底线，在双边经贸人文、叙利亚危机和伊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等诸多领域扩大合作，在两军相遇和南海问题等方面加强危机管控。与俄罗斯保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运行，政治互信进一步巩固提升，能源、航空、航天、高铁等大项目合作稳步推进。与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合作相互助推攀高，与中东欧“16 + 1”合作提升，形成中欧合作东西南北平衡拓展态势。

八是周边外交扎实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中日关系回暖并确认促进战略互惠发展，中韩自贸协定签署生效。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谈判完成，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合作进程开启，互联互通取得重要进展。上合组织首次扩员，中国与中亚及外高加索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背景下深入合作。中印互信合作增进，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工作初见成效。

九是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中国发展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和借鉴，中国因更了解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和需求，从而可以给予更加有效的帮助。中国设立 20 亿美元的南南合作基金，减免有关国家债务；对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给予 120 亿美元长期投资；提升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

600 亿美元资金支持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全面启动中国—拉美整体合作机制，推进“两洋铁路”等标志性工程，形成南南合作两翼齐飞态势；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挥作用，共同提高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国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国在不忘旧友的同时积极扩展新伙伴关系，体现了在全面合作伙伴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平衡的国际关系。

十是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向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建设等提供支持方面作用有限。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缺口每年近 800 亿美元，这一数额显然不是 IMF 和亚洲开发银行所能提供的。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不仅有助于破解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瓶颈，而且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之一。中国正在不断向世界提供多样的公共产品，不仅切实帮助了发展中国家解决现实难题，也为经济复苏乏力的发达国家摆脱困境提供了契机。

四、G20 机制建设的探讨和倡议

（一）G20 机制建设探讨

G20 机制化建设的探讨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涵义，也具有十分紧迫的实践意义。作为中国真正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唯一有效平台，G20 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其机制建设所蕴藏的丰富潜力及巨大国际协调红利，意味着其具有非常广阔的成长前景，也预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中国对 G20 机制建设的态度、立场及应对战略，势必会引领世界治理格局的未来发展。

G20 机制建设可以采取三个阶段：当前，G20 机制建设正处于第一阶段，为议题设置机制建设；第二阶段，向秘书处机制建设延伸，从形式建设向实质建设迈进；第三阶段，推动“软硬兼施”机制构建，以增强峰会运作规范性及决议权威性，其中涉及塑造 G20 特色决策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等。

G20 机制建设行动可以考虑三步走方略：一是着力促进 G20 协商机制的有效性。作为国际经济协商平台，G20 本身不具有法律强制效力。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趋势可能是由 G20 引领，IMF 和 WB 等正式国际组织执行落实，从而组建一个“非正式机制 + 多边正式国际组织”的“机制复合体”决议执行模式。这种决策—执行模式不仅保持了 G20 机制灵活性的特点，更与 IMF 及 WB 构成良好的互补关系。强化 G20 决策—执行功能之间的传导机制，可使 G20 峰会达成的协议和共识获得最大程度的落实。二是重视议题设置的实质性成果。在 G20 由危机应对机制转型到国际经济治理平台的过程中，G20 议题

设置的重心将不可避免地转换到各方利益攸关的议题上。鉴于此，G20 对议题保持“有限度的开放”势在必行。全球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无疑是当前的核心议题，除此之外，还赋予主办国高度议题选择权。然而，这又往往导致历届峰会议题缺乏延续性，使诸多共识成果最终流于空谈。G20 峰会议题设置的实质性成果至少应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方面，国际社会取得共识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峰会议题设置应具有延续性和可操作性。三是妥善处理与美国、G8 及金砖国家等双多边关系。G20 性质决定其将与 G8 长期共存，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利益代言平台。中国需要积极开展与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伙伴式协作，在 G20 平台上形成更大合力以充分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同时加强新兴经济体内部金融合作，以抗衡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霸权。

（二）G20 机制建设倡议

一是议题设置机制。新的全球治理结构要求各国合作不再是结盟关系，而是一切视具体“议题”而定的合作伙伴关系。G20 将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框架内，建立以“议题”为核心、以自愿为原则、以透明为特征的合作伙伴机制。通过问题驱动的行动方式，切实推动区域内乃至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既可包括法规性国际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可包括各种非正式制度灵活安排。以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全球游戏规则的主导权和发言权，从而充实和完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二是特色决策机制。G20 决策机制应该建立在各国具体“议题”、且该议题与各国发展战略有对接的基础上。各国在未来全球增长、贸易和投资方面都有诸多共同“议题”，且都制定了本国、本地区今后 5~10 年重大发展战略，如欧盟“容克计划”、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G20 决策战略对接的重点是支持各国开展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参与到 21 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G20 决策特色不仅要切实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而且要体现在为实现 G20 投资总额占 GDP 比例到 2018 年前提高 1% 的目标做出贡献。

三是包容发展机制。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趋势是，21 世纪的工业化必须通过与其他国家融合、开放本国市场，才能得到最有竞争力的包容发展。G20 包容发展目标是推动所有国家开放、融合，实现包容发展。提升 G20 经济合作形态，推动各国经济合作基于全球产业链驱动，顺应全球产业链大势发展方向，加入全球产业联动，参与并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并从中更多获益。

四是秘书处机制。秘书处定位是负责 G20 独特的自下而上的协调和执行以“议题”为核心、以自愿为原则、以透明为特征的合作伙伴机制。G20 秘书处的协调职能应具备

引领性，可通过与各国重大发展战略对接模式，以充实和完善 UN、WTO、IMF、WB 等国际组织合作机制中及大项目的真空地带。

五是智库论坛机制。G20 智库机制应具备广泛性。为此，可以博鳌亚洲论坛作为 G20 智库支持平台。博鳌亚洲论坛有来自各国的 300 多位企业家、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出席，议题设置较宽泛，具有广泛性。

参考文献：

1. [美] 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
2. [美] 伊恩·莫里斯著，钱峰译：《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
3. [美] 安德鲁·巴塞维奇著，于卉芹译：《华盛顿规则——美国通向永久战争之路》，新华出版社 2011 年版。
4. [美]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5. [泰] 素帕猜·巴尼巴蒂著，刘崇献等译：《中国重塑世贸》，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年版。
6. 王国兴、成靖：《G20 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国际展望》2010 年第 5 期。
7. 徐凡：《G20 机制化建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小集团视域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探析》，《东北亚论坛》2014 年第 6 期。
8. 陈建奇：《如何提高 G20 效率？》，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 年 11 月 25 日。
9. 刘丽娜：《2015 全球经济治理积聚新共识》，新华网，2015 年 12 月 23 日。

责任编辑：李 蕊

· 智库信息 ·

《透视中国》书序

序一

林毅夫

文玲曾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她在这里所作的学术讲座得到很高的评价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2002 年我作为评审组长，对她主持的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所进行的温州模式研究成果进行了评审，评审小组对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之后，我始终关注她的思维“足迹”，并赞赏她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成就。

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作为国务院研究室的一名司长，她参与了或主持过多项国家战略研究或政策研究，见证、参与并推动了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工作，在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决策研究和政策研究方面著述丰硕，取得了多方面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并被决策采纳。最近几年，我关注到，作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又主持了多项重大战略性课题研究，在国际战略问题、国内重大经济问题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可以说，作者具有创新思维能力、战略研究设计能力和求真务实精神，勤于耕耘，不懈探索。在国际战略与国际经济、宏观经济、现代流通、现代物流、现代商业、现代社会信用、医药卫生领域改革发展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她出版著作、译著近 30 部（其中合著 5 部），《中国经济社会前沿问题实证研究报告（上、下）》《现代流通基础理论原创研究》《流通新论》《现代流通与内外贸一体化》《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义乌报告——

义乌迈向国际大市场的发展之路》《跨越——温州从传统信用迈向现代信用》《蓄势待发——现代信用支撑南宁腾飞》《日本的大流通体制及企业管理体制》《我国宏观经济的回顾和思考》等，几乎每一本著作都称得上精品力作。她的工作非常繁忙，但始终笔耕不辍，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等 300 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报刊资料摘编》等权威刊物全文刊载近 40 篇，摘编百篇以上，是近年来被权威报刊摘编文章最多的学者之一。

最近，文玲将她多年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整理，准备出版《中国与世界——以中国视角解析国际问题》《透视中国——中国宏观经济报告》《透视中国——中国现代流通研究报告（上、中、下）》《透视中国——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上、下）》《透视中国——中国相关国家战略报告（上、下）》《透视中国——中国现代社会信用与文化报告》等著作，超过 400 万字。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真的很为她高兴，她是一个有国家责任感且勤奋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专家。

我认为，她的研究成果的主要理论建树和政策应用价值：一是系统地研究并提出了社会化大流通的新理论。针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出现的新经济现象，特别是形成这些新经济现象的内在动因——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和混沌化大流通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社会化大流通理论，包括其概念、内涵、时代特征和发展方向。这个理论被认为是对流通基础理论研究的新突破，是一项既有理论价值又对实践具有指导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她最早提出流通产业是经济运行的先导性产业，正在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性行业。这些理论观点，已经成为我国推进现代流通的理论基础，形成了理论界、决策层和全社会的共识。二是最早提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构成了现代经济的两种基本形态。明确指出了两者的相互关联及其互动效应，各自与泡沫经济的相互转化及其释解，是今后若干年世界经济运行中渐进式变动和突发式变革的厚重底蕴。从而提出了在我国正确处理这两种经济形态的对策。《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一文，是研究该领域的首篇文章。三是最早研究并提出流通产业是经济运行的先导性产业，正在从末端行业转向高端行业。（《中国商业发展研究报告——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的转变暨展望》，《经济研究参考》1999 年第 46 期）。研究并明确提出我国发展现代流通和现代物流的巨大潜力和政策建议。首次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审视我国物流存在的问题，针对发展现代物流中的若干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国务院研究室研究报告》《对发展我国物流产业的调查与思考》《中国经济时报》《现代流通的理论内涵》《现代流通的主要表现形式》《对我国发展现代流通的政策建议》）四是系统研究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大理论并提出若干决策咨询建议。最早提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改

革思路，提出医改思路和举措，提出必须解决医药卫生体制实行“四个分离”等重要政策建议，已转化为领导同志讲话、国务院医改方案和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的部分提法和政策。研究并提出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建议，得到主要领导和其他多位领导批示，提出的政策建议被决策采纳。五是深入研究现代信用问题，提出构建中国现代信用体系总体构架。在对世界特别是美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了现代信用理论的新概括，提出构建中国现代信用体系的思路和建议，对推进我国从传统信用转向现代信用起到了积极引导和推动作用。向中央国务院领导呈送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报告 6 期（《国务院研究室关于信用问题的系列研究报告》）。完成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办公室委托的《关于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研究》的课题报告，为推动我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政策依据。主持《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建立现代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南宁社会信用体系》《杭州失信惩戒机制》等课题研究，深入研究温州经济社会转型与信用关系，南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对支撑成为面向东盟的中心城市的作用，提出城市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方案和思路，研究失信惩戒机制的理论内涵及其框架，对推进中国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提供重要参考模式。六是着力研究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和对外开放问题。深入研究我国的对外贸易、吸收外资理论和实践，提出政策建议。最早研究提出入世后我国市场竞争发生的十大变化，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入世：我国市场竞争将发生十大变化》，《中国经济时报》2001 年 12 月 6 日）。系统研究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投资理论，《重新认识国际贸易规律，为我国争取更大权益》等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最早提出国际贸易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理论，提出国际贸易体系和统计方式必须改革，争取我国在国际贸易和对外开放中获得更大的权益，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吸收外资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一些重要的战略思路。最近几年，在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如中美经贸问题研究、国际经济形势跟踪研究、国际货币问题研究等。七是深入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战略。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对中国在经济转型期宏观经济的特点、变动内涵及转型思路提出独到见解。跟踪研究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研究其深层次动因和解决问题的政策取向，提出的多项政策建议被采纳。研究重大区域发展问题，在建立粤港、粤澳合作框架研究、中部崛起政策研究、向西开放政策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文玲还连续多年参与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国务院一些重要文件起草。主持或参加的重大课题研究近 30 项，如《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研究》《中美未来十年经贸关系研究》《美国新一轮全球战略布局研究》《国家海洋战略研究》《中国 1998—2003 年宏观经济的回顾与思考》《构建中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总

体框架和思路》《中国健康 2020 国家规划研究》《建立粤港、粤港澳合作框架研究》《义乌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研究》《中部崛起政策研究》《温州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规划》《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建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引导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代流通与内外贸一体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评估研究》《推进现代物流发展的财税政策》和《中国医药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研究》等，研究成果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一项，获国家级奖励 3 项，部级奖励 19 项。

尤其值得赞许的是文玲在政策咨询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重点和难点问题，她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撰写向中央、国务院领导呈报的《送阅件》《决策参考》《研究报告》《室内通讯》和专送报告 200 多期（份），50% 以上得到中央、国务院领导重要批示，70% 以上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领导重视并批示。最近几年，她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撰写或组织撰写的几十份内参，不少也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重要批示，这在经济学家中是少见的。她还参加了 1999—200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理讲话和每年人大、政协会议上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参加了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相关规划制定或评审，参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规划、吸收和利用外资规划、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国家自由贸易区发展规划、国内贸易发展规划、全国商品市场体系建设规划、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纲要、2004—2010 现代海关制度第二步发展战略规划、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国家推进现代物流规划等的研究、修改或专家评审。她还是全国一些省市经济顾问、多家经济核心期刊的学术委员会或编委成员。

有鉴于此，在她的系列文集出版时我非常愿意作序，并大力推荐。希望她的研究成果早日面世并引起决策者、研究者和应用者的广泛关注，也相信其研究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会被重新认识和发现。也希望更多的经济学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以高度的国家责任感，以维护国家权益为己任，不懈地进行更有理论含量、战略含量和政策含量的创新研究，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序二

刘遵义

第一次认识陈文玲是在香港中文大学，2009 年她作为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带队到香港调研建立粤港合作框架及新形势下香港定位问题。在校长办公室，文玲带领调研组与我进行了深入探讨。之后，他们的调研成果得到国家主要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转化为粤港合作框架中重要表述。低调、扎实、深刻和谦虚，是她留给我的初步印象。

最近几年，在董建华先生主持下，我作为课题执行小组组长，文玲作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长，与商务部研究院、美国战略研究院等智库进行合作研究，共同完成了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中美未来十年经贸关系研究》。2013 年 5 月底和 6 月初分别在美国和中国发布，在中美高层和两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玲不仅亲自操刀，撰写其中重要章节，而且带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团队，完成了 12 份专题研究报告并提供了若干参考材料，对整个课题提供了重要支撑。董先生和我以及参与课题的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不仅高度评价文玲本人的研究成果，对她组织重大课题的能力和效率也甚为赞赏。

最近文玲找到我，告诉我她将出版多年的研究成果：《中国与世界——以中国视角解析国际经济（上、下）》《透视中国——中国宏观经济报告》《透视中国——中国现代流通研究报告（上、中、下）》《透视中国——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上、下）》《透视中国——中国相关国家战略研究报告（上、下）》《透视中国——中国现代社会信用与文化研究报告》等著作，每部著作大体分为：理论研究成果选编、影响决策的研究成果、实证研究报告、一些重要的学术讲座或重要会议发言等几类。这些研究成果是作者在不同时期对不同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大部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具有独特的、有份量的价值。文玲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除了在现代流通理论上公认的贡献之外，她的突出特点是在自己独特的岗位上笔耕不辍，在战略研究、决策研究和政策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少研究成果被国家决策采纳。

文玲非常勤奋，出版近 30 部著作和译著（其中合著 10 部），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等 300 多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报刊资料摘编等权威刊物全文刊载近 40 篇，摘编超过百篇，是近年来被摘编文章最多的学者之一。我为她的研究成就由衷地感到高兴，也感佩她的勤奋努力的精神与创新思维的研究能力。

知识是无尽的生命和丰富的创造，是道法自然的更替与人生价值实现的进程。人类的“知识殿堂”是一座丰富多彩的文明汇聚，每一位学者、每一个国家创造的独特文化都是这座殿堂里的瑰宝。经济学研究是人类“知识殿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发展是动态的、是多元多样多变的，把若干经济活动现象上升为理论再转化为行动的指引，这本身就是文化创造、知识创造和思想创造。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知识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在征途中，往往需要一霎那的电光照亮道路，使我们奋勇向前、不再迟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文玲作为见证者、参与者和研究者，她是幸运的，她被那一束束电光照耀；她又是杰出的，总能闪现出思想者的智慧之光。

环顾世界，我们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各国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界摒弃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和思维定式，重新梳理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梦想、共同追求和共同未来。需要经济学家作出更大的努力，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更宽广的胸怀和更睿智的创造性研究，为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贡献智慧。这是每一个经济学家的天职，也是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每一个经济学家的骄傲。

在文玲重要系列著作出版之际，我对她表示真诚的祝贺，也愿她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是为序。

（作者为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胡佛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序三

樊 纲

我国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实践，给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带来强大的动力和巨大的活力，实现了空前的变革，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快推进，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机制根本转换，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

我们面临的历史机遇前所未有的，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变革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每一次变革的发生、发展都有着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实践性。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研究工作者，应以研究重大国是，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为己任，以站在时代前沿诠释时代变化的理论内涵、全身心投入对这个伟大变革进行深入研究为己任，深刻关注并融入正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的我国伟大变革历史，揭示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某些理论和某些实践的内在规律，对其做出合理而富于创新的解释，提出切实可行的良策。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陈文玲《透视中国》系列论文选集，正体现出这一宝贵精神。

其一，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书中所收录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表现出作者研究的创造性。作者立足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站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前沿，在进行每一个研究领域时，首先能从理论上进行阐释，从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特点进行梳理和理论概括，力求能挖掘与揭示每一项研究对象的本质、内涵及规律，探索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譬如对于现代流通的研究，作者通过对一系列经济现象的深入分析，从理论到实践揭示了全球现代流通的发展趋势和特征，概括其主要表现形式，并对现代流通的理论内涵作出了新的理论界定，构筑了一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流通理论体系。可以说，任何一项研究，最难的是基础性、原创性的研究。这套论文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创新性思维的运用。

其二，研究成果具有前沿性。作者以一个学者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独有的责任感和敏

锐性，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抓住特定时代重大的前沿性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从国际问题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中国相关国家战略研究到现代流通研究、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和现代社会信用体系与文化研究，作者所研究的这些问题，可以说几乎都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前沿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证价值。有的问题作者跟踪研究了数年，有的问题虽然是近几年的研究，但是作者全身心投入，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断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并取得很有深度和厚度的研究成果，这是令人赞赏的。如对国际战略和国际经济的研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对现代社会信用体系的研究、对药品流通问题的研究等，提出的思路 and 观点对于推动该方面的国家决策和该领域的学识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风起于青萍之末”，作者的这些前瞻性的研究，有很多文章尽管发表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现在看来仍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其三，研究成果具有实证性。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工作者，陈文玲注重研究问题的实证性。大家共知，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来自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的契合，是我党制定正确政策和方针的基石，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收录于本套书中的每一项实证研究成果，可以说都是陈文玲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的结果。譬如对于国家相关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她都是真正到第一线作深入的调查，必要时进行暗访，取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得出来自实际、符合实际的概括和判断，从而提出好的工作思路和合理的政策建议。

其四，研究成果具有实用性。该套论文集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一项好的研究成果，它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应用于现实实践，真实地再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和内涵，有效地影响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收录于本套书中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曾得到过社会的关注和应用，一些研究成果受到决策层的重视，学以致用、研以致用，文以致用，这是值得提倡的。

40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字里行间忠实地记录着作者求学、求研、求业中孜孜探索的艰辛与甘苦，持之以恒的毅力与决心。这让我想起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苦涩探求新知的道路所给予的诗意般描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正因为作者有为祖国、为人民、为党的事业“独上高楼”的勇气和“终不悔”的决心，才有了今天“回头蓦见”的功底和积累。

（下转第 124 页）

创新经济理论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高端论坛暨陈文玲著作发布会综述

摘要：中国经济高端论坛暨陈文玲著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论坛围绕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对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方案和中国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和深入交流，旨在创新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思路，探索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之路。同时，本次论坛以陈文玲教授著作的发布为契机，探讨了学者应具有的境界和修养，经济学家的使命与担当等问题。本次论坛无论是在经济理论方面，还是在学者修养方面都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和见解。

关键词：中国经济高端论坛 创新经济 政策研究 智库

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部署，2016 年 7 月 4 日上午，南开大学、中国经济出版社、南京市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了中国经济高端论坛暨陈文玲著作发布会。

本次论坛秉承创新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思路的宗旨，围绕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对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方案和中国议题开展了深入和广泛的讨论。此外，本论坛还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的系列著作进行研讨。陈文玲教授的系列著作部分再现了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并迈向世界强国进程

中某一时段、某一决策或某一问题的过程，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精神和为国思谋的思想境界。

此次论坛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副社长毛增余主持开幕式，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分别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秘书长张大卫主持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委员会主任王春正、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作了精彩发言，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深度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和见解。

一、“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及对策

（一）利用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指出，从 2010 年第一季度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 2016 年第一季度降为 6.7%，下行压力巨大。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会受到自身体制机制、结构问题的影响。另一方面，当前世界发达国家还未真正走出 2008 年经济危机的阴霾，消费增长缓慢，这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出口增长的疲软。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体，其经济增长无疑会受到负面影响。林毅夫认为，要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就要适度扩大国内需求，而投资和消费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两个重要途径。从投资来看，一是即使仍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但中国目前产业基本上都处于中低端，因而可以向中高端产业去升级和投资。二是基础设施也有继续完善的空间，中国过去投资的基础设施是连接一个城市和另外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机场和港口等，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地铁和地下管网仍严重不足。三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加强以及城镇化进程的需要都带来了良好的投资机会。除了投资机会多之外，中国可以动员投资的资源也非常丰富。一方面，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在全世界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所以利用积极财政的空间还相当大。另一方面，中国的民间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近 50%，属于储蓄率较高的国家，可以用政府的资金来撬动民间投资。因此，林毅夫教授提出建议：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保持 6.5% 的增长速度是可持续的，而且可以为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和贡献。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结合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阐述中国改革政策落实艰难的原因。

他认为，现实当中的利益冲突是改革最重要的障碍。经济学研究帕累托改进，而帕累托改进是一个非常弱的判断标准，没有任何人受损失，有一个人得到好处，那一定是改进了。如果有一个人受损失，这个改进究竟是对还是错，就不清楚了。经济学上最简单的例子是反垄断，反垄断对很多人有好处，但是对垄断者没有好处，反垄断是改进了还是没有改进？经济学解释不了，所以有了政治经济学。严格来说，政治经济学是用来处理这种非帕累托改进的情况：当有冲突的时候，有人会受损失，有人会受益。公共选择理论和各种决策方式的研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改革等问题都属于这一领域，这是经济学者要研究的，特别是在现实政策研究当中可以作为理论背景，否则就很难理解现实。现在中国的很多政策，特别是一些难点要想落地，如去产能、去杠杆，一定要考虑利益的冲突、利益的补偿，考虑打破利益均衡不是零和博弈，肯定有剩余，有新的利益增长。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如何进行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安排，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这是经济学家进行对策研究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十三五”时期中国扩大对外开发的必要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针对对外开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过去 30 多年，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主要原因是中国把握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得力的举措，实现了趋利避害。回顾过去 30 多年开放的历程，会发现每隔 10 年左右，中国就会有一些重大的对外开放举措。1980 年中国建立经济特区，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把中国的开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新世纪以后，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外开放推进到了全面体制性开放的新阶段。中国重大的开放举措给发展和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这是开放的红利。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需要在对外开放领域有更重大的举措，从而将中国对外开放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也可形象地称之为“二次入世”。“二次入世”不是指再加入某一个多边的经济组织，而是由一系列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双边或者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协议所构成的，如正在谈判的中美投资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

第一，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总体来讲，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是利

用国际与国内的资源和条件来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即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常态有很多新的特征，包括增长速度的换挡、结构的升级、动力的转换。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背景下，中国需要进一步地调整开放战略，需要采取新的重大开放举措，从而更有效地利用外部的资源和市场来推进中国在未来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发展。因此，中国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要调整战略，在全球整合高端生产要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所以，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是适应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转型发展的需要。

第二，适应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新形势的需要。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增长乏力，与此同时新一轮经贸规则正在制定当中，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或者说“3T”代表的平台，正在构造一系列新的国际经贸规则。这些国际经贸规则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也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完善对外经贸新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中国不能与时俱进地调整外经贸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在新一轮经贸规则中就会陷入被动。所以，在这个变化的环境下，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来应对挑战。从内部来看，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过去主要是依托低成本的劳动力来参与全球经济，迅速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支撑的出口大国。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正在发生转换，传统的低成本在快速地削弱，所以近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不断地下滑，2016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既有外部需求不振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比较优势的转换迫切要求中国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方面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需要中国调整发展战略，增强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发展战略的调整，来提升竞争力的升级。

第三，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改革和开放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对外开放为改革提供了动力。全面深化改革期间，中国需要更加强劲的动力。所以，中国签订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协定，构造面向21世纪高质量的自由贸易网络，这一系列开放领域的重大举措，就像过去加入世贸组织一样，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劲的动力。同时，扩大对外开放有助于克服中国当前经济下行的困难，进一步地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激发活力，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

（四）中国经济下行原因分析及应对措施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总结了当前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下行原因的

解释。第一种解释是阶段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形势下滑是因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 1.1 万美元，再加上本身基数很大，所以会从高速增长跌到中速增长。第二种解释是外因论，一些学者将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归结为外部需求的不足，如 2008 年美国的次贷危机、2011 年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都导致了我国出口的减少。第三种解释是成本论，即税负过重、人口老龄化等成本压力造成中国经济的下行。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幅度的下降是三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一是人口老龄化严重；第二是税费过重，利息成本和交通成本确实太高，制造业无利可图；第三是消费的外溢和资金的外溢，服务贸易逆差明显。他认为，一是采取短期的经济政策。供给侧的短期政策是中国最需要的，但目前中国仍没有出台供给侧的财政政策，2016 年 1 月—5 月财政、税收的增长率远远超过 GDP 的增长。中国政府需要尽快通过减税和减费、降息、刺激经济增长。二是开放服务业投资。中国民间投资的下滑和外流是因为制造业产能过剩，而服务业仍未完全放开，放开服务业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回升至关重要。三是开放新经济领域的投资，如通用航空领域的开放，让民间资本流入这些领域。四是创新具有颠覆性的技术。最重要的是，需要盘活体制内的技术资源，提高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转化率，开放其技术资源。

（五）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把握和解决当前主要矛盾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逢锦聚围绕“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把握和解决当前主要矛盾”的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学好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很丰富，包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论把握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包括强化创新驱动，强化改革、调整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包括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改善民生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的组成部分。运用这些基本原则分析和把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依然是落后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产业结构急剧升级和优化，这些矛盾虽然在需求领域也有所表现，但主要还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如何看待这些矛盾，需要三方面的把握。一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由于世界经济外因的影响，矛盾逐渐突显出来。二是这些矛盾表现出的国内经济供需失衡是结构性的。近几年，中国

国内经济总供求是基本平衡的，物价和就业基本上处在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经济总量发生严重失衡是局部性的，而不是全局的；是行业性的，而不是整体的。三是即使局部行业的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钢铁、煤炭的产能过剩主要是落后的产能过剩，而先进高端的产能还不足。因此，中国产能的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通过中国经济内部的自我调整，可以得到缓解和解决。

第二，解决供给领域结构性问题需要长期努力，需要依靠科技创新，结构调整。短期和长期的结合上，需要依靠投资和改革开放。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依靠外需来拉动经济已不太可能。目前，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要广泛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来加快结构调整，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见效慢，周期长。所以，从短期和长期的结合上看，投资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投资既可以拉动供给，也可以调整产业结构。没有一定的投资，调整将是一句空话。近几年，中国的投资出现了放缓的迹象，民间投资下降非常明显。为了防范和解决投资放缓问题，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大民间投资，为其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二是适当放松信贷，缓解效率和资源的不足；三是加强政府投资指导和服务，诱导企业选择投资方向，提振民间企业投资的预期和信心；四是国家适当给予企业减税让利，使企业有利可得。

第三，抓好就业，改善民生，为解决重要矛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就业是非常重要的，以人民为主体，一切为了人民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中国的供给能力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的个性化物质需求和生态环境的需要。改善民生首先要解决就业问题，因为结构的调整势必会造成一些工人下岗，如何在这种背景下抓好就业是改善民生的当务之急。当然，除了解决就业问题，还要通过深化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医疗卫生制度，大力发展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改善环境等，这些都是改善民生的着力点。要把改善民生作为首要大事，以便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保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实施和经济发展重要矛盾的解决。

（六）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白津夫认为，当前很多学者和专家在看待和研究经济形势时，往往沉醉于原有的套路。其实现在的中国经济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总量中包含了大量新经济，却没有被现有的统计体系所统计，这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被称

为“溢出”理论。如果把这一部分加入到整个中国经济的统计中，中国经济的总量乃至中国经济增速会有显著提升。根据官方报告披露，2015 年信息经济的规模已超过 10 万亿。根据发改委权威人士透露，2015 年仅共享经济就达到 2 万多亿。这些溢出的经济部分大多不体现在 GDP 统计里，没有办法按传统统计指标体系统计出来。此外，经济学家有一个比较接近共识的评价，即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维持在 8% 是最适当的，因为 GDP 的 1 个百分点，关乎 100 多万人的就业。但 2015 年中国 GDP 增速小于 7%，就业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达到历史上空前的 1300 万人的规模。就业的增加一定与新经济的吸纳密切相关，因此，要学会用新视野、新方法来研究面临的新问题。

二、政策研究的专业化、知识化和职业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针对政策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政策研究需要专业化、知识化和职业化。

第一，政策研究需要专业化。胡教授以陈文玲教授的著作为例来阐明政策研究的专业化。他认为，陈文玲教授的著作可读性强、信息量大、覆盖范围广。如她对现代流通基础理论的研究，提出了社会化流通和现代流通理论，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前瞻性。这种创新既包括理论价值，也包括实践价值；既包括学术价值，也包括应用价值。这对未来的学者研究经济史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and 历史价值。这就是政策研究需要的专业化。

第二，政策研究需要知识化。中国需要发展各个方面的领域，将不同的学科进行综合凝练，否则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专业化是不够的，那样只能看到树木、树叶，在知识化之后，才能够形成总的森林，才能将宏观和微观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政策研究需要职业化。研究中国问题需要持续地跟踪和长期地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知识的长期积累。中国需要陈文玲教授这样的学者型和专家型的官员，即职业化官员。这样的官员可以降低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知识与信息、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决策的不对称性、不平衡性和不完全性。

第四，政策研究要转化为政策影响力。从政策报告来看，陈文玲教授 50% 的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70% 的报告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领导的重视。这充分说明把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政策研究要留下白纸黑字。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学者非必为仕，而仕必为学”，衡量自身所学最关键的指标就是所写的文字和发表的著作。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

留下宝贵的知识价值和历史价值。

三、智库研究者应具有的境界和修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在致辞中对陈文玲教授及其系列著作进行了介绍。他指出，陈文玲同志长期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参与起草了大量中央、国务院文稿，在理论研究和建言献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此次陈文玲同志整理出版的系列著作既是她自身多年来重要研究成果的结晶，也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思想产品的部分展现，对理论研究者、政府决策者和企业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认为，智库工作者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既要有学者的学术精神和追求，也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创造出能影响国家决策和影响世界的思想产品。国家正在创造更好的社会氛围，鼓励不同的观点，构成宽松环境，容纳多样性、建设性和原创性的思想。多样化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想的发展和繁荣，正在形成更有影响力的中国智库群，从而在推动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委员会主任王春正也对陈文玲教授的学术贡献和精神风貌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介绍说，陈文玲同志深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课题，她编写的《中国宏观经济报告》展示了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的趋势判断、理论研究和决策建议；在担任《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初步研究》课题组长期间，陈文玲同志亲自组织并撰写了课题报告，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从理论上进行了研究探索。陈文玲同志长期在国家高端智库工作，参与过大量重要文稿的起草，并紧密围绕国家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和深入研究，其中有很多理论观点、意见和建议受到有关领导、部委的重视和肯定。他指出，陈文玲教授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和政策研究工作者，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从事国家战略和政策的研究，以国家责任感和敏锐性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着力研究改革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努力诠释理论内涵，提出切实可行的相关战略选择和政策建议。陈文玲同志工作勤奋有激情，始终坚持创新思维和求真务实精神，在研究中具有敢于直面问题，敢于直言的品格，体现了一个国家智库研究者的风范和修养。这也应成为体制内外智库工作人员的品格和情怀。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用六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发言：感言、点评、期望。感言包括两句话：一是现在是需要经济学家的时代；二是现在应该是中国出经济学家的时代。他指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仍未结束，世界经济还处于相当大的困难之中，而且还将持续下去。这些问题需要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来回答。所

以，现在是需要经济学家的时代，需要经济学家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案来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当有这种使命感。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30 多年的快速发展经验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并广泛吸收世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经验。而这些经验给中国、世界都带来了可复制的经验，理所应当有经济学家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学家是时候应当提出经济发展模型和理论来解决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中国应当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陈文玲教授的著作有三大特点：一是“顶天立地”，既为中央领导出谋划策，又注重调查研究，所有的成果都是用脚写出来的。二是宏观和微观结合，陈文玲教授注重调研，调研是微观的，而形成的成果是宏观的。立足于微观，形成宏观的成果。三是虚实结合，陈文玲教授的著作很多从实际调查出发，而最终形成的研究成果，常常形成带有哲学思辨的思想。他期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更好地关注现实，提供思想，直面问题，提供对策。中国目前需要出现伟大的经济学家。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杨书兵用“量大、质高、面广”六个字来概括陈文玲教授的著作。“量大”是指陈文玲教授的著作一共有 33 部，从纯理论研究来讲，这个数量是相当巨大的。陈文玲教授作为政府工作者，既要起草文稿，又要进行政策研究，工作量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完成如此数量巨大的著作很了不起。“质高”是指陈文玲教授的研究成果总共是 200 多篇，其中得到批示的有 50%，即 100 多篇，而且其中 70%还受到其他部门和地方领导的重视。她的研究成果是开创性的，对推动政策的出台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面广”是指经济类的专业在国家部委包括几十个，每个专业对应着一项工作，而陈文玲教授的著作几乎都有涉猎，如战略决策、粤港和粤港澳合作、中部崛起、宏观经济、贸易改革、对外开放、食品药品保健、医疗器械安全、信用体系建设、流通物流、三江源研究等。同时，他也对陈文玲教授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寄予期望。在他眼里，陈文玲教授是一位文稿撰写高手、一位政策咨询专家、一位著名的应用经济学家，还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他认为，陈文玲教授的成就与其高超的天赋、孜孜不倦的勤奋以及敏锐准确的判断力是密不可分的。最后，他对陈文玲教授提出了四点希望：不忘初心、永葆青春、劳逸结合、继续前进。以此激励陈文玲教授继续前行。

南京社科院副院长李程骅以“经世济国，智慧建构，经济学家陈文玲的探索 and 贡献”为题进行了发言，深度评价了陈文玲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当前变革时期对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所作的贡献和价值认知。

第一，精准研判“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国际挑战，紧紧把握世界经济的脉络，为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言和理论支撑。2009 年至今，陈文玲教授在《南京社

会科学》杂志发表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新结构的构建》《2012—2013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和展望》《把握“新常态”：2014—2015 年全球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以及《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等文章，每一篇力作都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全面地回顾和总结，并对世界贸易的发展、世界治理模式的变革等进行专门地分析，同时对当年世界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前瞻性的判断。在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全面研究的基础上，陈文玲教授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成为解读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的重要专家，具有权威性的话语权，而且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判断。如在《把握新常态：2014—2015 年全球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一文中，陈文玲教授根据在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的态势下，提出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将同时进入低速增长的论断，目前来看，这一判断是准确和科学的。在 2016 年发表的《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一文中，陈文玲教授明确提出了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思维碰撞，新旧动力转换，新旧力量对比，新旧规则交替的动荡期、转型期、变革期和调整期，呈现出“三低”“三失衡”“三分化”的总括特点，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第二，立足前沿，直面问题，为国家经济、社会改革提供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深化“中国道路”的理论阐释、规律认知和价值追求。在关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陈文玲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也有十分独到的研究见解。在《紧紧把握战略机遇，深刻领会四个时期》一文中，陈文玲教授坚定地提出了“中国发展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观点。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研判》一文中，陈文玲教授在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审视之后指出，未来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将成为全球市场规模增长最快和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进入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特别是 2020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判断不仅是立足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的总结，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的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政策价值，而且展现了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第三，经世致用，聚焦难点，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领域提供战略设计，突出创新思维、理论研究对实践行动的指导作用。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仅能够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同时能够俯察细微，审视具体，用自己的智慧解决现实难题。陈文玲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她对于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的研究成果，直接发挥了政策效用。陈文玲教授一方面立足宏观，另一方面从具体的经济发展领域出发，对中国

的经济发展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参考。在服务贸易方面，她认为中国已具备发展服务贸易良好的政策环境，应加快制定并实施推动其加快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提高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能力。在创新城市发展方面，应当将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创新城市发展理念，积极探索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路。此外，她还从现代流通的角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进行诠释，并指出现代流通战略在中国相关战略中的重大作用。

陈文玲教授对参加此次论坛的各位嘉宾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她表示，她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能够结识一批兼具思想深度和人格力量的大家；她感谢自己的工作岗位——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能够与一群智者、知者为伍，共同进行国家战略研究、决策研究和政策研究；她感谢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给予了她把知识转化为文化修为、思想灵感、研究方法和工作效率的能力并获得诸多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马博飞

国计与民生——黄国雄教授追思会暨中国流通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研讨会综述

洪 涛

摘要：著名经济学家黄国雄教授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因病逝世。由“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和北京工商大学主办，《北京商报》协办的“国计与民生——黄国雄教授追思会”6 月 19 日上午在北京举办，国内商品流通业的代表以及黄教授的学生、友人参加了会议。黄教授是商业经济理论研究的泰斗，他提出的“流通产业是基础产业”观点震撼了流通业界，并写入相关文件，为我国流通产业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会人员在追思黄教授的同时，纷纷表示将继承他的精神，继续为中国流通产业的改革与发展而奋斗。

关键词：黄国雄 流通业 追思 研讨

作者简介：洪涛，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 年 6 月 19 日上午，由“中国流通三十人论坛”（G30）、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和北京工商大学主办，《北京商报》协办的“国计与民生——黄国雄教授追思会”在北京举办。国内商品流通业的代表以及黄教授的学生、友人等 100 余人参加了追思研讨会。会议由 G30 副理事长马龙龙和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张树荣共同主持。黄国雄教授是著名经济学家、商业经济理论研究泰斗、G30 专家顾问、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原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因病在京逝世，享年 80 岁。

一、一生魂牵商界，等身著作谋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马龙龙：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送别黄国雄教授已经一个月；这里也是一个特殊的场地，在这里黄国雄教授进行了最后一次演讲。黄老师是个战士，他不能离开战场；黄老师是个哲人，他不能不去思考和表达；黄老师是个好人，他对流通业做出的贡献不可泯灭。逝世不是终结，他给后人留下的是无尽的精神思想和理论财富。我们把中国流通事业更好地继承下去是对黄老师最大的缅怀。黄老师是 G30 的顾问，对 G30 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印象最深的是，黄老师在一次会议之后对我说，G30 组建了中国流通联盟、中国流通会议联盟，下一步应该组建一个中国流通媒体联盟，让中国流通的声音更响亮、影响更大。

G30 理事长黄海：同在座的许多人相比，我和黄老师相识时间不算长，我们是在 1990 年底认识的。当时，我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分配到原商业部的商业经济研究所，我没有学过商业经济，也没有从事过商业经济的研究。在一周后的第一次商业经济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他。会后黄老师说：“我清楚你的情况，商业经济研究也需要一些新人进来，以后专业上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确实没有客气，凡是有不清楚的事情就向黄老师请教，可以说我从他身上学习到的东西令我受益匪浅。他不仅在理论上给予我巨大支持，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给予我巨大帮助。如，某年山东某地出现了消费储值欺诈现象，吴仪副总理让我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及出现的问题，我当时专门请教了黄老师。他带着一个博士生就这个问题专门到我办公室，通过各种公式、运算揭露了这个骗局的本质，戳穿了骗局的阴谋。黄老师为之奋斗一生的流通事业不能说已经很完善，但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流通产业是基础产业”的观点，不仅取得了广泛共识，而且已经写入了相关文件。近几年，黄老师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我们的商品是多了还是少了，市场是饱和了还是供给不足？现在看来，他虽然没有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其实质就是这个问题。2015 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就是从商品市场上提出来的，一方面产能过剩、库存过剩、商品饱和，另一方面结构失衡、供需不配套。我想这也是黄老师的贡献之一。总之，我非常感谢黄老师对我的帮助、指导，不然我不可能胜任这份工作。同时，我也要告慰黄老师，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流通事业现在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流通体制改革和发展问题，开展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工作，目前试点工作正在进行，这也是流通问题首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作出部署。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安惠民：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黄国雄教授的追思会，纪念他

为中国流通产业的改革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我和黄老师认识多年，他曾任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两届副会长、中国商业网点联合会副会长，也是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他在中国商业领域任职很多，可以说在许多全国流通业的会议上都有他的声音，在全国流通领域的企业中都有他的学生。黄老师一生平易近人、办事公道、和蔼可亲。记得他在任中国商业网点联合会副会长期间，我们每次开会都希望他参加，因为他能比较客观公正的讨论一些事物，提出可行建议，得到在座每一个人的认可。黄老师在从事商业经济研究之前，在贵州省粮食厅工作了18年，当时我在粮食部工作，所以聊起当年的共同经历感到很亲切。黄老师走上教学工作岗位以后，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善于钻研、善于总结。他培养了一大批博士生、硕士生，桃李满天下。伴随着中国流通改革发展的过程，他撰写了大量的论文、提出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可谓硕果累累、著作等身。让我们永远怀念黄国雄老师。

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张耘：实事求是和求真、立德、勤奋、创新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的校训，作为走过这两所大学在商业经济领域具有极深造诣的知名学者黄先生，是校训的忠实践行者。黄先生致力于中国流通的改革与发展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尤其是为带领同行们将中国流通的理论研究向前推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倾注了他的智慧和全部热情，最终凝结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和育人成果。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追忆、学习和颂扬他的光辉人生，就是希望颂扬和弘扬他的智者仁者风范。这次会议应该是颂扬黄老师学术思想的起点，我们今后要将他的思想和精神更好地传播出去，推动中国流通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长高铁生：近几年，黄老师很重视在哲学高度总结流通发展和创新经验。我们不应该被流通领域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所迷惑，而应该像黄老师一样研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将流通中的几个关系梳理清楚。一是本次论坛的主题“国计与民生”的关系。流通领域是既关系国计又关系民生的重要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新常态等关系国计的发展战略，都离不开流通的支持。至于流通关系民生的现实问题更为国人所关注，并屡有切肤之感、甚至锥心之痛。以粮食问题为例，“国外粮食进市场、国内粮食进仓库”，粮农无所适从等矛盾突出。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众所周知，流通与市场是天然的联系，流通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和发轫的重要领域之一。中国政府是中国流通发展的重要推手，但毋庸讳言，也为中国流通健康发展“创造”出一些问题，形成一些痼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深刻论断，并期待出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完善结合，为此形成了一系列文件，但至今二者的关系仍不理想。最近，中央巡视组对一些与流通有关部门的意见反馈很能

说明问题。希望在“十三五”流通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中，能借助流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决策建议，收到较好的成效。三是实体与虚拟的关系。电商攻城略地，实体商业被动招架。对这样一个趋势的价值判断，可谓歧见纷呈。总的来说，这是现代信息技术对流通产业的冲击与再造，既是逆袭也是助推，有不可避免的一面，但也不会从此脱实就虚，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喧嚣与沉淀，会出现新的虚实平衡。但是，不管今后出现怎样的云来网去、虚拟迭代，实体产业都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消费永远离不开体验，与体验天然契合的商业实体性不可能消亡。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这种虚实之间相互博弈、合理切换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能够提供既切中肯綮、又贴近实际的深度理论分析和鲜活的案例参照引导。在这方面，很有必要以黄老师为学习榜样。四是创新与回归的关系。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商业业态总是不断经历推陈出新。科技的进步、市场的完善、消费的升级，为业态创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几乎无限的可能性，变与不变是流通业发展的永恒主题。业态的不断创新和商业本质的顽强回归，贯穿于流通业发展的历史里程。创新就难免偏离，回归就伴生保守，只有深刻揭示创新和回归的真实内涵，才能使流通革命少走弯路，修成正果。五是国内与国际的关系。我们讨论多年的内外贸一体化，实践正在给出答案。国内自贸区的建设、国际自贸协定的签约、跨境电商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越来越把国内外市场连接在一起。可能不久的将来，国内竞争就是国际竞争。在这种新形势、新常态之下，流通政策如何维持公平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民众利益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等待我们的回答。六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一论断对流通领域同样适用。记得有一句流行语告诫人们，“不要走得太快，别把灵魂落在后面”。我们不希望出现流通发展太快，把理论思辨远远抛在后头的尴尬局面。中国在流通领域对发达国家追随式的学习肯定不够用了。中国的流通实践表明，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发达国家流通的照搬与复制。这就要求中国流通理论必须独立前行。现在正需要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像黄国雄老师那样，站在哲学高度上总结中国流通实践经验，创新中国流通理论，为现实提供更全面、更及时、更切实的指导。悼国雄同志：“国盛雄事在，黄兄有宏论，基础数流通，先导如经论，哲学化商道，品德立学问，神州布桃李，寄望后来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原首席顾问丁俊发：应该说，黄老师是流通领域的一位英雄人物，他是带领中国流通研究人员冲锋陷阵的人。我讲两件具体的小事。一是 2010 年姜增伟同志让我为国务院写一份有关内贸流通的报告，他给我一些商务部有关资料的同时，

还特别给我两份黄老师的报告，并告诉我报告中有很多观点值得参考。二是在我的《中国流通》一书中，黄老师为我写了书评，在肯定我书中观点的同时，他特别提出了流通产业是基础产业的看法，让我印象深刻。未来，我们要像黄老师一样从国计与民生的高度推动流通事业的发展。在当前经济发展趋势下，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来贯彻流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研究流通问题，看到流通业是一大短板；要把握当下的风口是互联网+，未来的风口是供应链+。我们应该继承黄老师的精神，将流通产业真正发展成一个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我同黄国雄老师一起参加了很多会议、论坛、研讨会等，从黄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提出了流通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我提出了流通的先导性作用，流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及作用已经写入了相关文件。目前，流通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革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现代流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我国总的发展战略、引领性战略和长期战略。二是在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流通成为经济发展引领性的力量。三是国际竞争日益聚集到流通规则的制定和重塑上。四是新业态蓬勃发展要求流通的大发展。黄老师提出了一系列关系国计与民生的重要观点。在他的身上有风度、有风骨、有风格。痛悼黄国雄先生：“叶密斯人逝，春深步履迁。诤言犹在耳，笑貌亦存眠。倾力催桃李，超然写论编。思君追往事，泪水已潸潸。”

金鹏期货董事长常清：黄国雄教授是我的老师，他跟我讲的一段话让我记忆深刻。他说，读书过后要用自己的思想进行原创性的思考。这一点对我的影响很大，一直指引着我的工作和教学。我现在跟学生讲如何思考问题，就是要有原创性。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平：黄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在我从事连锁经营的20年中，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1993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举办连锁经营大会，在压轴的零供双方辩论论坛上，黄老师作为专家学者坐在中间方，当时零供双方的辩论十分激烈，但他的观点不仅得到了零供双方的认同，也得到在座每一位嘉宾的认同。在黄老师逝世的消息传来之后，当时在广东东莞的连锁经营大会上，诸多同行都表示十分震惊，同时也表达了对黄老师逝世的悲痛之情、哀思之意。今后，我们只有更好地工作，将我们的流通事业发展好，才能告慰黄老师在天之灵。

河北经贸大学校长纪良纲：在我的学习和工作生涯中，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重大，其中一位就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黄国雄教授。他研究问题的视野、研究问题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对我一生学习的影响巨大。现在，我仍然在给学生们讲黄老师的商业经济思想和方法。我在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毕业时，黄老师是贸易经济系主任。

他跟我们说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让我们研究商业、热爱商业、不要离开商业。所以到河北经贸大学工作后，我一直没有离开商业经济研究。河北经贸大学自从 1978 年建立以来，一直将商业经济作为重要发展学科。河北商业经济学会也是财政部支持的河北省四个协会之一，以后我一定会继续研究商业经济。

北京全聚德（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邢颖：今天我是以双重身份来缅怀黄老师。1997 年之前，我在北京财贸干校任教，黄老师与李金轩老师等一大批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到我们学校指导召开研究生课程班。课程班上的 40 多人现都成为北京商贸系统的领导骨干。1997 年 11 月我调任至全聚德工作，黄老师在连锁经营等诸多方面又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北京八里桥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赵尔烈：我和黄老师认识已经 30 多年。我有两点感受，一是他是忠厚长者，二是他堪为师表。与黄老师相处，说话办事不用设防。黄老师的为学可谓跟形势但是不跟风，绝非那种象牙塔式、脱离实际的研究。

《商业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刘建湖：黄教授给我的印象，一是著作颇丰，他有很多著名的文章都发表在我们杂志；二是行色匆匆，他参与了很多会议和活动，在 2003 年“非典”期间，依然参与我们举办的重要论坛会议，令人十分感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曹厚昌：黄国雄老师仙逝让我感到非常突然。我跟黄国雄老师、李金轩老师是大学同学。商业部商业司的本科教科书《现代商学通论》是我俩合著的，出版无数。我将黄老师概括总结为三个字：一是“敢”，敢为人先、敢于突破，这一点我不如他；二是“专”，对商业非常专注；三是“交”，就是交朋友，包括新闻界、企业界、学术界、政界等。对于继承黄老师的遗愿，发展我国流通事业，我们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互联网+”的问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对流通的升级冲击非常大。二是拉动消费的问题。应该重视老龄化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此外，应该重视传统商业业态的作用，比如菜市场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金轩：以上同志的发言是对黄国雄教授的肯定，也是对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的支持和肯定。大学是出思想的地方，是从事学科教育的地方。国雄最大的特点就是研究能力非常强，同时他又于毕业后分配到贵州一线，对商业政策的出台、商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比较熟悉，回来任教后比较适合搞研究。思念国雄：“逝讯传来突然，共事从未红脸。遇到难处相帮办，友谊之路漫漫。驾鹤西去孤单，自此天上人间。思念！思念！思念！”

二、以身作则关怀倍至，一代恩师益友桃李满天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黄老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就是精神遗产。我是 1993 年

从地方作为高级经济师同等学历考入中国社科院攻读商业经济博士学位的，1996 年毕业后带着全家人进京，那年 39 岁。从湖北进京到北京商学院工作，在这个转折时期，我十分忐忑，便带着家人慕名找到黄国雄教授和童宛生教授。我汇报情况后，黄老师给予我极大的肯定和支持。黄老师曾经在地方粮食局工作，童老师曾经在统计局工作，进京的年龄也与我差不多。他们告诉我，当时他们来到北京如何备课，对着录音机讲课、互听你讲我听等，鼓励我跨过转折关，对我影响至深。后来我们把北京工商大学的贸易经济系，做成了含国际贸易的大贸易系，贸易经济专业成为北京特色专业、流通经济学成为北京的精品课程。2003—2013 年北京工商大学贸易经济专业的课程建设、流通经济学学科建设，都离不开黄老师的支持。2017 年 3 月 15 日我就退休了，我还会继续继承黄老师的精神，把我们的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好。我们要继承黄老师的精神和研究方法。比如现在的研究多是采用西方的方法和模型，有些方法是不是必须的？难道除了“八股文”就没有其它创新吗？此外，流通基础理论创新需要更多的研究，如供应链、产业链、区块链等新的理论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贸易系主任、教授王晓东：黄老师的教学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在北京工商大学，后一段是在中国人民大学。黄老师的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流通产业是基础产业的论断，马克思的著述中没有，列宁的著述中没有，西方经济学中更没有。这是我们自己的专家学者通过理论结合实际提出来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博士培养采用主文献制度。目前，贸易经济系依然采纳的已故经济学家的文献只有两篇，一篇是林文益老师的文章，另一篇就是黄国雄老师的《论流通产业是基础产业》。而且，我们还会一直用下去。2015 年在黄老师最后一次讲演时，他有一句话让我很受触动，他说“现在我每月还要写一篇文章”。我们作为他的学生都做不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祝合良：今天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来参加这个追思会。自从 1990 年到人民大学学习以来，我一直在向黄老师学习。黄老师是一个好老师、好党员、好专家，为人师表、关心国计与民生、专心研究商业。黄老师曾经建议我出一本书叫《商经》，西方有《圣经》，中国历史有《易经》，还没有一本书写《商经》。其实，在《国计与民生》这本书的最后有 200 句非常经典的句子，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巨大的影响力。应该说这就是商业领域的《商经》。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教授刘勇：黄老师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学者。他的研究紧紧贯穿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他的思想连续产生着一系列重大的影响。黄老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利润多元化论，90 年代提出了百货业发展广阔的前景，90 年代末期至今他先后提出了关于连锁商业、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流通领域的众多观

点。这些观点无一不是具有广泛影响，无一不是对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黄老师提出的流通产业是基础产业的观点，是流通业界最有震撼力的观点，是对流通定位的最高总结。现在，我们很多同学已经有了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我们一定要像黄老师一样用心对待事业、用心对待家人、用心对待学生。

清华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零售研究中心主任李飞：我是一个“三黄派”，本科、硕士、博士都受过黄老师的教育和培养。同时，我也做流通研究，算是黄老师的一个传承人。当我劝黄老师将自己文章集中出一本文集时，他一直说要出精华的东西不能把文章随便凑凑。我将黄老师的文章和著作做了一个梳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黄老师的研究聚焦商品流通理论，学习、工作、研究都是这个专业和学科；二是黄老师的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采用的是经验主义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三是黄老师的研究奠定了商品流通理论研究的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提出了商业价值论、流通产业基础论、商业哲学、现代商品流通学体系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亚星：我是在黄老师从北京工商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时与他相识的，直至师从黄老师。我们既是师徒关系，又是同事关系。黄老师一是具有长者风范，二是真心关爱学生们的成长，三是勤奋和思考，只有勤奋和思考才能成就大师。

北京通厦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平：我很骄傲能够说师承黄国雄教授。《国计与民生》中多章都涉及商业地产，黄老师提出“市以城在、城以市兴”的思想，能够指导城市商业地产的发展。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任王轶：据中国知网统计，黄老师共计发表论文 170 余篇，在《北京工商大学学报》发表了论文 10 篇，其中 6 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我刊非常荣幸地成为黄老师发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刊物，其中有一篇论文《没有等价交换，就无法实现市场的双赢》在《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发表，这是黄老师的一篇遗作。

北京物资学院教授刘玉奇：我于 2007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黄老师的博士生。自 2006 年我就跟随黄老师在全国各地调研学习。这 10 年，我在黄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学习成长；这 10 年，黄老师从古稀、到耄耋到丰碑。10 年前，我陪同黄老师去洛阳，他以 70 岁的高龄率先垂范深入市场，深入一线调研、考察，全程参与交流研讨，亲自参与规划撰写、直接向市领导汇报。这 10 年，我跟随黄老师从洛阳到晋江，从阜新到绥中，从衡水到武清，每一次调研都让我受益匪浅。后来，我到北京物资学院工作，他把我扶上马，还要送一程，经常到我们学校开展讲座、论坛，帮我打开局面。

商务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杜昕然：我想在此将黄老师对我的一个震撼和一个影响表

达出来。一个震撼是 2012 年在陪同黄老师去辽宁省葫芦岛调研时，黄老师在动车上帮我指导论文，他一字一句地读，一字一句地改，足足将我的论文修改了 3 遍，3 个小时的车程一刻也没有休息。到达当地，吃过晚饭，黄老师把我叫住说，“这篇文章我想了想，最后还应该加上一部分”。那时那刻，让我震撼无比。黄老师全神贯注的精神让我们敬佩，黄老师专心致志的态度让我们汗颜，是我们一生学习的榜样。一个影响是在我论文答辩之际，我去向黄老师汇报论文情况，他指导我说，“小杜啊，答辩时要将老师的提问归纳、整理分类回答，如果做不到，说明一个人的归纳总结能力还不够”，这让我受益匪浅。后来在我的学习工作中，这句话给了我无限的力量，支撑我、指导我的工作和生活。

三、相濡以沫 62 载，情怀如山永相记

北京工商大学原教授童宛生：感谢 G30、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北京工商大学主办，《北京商报》协办这个活动。记得在今年 2 月 27 日黄国雄老师 80 岁寿辰之际，我说与黄国雄老师从 18 岁相识到 80 岁，共同走过了 60 多年的时光，不知道我们还能走多远。之后，不过三个多月，黄老师就离我们而去了，我觉得生命很脆弱，希望各位珍惜生命，保重身体。在他将要离开的那一天，我跟他告别时讲了三句话。我不知道他听见没有，不知道他有没有感觉。第一句话就是，我会好好照顾这个家，我在家就在。第二句话就是，让他放心，我会关心和照顾他在福建的 90 岁的老姐姐。第三句话就是，我在他晚年，没有从心里边支持他继续从事商品流通改革和发展的研究。到晚年，他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来写东西。每次写完，他说，我把我的观点跟你说说吧，但是我没有听，我说，退出吧。然而，今天听到在座的各位讲到的黄老师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在他希望给我讲的时候我没有听，我感到十分惭愧。但是，对于黄老师研究的学术观点、他对学术的看法，我是深有感受的。第一，他对中国流通的研究具有执着追求的精神。今年 4 月 14 日他出院，在住进重症监护室的前 9 天，他跟我说，“我还想写一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章，但是我的手直发抖，我的字越写越小”。我今天把他这篇文章的手稿带来了，题目是《对供给侧改革的几点建议》，我会把它整理出来。第二，他对中国流通理论的研究是务实的、是辩证的。他会随时矫正自己。比如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很懂，关于“互联网+”还是“+互联网”他纠结过很久。经过实地考察，他提出来互联网对实体业态具有较大冲击，但是对“互联网+”的应用，不同业态、不同地区、不同部门要区别对待。这些都是他不断思考、务实求真的钻研态度。

责任编辑：李蕊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6 年 7 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世界经济形势

（一）2016 年将成为 2009 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年

2016 年 7 月 16 日，美国国际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莫恒勇在《21 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16 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表示，预计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 3% 左右，将成为 2009 年以来增长最缓慢的一年。

从国家层面看，预计英国受到“脱欧”影响，2016 年下半年会进入轻度经济衰退阶段，2017 年预计负增长 0.3%；欧元区也会受英国“脱欧”影响，预计 2017 年经济增长 0.9%；英国“脱欧”对美国、日本的影响比较低，预计 2016 年美国经济增长 1.8%，日本这几年经济增长较低，预测会向上调，但调整幅度取决于安倍政府新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力度和效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对比较平稳，2016 年经济增长 4%，预计 2017 年会有所回升，主要是巴西、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有所缓解，比如，2016 年俄罗斯经济负增长 1.7%，2017 年会有小幅度的增长。

莫恒勇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相对比较缓慢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各种各样的冲击没有停歇。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阻力之一，来自对经济前景的诸多不确定性，比如日本大地震、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步伐、美国大选结果、英国欧盟成员国地位公投、欧元区面临的政治风险，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硬着陆的担心等。与过去的经济周期相比，这次全球固定资产投资的复苏非常缓慢。二是政策上的不确定性。政策上的不确定性来自市场对央行是否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应对潜在危机的担忧，以

及应对危机时政策有效性的顾虑。随着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预计财政政策会在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改革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实，发达国家央行已通过大量购买国债并将收益转给财政的方式支持财政政策。在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在经济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前，投资者将不得不长期面对远低于危机前的经济增速。在 2014 年，市场上几乎没有负收益的债券，而目前全球有价值 13 万亿美元债券是负收益的，比英国“脱欧”公投前多了 2 万亿美元。

（二）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2016 年 7 月 17 日，第 14 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幕，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超过 7000 名代表在为期 6 天的会议期间出席了一系列活动，就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话题展开讨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讲话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和全球贸易放缓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新难题，贸易保护主义、就业难等问题依然严峻。2016 年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开始实施的第一年，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呼吁世界各国深化合作，推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在贸易、投资、科技、金融等领域有所作为，让它们成为促进全人类繁荣的力量。

（三）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上升

2016 年 7 月 19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指出，英国“脱欧”导致的经济、政治和制度的不确定性，使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上升。这一意外事件在商业和消费者信心已经脆弱的环境下，造成了新一轮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活动回升将更为缓慢，预计 2016 年、2017 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 3.1%、3.4%，均较 2016 年 4 月的预测值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

IMF 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顾问莫里·奥伯斯费尔德表示，英国投票退出欧盟带来了麻烦。报告指出，目前仍很难对潜在影响做出量化评估。6 月 23 日的公投对英国和欧洲经济打击将最为严重，导致英国政权更迭。本已低迷乏力的全球经济增长将受到进一步损害，政策制定者为此必须加强银行体系建设，并落实有关计划，实施结构性改革。英国和欧盟的政策制定者肩负重要责任，应努力减少对欧洲和其他地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确定性。IMF 呼吁英国和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平稳、可预见地过渡到英国退出欧盟之后的新贸易和金融关系，尽可能保留英国与欧盟之间贸易带来的好处”。

IMF 预测，英国 2016 年经济增长 1.7%，比 4 月的预测值低 0.2 个百分点；2017 年

英国经济增速将减缓到 1.3%，比 4 月的预测值低 0.9 个百分点，是发达经济体中预测下调幅度最大的。欧元区 2016 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了 0.1 个百分点，升至 1.6%；2017 年的预测下调了 0.2 个百分点至 1.4%。如果没有发生英国“脱欧”事件，将维持 2016 年经济增长预测大致不变，因为欧元区的表现好于预期，抵消了美国第一季度增长弱于预期的负面因素。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弱于预期，因此将美国 2016 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到 2.2%，比 4 月的预测值低 0.2 个百分点，2017 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 2.5% 不变。英国“脱欧”可能影响到日本，因为日元升值将阻碍经济增长。IMF 将日本 2016 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3%，预计日本 2017 年经济增长 0.1%，比 4 月的预测值高 0.2 个百分点，因为提高消费税的措施被推迟。

因为一些大型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有所改善，IMF 原本还准备将 2017 年预测小幅上调 0.1 个百分点，但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依然存在差异，与 4 月的预测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不过，在新兴市场增长表现好转的同时，低收入国家的表现有所恶化。低收入国家 2016 年经济增长预测大幅下调，主要原因是尼日利亚经济收缩，南非、安哥拉和加蓬经济前景恶化。

发达经济体将继续面对显著的经济低迷和疲软的通胀前景，应当在近期为需求提供支持，同时实施结构性改革以重振中期增长，这仍然至关重要。IMF 敦促发达国家避免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并利用各种政策工具以发挥协同作用。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支持国内需求的措施，特别是在具备政策空间的债权国，这将有助于减轻全球失衡，促进全球经济更强劲的增长。

（四）全球经济虽然低迷，但却是前所未有的稳定

摩根大通全球经济主管 David Hensley 近日表示，虽然中国经济放缓、英国“脱欧”等因素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事实上，全球经济比 1970 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稳定。他统计了全球主要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折年率增速的标准差，发现一些大经济体（美国、日本）的经济增长波动比此前的水平略高一点，而其他经济体的增速波动都大幅减小。总体来说，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波动比 1970 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平缓。在排除个别经济体的影响后，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波动比以前小很多。

全球央行（日本央行、美联储、欧洲央行等）都开始根据海外的风险改变其货币政策，成为全球风险的管理家。此前，央行的政策目标都专注于国内的通胀目标。Hensley 表示，目前经济活动的程度低于央行的期望，所以央行比较关注各种风险。

（五）全球化大潮不会改变

2016年7月22日，IMF副总裁朱民表示，全球化进程正面临巨大挑战，但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当天，朱民在离任前的最后一场中文媒体见面会上表示，政治风险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英国“脱欧”、恐怖主义、移民所引发的民粹主义等问题，加剧了政治的不确定性，也引发了是否需要推进全球化的讨论。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和资本流动推动了经济繁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金融市场波动，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同时，如何平衡全球化带来的人口自由流动与社会经济稳定，也凸显了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但他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因为人类对价廉质优产品的需求不会改变，信息全球化的趋势也不可逆转。

朱民表示，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在推动贸易和创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目的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同时推动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结构性改革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目前来看，各国很有可能就这些努力达成共识。在中国的推动下，2016年的G20会议启动了全球金融治理框架改革，其中包括全球金融安全网、IMF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绿色金融、全球金融机制改革等议题。这些讨论对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将有深刻的、战略性的影响。

朱民是首位出任IMF副总裁职务的中国人，于2016年7月底任期结束后卸任。在任期内，他积极推动IMF关注增长与就业政策，还积极推动提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IMF的影响力。目前，中国在IMF的投票权较5年前强化了一倍，人民币顺利加入SDR货币篮子，IMF中国员工的比例较5年前翻了一番。

二、关于中国经济形势

（一）IMF再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2016年7月19日，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再度上调中国2016年GDP增长预期0.1个百分点至6.6%，2017年经济增长预测保持在6.2%不变。上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近期相关经济举措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开支和信贷增长，有助于改善增长前景。

IMF表示，中国近期的政策支持使经济前景有所改善。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5次下调基准贷款利率，财政政策也转为扩张性，基础设施支出回升，信贷增长加快。考虑到中国与英国的贸易和金融联系有限，英国“脱欧”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可能有限，2016年的预测值已经计入了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增速大约0.1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其结果仍然上调了0.1个百分点。

（二）人民币币值大致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

2016 年 7 月 27 日，IMF 发布《2016 年外部风险报告》。2016 年上半年人民币有所贬值，但 IMF 仍维持“人民币币值大致符合基本面”的判断。报告表示，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外部失衡已经大幅降低，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从 2007 年的峰值 10% 一路大幅下降。2015 年由于进口增速放缓，经常账户顺差有所扩大，占 GDP 的比重回升至 3%。IMF 研究部主任路易斯·库贝杜表示，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在未来有望下降，其中汇率政策及结构性改革将发挥重要作用。预计随着中国经济逐步降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国内消费需求进一步增长，中国贸易顺差在中期内将逐步降低，同时由于出国旅游的增长，服务贸易的逆差将进一步增加。针对 2015 年中国外汇储备出现下降的问题，IMF 研究部副主任古斯塔夫·阿德勒表示，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水平仍处于合理范围。同时，资本外流和储备水平已经开始稳定，外汇储备未来并无较大风险。

责任编辑：李 蕊

（上接第 99 页）

“精”于专业，“诚”于品德。一项好的研究成果决不仅仅是华丽的词藻、形式的逻辑和时尚的表述，而是精辟的见解，是对现实的领悟力、洞察力，更是一种境界、一种情怀，一种智慧，一种服务于公众的自觉态度。有感于上述。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艾 冰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7 月)				
世 界	3.4	3.1	3.1	3.4
发达国家	1.9	1.9	1.8	1.8
美 国	2.4	2.4	2.2	2.5
欧元区	0.9	1.5	1.6	1.4
日 本	0.0	0.4	0.3	0.1
发展中国家	4.6	4.0	4.1	4.6
印 度	7.3	7.5	7.4	7.4
俄罗斯	0.6	-3.7	-1.2	1.0
巴 西	0.1	-3.8	-3.3	0.5
世界银行(2016 年 6 月)				
世 界	2.6	2.4	2.4	2.8
发达国家	1.7	1.8	1.7	1.9
发展中国家	4.2	3.4	3.5	4.4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7 月)				
世 界	2.8	2.7	2.3	2.7
美 国	2.4	2.6	1.5	2.3
欧元区	0.9	1.6	1.5	1.2
日 本	-0.1	0.6	0.5	0.8
印 度	7.3	7.6	7.5	7.6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2014 年度数据为印度官方大幅上修后数据,而 2015 年及 2016 年数据系参照官方修订后数据的预测结果。(3)各经济体 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世 界	3.7	2.6	2.7	3.9
发达国家	3.6	3.8	2.6	3.9
发展中国家	3.9	0.6	2.9	3.9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为出口量增速和进口量增速的简单平均数。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6 年 7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7 月)				
发达国家	1.4	0.3	0.7	1.6
发展中国家	4.7	4.7	4.6	4.4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7 月)				
世 界	2.6	2.1	2.8	2.9
美 国	1.6	0.1	1.2	2.3
欧元区	0.4	0.0	0.3	1.3
日 本	2.7	0.8	-0.1	1.6
印 度	6.0	4.9	5.2	5.1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5 年		1.4	0.3	2.5
	6 月	1.4	0.5	2.4
	7 月	1.3	0.3	2.4
	8 月	1.3	0.2	2.7
	9 月	1.5	0.1	2.6
	10 月	1.5	0.2	2.2
	11 月	1.5	0.3	2.3
	12 月	1.5	0.3	2.8
2016 年				
	1 月	1.6	0.6	2.8
	2 月	1.4	0.3	3.0
	3 月	1.3	0.4	2.8
	4 月	1.4	0.3	2.8
	5 月	1.5	0.3	2.7
	6 月	1.8	0.0	3.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5 年		-0.5	-3.3	3.8			
	7 月	1.9	0.9	3.3	50.8	51.3	51.0
	8 月	2.5	1.5	4.7	50.4	50.6	51.0
	9 月	1.9	0.9	2.8	50.4	50.5	50.9
	10 月	2.5	1.1	3.4	51.1	51.6	51.7
	11 月	1.3	0.5	2.9	51.0	52.2	51.2
	12 月	0.6	-0.8	2.9	50.7	51.5	50.8
2016 年							
	1 月	1.9	0.7	3.2	50.8	51.4	51.4
	2 月	1.2	-0.5	3.5	50.0	50.3	50.4
	3 月	1.2	-0.7	3.9	50.6	51.4	51.4
	4 月	1.9	0.3	3.3	50.1	50.4	50.3
	5 月	1.2	-0.2	3.9	50.0	50.0	50.2
	6 月				50.4	50.4	50.7
	7 月				51.0	52.1	51.4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9	-0.9
	3 季度	5.0	3.7	2.5
	4 季度	2.3	4.6	-0.4
2015 年		2.6	3.2	1.8
	1 季度	2.0	2.4	2.6
	2 季度	2.6	2.9	3.2
	3 季度	2.0	2.7	1.9
	4 季度	0.9	2.3	1.0
2016 年				
	1 季度	0.8	1.6	1.6
	2 季度	1.1	4.4	-1.5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5.3	4.3	4.4
	3 季度	7.4	2.1	-1.2
	4 季度	1.3	4.5	11.2
2015 年		4.0	0.1	4.6
	1 季度	3.7	-5.8	5.6
	2 季度	4.3	2.9	2.9
	3 季度	5.7	-2.8	1.1
	4 季度	-0.2	-2.7	0.7
2016 年				
	1 季度	-0.9	-0.7	-0.6
	2 季度	-2.5	1.2	0.3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9	-0.9
	3 季度	2.9	3.2	-0.3
	4 季度	2.5	3.5	0.3
2015 年		2.6	3.2	1.8
	1 季度	3.3	3.6	1.2
	2 季度	3.0	3.4	2.0
	3 季度	2.2	3.1	1.8
	4 季度	1.9	2.6	2.2
2016 年				
	1 季度	1.6	2.4	1.9
	2 季度	1.2	2.7	0.7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月份		(%)	(%)		(%)	(%)	
2014 年		5.5	4.3	4.4	2015 年	22236.2		-5.1	27633.7		-3.1	-5397.6
	3 季度	6.6	4.8	3.7	6 月	1869.1	-0.1	-4.4	2331.8	1.2	-2.0	-462.7
	4 季度	5.3	3.1	6.1	7 月	1872.0	0.2	-4.9	2309.1	-1.0	-3.1	-437.1
2015 年		4.0	0.1	4.6	8 月	1828.1	-2.3	-7.3	2333.5	1.1	-2.2	-505.4
	1 季度	4.9	2.2	6.3	9 月	1852.9	1.4	-5.0	2296.1	-1.6	-3.6	-443.2
	2 季度	4.2	0.8	4.5	10 月	1831.5	-1.2	-7.4	2286.3	-0.4	-4.9	-454.8
	3 季度	3.8	-0.4	5.1	11 月	1809.0	-1.2	-7.8	2244.7	-1.8	-5.0	-435.7
2016 年	4 季度	3.4	-2.2	2.5	12 月	1802.8	-0.3	-7.5	2249.8	0.2	-6.5	-447.0
					2016 年							
	1 季度	2.2	-0.9	1.0	1 月	1797.7	-1.8	-6.4	2220.8	-1.1	-5.1	-423.1
	2 季度	0.5	-1.3	0.4	2 月	1821.6	1.3	-4.1	2261.9	1.8	0.0	-440.3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3 月	1801.7	-1.1	-5.4	2157.1	-4.6	-9.6	-355.4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4 月	1826.7	1.4	-4.7	2200.5	2.0	-5.4	-373.8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 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 比 折 年 率	同 比			
2015 年		0.6		5.3	290.7	
	7 月			5.3	27.7	
	8 月			5.1	15.0	
	9 月	2.0	0.6	5.1	14.9	
	10 月			5.0	29.5	
	11 月			5.0	28.0	
	12 月	-1.7	0.6	5.0	27.1	
2016 年						
	1 月			4.9	16.8	
	2 月			4.9	23.3	
	3 月	-0.6	0.7	5.0	18.6	
	4 月			5.0	14.4	
	5 月			4.7	2.4	
	6 月			4.9	29.2	
	7 月			4.9	25.5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	(%)		(%)	(%)	
2015 年	22236.2		-5.1	27633.7		-3.1	-5397.6
6 月	1869.1	-0.1	-4.4	2331.8	1.2	-2.0	-462.7
7 月	1872.0	0.2	-4.9	2309.1	-1.0	-3.1	-437.1
8 月	1828.1	-2.3	-7.3	2333.5	1.1	-2.2	-505.4
9 月	1852.9	1.4	-5.0	2296.1	-1.6	-3.6	-443.2
10 月	1831.5	-1.2	-7.4	2286.3	-0.4	-4.9	-454.8
11 月	1809.0	-1.2	-7.8	2244.7	-1.8	-5.0	-435.7
12 月	1802.8	-0.3	-7.5	2249.8	0.2	-6.5	-447.0
2016 年							
1 月	1797.7	-1.8	-6.4	2220.8	-1.1	-5.1	-423.1
2 月	1821.6	1.3	-4.1	2261.9	1.8	0.0	-440.3
3 月	1801.7	-1.1	-5.4	2157.1	-4.6	-9.6	-355.4
4 月	1826.7	1.4	-4.7	2200.5	2.0	-5.4	-373.8
5 月	1825.4	-0.1	-4.1	2235.0	1.6	-3.1	-409.6
6 月	1831.5	0.3	-3.8	2276.6	1.9	-2.4	-445.1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1716.0		2922.8		-1206.8	
	2 季度	748.6		734.6		14.0	
	3 季度	1083.4		1001.7		81.6	
	4 季度	774.2		619.7		154.5	
2015 年		3484.0		3031.8		452.3	
	1 季度	1981.1		932.3		1048.8	
	2 季度	809.4		864.3		-54.9	
	3 季度	429.8		502.5		-72.7	
	4 季度	263.7		732.6		-468.9	
2016 年							
	1 季度	756.5		916.5		-160.0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0.9	0.7	0.9
	3 季度	0.3	0.4	0.3
	4 季度	0.4	0.6	0.1
		1.7	1.7	1.3
2015 年	1 季度	0.6	0.4	0.5
	2 季度	0.4	0.3	0.3
	3 季度	0.3	0.5	0.3
	4 季度	0.4	0.3	0.5
2016 年	1 季度	0.6	0.6	0.4
	2 季度	0.3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4.1	4.5
	2 季度	- 0.4	1.0	1.1
	3 季度	0.5	1.6	1.5
	4 季度	0.5	1.2	1.1
2015 年		2.9	5.3	6.1
	1 季度	1.5	1.5	2.3
	2 季度	0.1	1.6	0.9
	3 季度	0.5	0.4	1.3
2016 年	4 季度	1.4	0.7	1.4
	1 季度	0.8	0.4	0.7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5 年			0.5	181.2	10.9
	6 月	0.0	0.7	61.1	11.0
	7 月				10.8
	8 月				10.7
	9 月	0.0	0.5	48.7	10.6
	10 月				10.6
	11 月				10.5
	12 月	0.1	0.7	48.9	10.4
2016 年	1 月				10.4
	2 月				10.3
	3 月	0.2	0.2	52.1	10.2
	4 月				10.2
	5 月				10.1
	6 月				10.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0.9	0.7	0.9
	3 季度	0.8	0.8	0.9
	4 季度	1.0	1.2	0.8
2015 年		1.7	1.7	1.3
	1 季度	1.3	1.6	1.1
	2 季度	1.6	1.7	1.2
	3 季度	1.6	1.8	1.2
2016 年	4 季度	1.7	1.6	1.6
	1 季度	1.7	1.7	1.5
	2 季度	1.6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4.1	4.5
	2 季度	1.2	3.4	4.2
	3 季度	0.8	4.6	4.5
	4 季度	0.9	4.7	5.0
2015 年		2.9	5.3	6.1
	1 季度	2.0	5.4	6.2
	2 季度	2.6	6.1	5.9
	3 季度	2.6	4.8	5.6
2016 年	4 季度	3.6	4.2	5.9.
	1 季度	2.9	3.1	4.3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月份		(%)	(%)		(%)	(%)	口 额
2015 年	20430		5.3	17964		2.2	2466
	6 月	1706	- 1.8	12.6	1510	- 1	6.8
	7 月	1710	0.2	7.0	1495	- 1.0	0.6
	8 月	1657	- 3.1	5.7	1475	- 1	2.6
	9 月	1659	0.1	0.8	1474	- 0.1	- 0.6
	10 月	1690	1.9	0.5	1488	1	- 0.7
	11 月	1689	- 0.1	6.4	1468	- 1.3	4.3
	12 月	1713	1.4	4.1	1477	1	3.3
2016 年	1 月	1674	- 2.3	- 2.1	1470	- 1	- 0.9
	2 月	1670	- 0.3	1.2	1470	0.0	2.0
	3 月	1681	0.7	- 2.2	1434	- 2	- 8.1
	4 月	1687	0.4	- 0.9	1434	0.0	- 5.3
	5 月	1658	- 1.7	2.0	1412	- 2	- 2.2
	6 月	1667	0.5	- 2.2	1433	1.5	- 5.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亿欧元					单位: %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5 年		1718.0	1437.0	236.0	2014 年		0.0	-0.9	0.1		
	6 月	161.0	172.0	-11.0		3 季度	-1.5	-2.7	-0.2		
	7 月	-72.0	230.0	-302.0		4 季度	-1.0	-2.1	0.3		
	8 月	-28.0	3.0	-32.0		2015 年		0.5	-1.2	1.2	
	9 月	597.0	298.0	299.0	1 季度		-1.0	-4.1	0.6		
	10 月	426.0	405.0	21.0	2 季度		0.7	0.1	1.3		
	11 月	-450.0	-490.0	-4.0	3 季度		1.8	0.4	1.2		
	12 月	23.0	75.0	-52.0	4 季度	0.7	-1.0	1.6			
2016 年	1 月	-99.0	66.0	-165.0	2016 年	1 季度	0.2	-0.3	2.2		
	2 月	220.0	665.0	-445.0		2 季度	0.6	0.4	2.2		
	3 月	121.0	259.0	-138.0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4 月	389.3	446.2	-56.9	单位: %						
	5 月	458.6	558.6	-100.0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6 月	-13.3	-10.9	-2.4	2014 年		1.3	8.3	7.2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3 季度	-2.1	7.5	5.1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4 季度	-3.1	11.2	3.6	
四、日本经济					2015 年		0.0	2.8	0.3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1 季度	-3.8	7.4	-0.6		
单位: %						2 季度	0.7	1.9	0.8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3 季度	2.4	3.1	1.5		
2014 年		0.0	-0.9	0.1		4 季度	1.8	-0.9	-0.5		
	3 季度	-0.7	0.0	0.3	2016 年	1 季度	-0.4	-2.5	-2.0		
	4 季度	0.5	0.6	0.3		2 季度	0.7	-0.1	-0.6		
2015 年		0.5	-1.2	1.2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1 季度	1.2	0.1	0.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2 季度	-0.4	-0.7	0.3	单位: %						
	3 季度	0.5	0.5	0.2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4 季度	-0.4	-0.8	0.8	2015 年		-1.4	1.80	3.4		
2016 年	1 季度	0.5	0.7	0.9		6 月	1.4	1.79	3.4		
	2 季度	0.0	0.2	0.2		7 月	-1.8	1.82	3.3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8 月	-2.9	1.84	3.4		
单位: %						9 月	-2.6	1.83	3.4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10 月	0.5	1.86	3.1		
2014 年		1.3	8.3	7.2		11 月	0.1	1.90	3.3		
	3 季度	-1.1	1.5	1.0		12 月	-2.8	1.90	3.3		
	4 季度	0.1	3.4	1.1	2016 年	1 月	-4.2	2.07	3.2		
2015 年		0.0	2.8	0.3		2 月	-1.2	1.9	3.3		
	1 季度	1.9	1.7	1.1		3 月	-1.7	1.90	3.2		
	2 季度	-0.1	-4.2	-1.8		4 月	-3.1	2.06	3.2		
	3 季度	0.2	2.6	1.2		5 月	0.7	2.09	3.2		
	4 季度	0.0	-0.9	-1.1		6 月		2.01	3.1		
2016 年	1 季度	-0.5	0.1	-0.5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2 季度	0.9	-1.5	-0.1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年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5 年	756322		3.5	784676		-8.7	-28353
7 月	63717	-0.2	7.6	66861	0.3	-3.2	-3143
8 月	63124	-0.9	3.1	65938	-1.4	-3.1	-2813
9 月	62106	-1.6	0.6	64937	-1.5	-11.1	-2831
10 月	62215	0.2	-2.1	63337	-2.5	-13.4	-1122
11 月	62428	0.3	-3.3	61435	-3.0	-10.2	993
12 月	59795	-4.2	-8.0	59221	-3.6	-18.0	574
2016 年							
1 月	59950	0.3	-12.9	58709	-0.9	-18.0	1241
2 月	58072	-3.1	-4.0	56480	-3.8	-14.2	1592
3 月	58086	0.0	-6.8	55393	-1.9	-14.9	2693
4 月	57315	-1.3	-10.1	53207	-3.9	-23.3	4108
5 月	56446	-1.5	-11.3	53761	1.0	-13.8	2684
6 月	57370	1.6	-7.4	54004	0.5	-18.8	3366
7 月	56319	-1.8	-14.0	53143	-1.6	-24.7	3176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510	159884	-160394
	6 月	-433	6165	-6598
	7 月	-4463	12429	-16892
	8 月	-837	13842	-14679
	9 月	-1884	11442	-13326
	10 月	833	16580	-15747
	11 月	1490	13146	-11656
	12 月	1490	14725	-13235
2016 年				
	1 月	177	10377	-10200
	2 月	3154	15885	-12731
	3 月	9592	20913	-11321
	4 月	-3130	7218	-10348
	5 月	3574	9330	-5756
	6 月	12596	15971	-3375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4 年		2.5	2.9	1.5	0.1	7.3	0.6
	3 季度	2.1	2.8	1.6	-1.1	8.3	0.9
	4 季度	3.4	2.8	1.4	-0.7	6.6	0.4
2015 年		1.1	2.3	1.2	-3.8	7.6	-3.7
	1 季度	-1.0	2.9	2.2	-2.0	7.5	-2.8
	2 季度	-0.5	2.3	1.3	-2.9	7.5	-4.5
	3 季度	2.2	2.0	1.0	-4.5	7.6	-3.7
	4 季度	0.5	1.8	0.5	-5.9	7.2	-3.8
2016 年							
	1 季度	2.4	2.0	-0.2	-5.4	7.9	-1.2
	2 季度		2.2				-0.6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4 年		3.3	2.1	2.6	3.8	6.0	5.0
	3 季度	3.3	2.3	3.2	4.3	5.6	4.9
	4 季度	2.7	2.6	2.5	3.6	5.7	5.0
2015 年		2.6	2.5	2.4	0.6	5.0	4.8
	1 季度	2.4	2.6	2.4	4.0	5.7	4.7
	2 季度	2.2	2.3	3.1	0.6	4.9	4.7
	3 季度	2.8	2.7	2.3	-0.8	4.7	4.7
	4 季度	3.1	2.4	1.9	-0.9	4.5	5.0
2016 年							
	1 季度	2.8	2.6	0.8	-0.7	4.2	4.9
	2 季度	3.1	2.5	1.7	0.7	4.0	5.2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5 年		6.9	5.4	6.8	5.6	25.4
	7 月	6.8	5.4	8.6	5.3	
	8 月	7.0	5.3	8.7	5.3	
	9 月	7.1	5.2	8.9	5.2	25.5
	10 月	7.0	5.1	8.9	5.5	
	11 月	7.1	5.1	9.0	5.8	
	12 月	7.1	5.1	9.0	5.8	24.5
2016 年						
	1 月	7.2	5.1	9.5	5.8	
	2 月	7.3	5.1	10.2	5.8	
	3 月	7.1	5.1	10.9	6.0	26.7
	4 月	7.1	5.0	11.2	5.9	
	5 月	6.9	4.9	11.2	5.6	
	6 月	6.8	4.9	11.3	5.4	26.6
	7 月	6.9			5.3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5 年		3.6	4.4	3.3	3.8	3.1
	7 月	3.7	4.7	3.3	3.7	3.2
	8 月	3.6	4.7	3.3	3.7	3.2
	9 月	3.5	4.5	3.3	3.8	3.2
	10 月	3.4	4.6	3.3	3.8	3.1
	11 月	3.5	4.0	3.3	3.8	3.2
	12 月	3.5	4.0	3.3	3.9	3.4
2016 年						
	1 月	3.5	4.2	3.3	3.9	3.4
	2 月	4.1	4.2	3.3	3.9	3.4
	3 月	3.8	3.7	3.4	3.9	3.5
	4 月	3.7	3.8	3.4	4.0	3.5
	5 月	3.7	4.0	3.4	4.0	3.4
	6 月	3.6	3.9	3.4	4.0	3.4
	7 月	3.6		3.4	4.0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4084.8	4192.5	-107.7	4596.6	6258.3	-1661.7
6 月	372.1	374.2	-2.1	401.7	546.9	-145.1
7 月	339.8	349.8	-10.0	380.1	546.9	-166.8
8 月	335.8	349.7	-13.9	363.7	472.8	-109.1
9 月	345.8	348.0	-2.2	393.0	534.7	-141.8
10 月	336.1	353.2	-17.1	379.9	374.7	5.3
11 月	322.2	334.1	-11.9	377.3	532.6	-155.3
12 月	334.9	317.7	17.2	405.1	468.0	-62.9
2016 年						
1 月	307.8	392.0	-84.3	315.7	450.9	-135.2
2 月	300.8	311.4	-10.7	343.2	497.3	-154.1
3 月	328.9	345.0	-16.1	349.8	566.5	-216.7
4 月	312.6	342.9	-30.3	350.4	581.1	-230.7
5 月	313.7	342.7	-29.0	338.5	526.2	-187.7
6 月	331.1	354.9	-23.8	354.2	572.9	-218.7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81.5	85.7	-4.1	1911.3	1788.0	123.4
7 月	74.2	75.6	-1.4	185.3	167.6	17.7
8 月	67.5	75.5	-8.0	154.9	133.1	21.8
9 月	66.9	68.4	-1.5	161.5	137.6	23.9
10 月	63.0	79.5	-16.5	160.5	146.3	14.2
11 月	66.0	65.8	0.1	138.1	126.1	12.0
12 月	58.5	53.7	4.7	167.8	105.4	62.4
2016 年						
1 月	42.6	54.5	-11.9	112.5	103.2	9.2
2 月	57.3	58.0	-0.7	133.5	103.0	30.4
3 月	61.7	60.2	1.6	159.9	115.6	44.4
4 月	62.7	62.8	-0.1	153.7	105.1	48.6
5 月	68.0	56.0	11.9	175.7	111.3	64.4
6 月	69.9	61.6	8.3	167.4	127.7	39.7
7 月				163.3	117.5	45.8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2666.6	3717.7	-1051.1	3403.5	1940.9	1462.6
7 月	232.0	361.2	-129.2	276.6	168.6	107.9
8 月	223.0	337.2	-114.2	253.1	163.5	89.6
9 月	218.0	322.8	-104.9	263.4	168.3	95.1
10 月	214.3	309.4	-95.2	269.6	169.1	100.5
11 月	195.3	297.0	-101.7	254.0	164.6	89.4
12 月	225.5	340.8	-115.3	287.5	174.4	113.1
2016 年						
1 月	211.0	287.6	-76.6	170.8	98.4	72.4
2 月	208.1	272.7	-64.6	200.8	128.9	72.0
3 月	227.9	270.0	-42.0	232.6	153.3	79.3
4 月	206.5	254.1	-47.7	218.6	151.1	67.5
5 月	221.7	284.4	-62.7	219.8	144.5	75.3
6 月	225.7	306.9	-81.2	241.1	160.0	81.1
7 月	216.9	294.5	-77.6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5267.6	4365.0	902.6	3807.7	4052.8	-245.1
7 月	466.1	388.5	77.6	327.0	359.6	-32.7
8 月	393.3	349.8	43.5	310.1	346.9	-36.8
9 月	435.1	345.6	89.5	321.9	345.3	-23.5
10 月	434.7	367.8	66.9	341.0	364.9	-23.9
11 月	444.0	341.0	103.0	310.2	333.9	-23.7
12 月	426.0	355.0	71.0	311.7	326.8	-15.1
2016 年						
1 月	367.6	314.0	53.6	246.9	279.8	-32.9
2 月	364.0	290.0	74.0	289.7	297.5	-7.8
3 月	430.0	332.0	98.0	314.9	314.1	0.9
4 月	410.0	322.0	88.0	304.2	325.0	-20.8
5 月	398.0	328.0	70.0	313.3	318.5	-5.3
6 月	453.0	338.0	115.0	319.4	324.7	-5.2
7 月	410.0	333.0	77.0	297.7	316.0	-18.3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5106.0	5594.3	-488.3	2804.8	2289.2	515.6
7 月	453.2	475.9	-22.8	235.5	199.1	36.3
8 月	426.6	456.0	-29.4	239.3	199.6	39.7
9 月	453.5	492.6	-39.1	225.4	173.1	52.3
10 月	450.1	485.9	-35.8	239.4	178.1	61.3
11 月	454.6	480.9	-26.4	221.3	193.8	27.5
12 月	468.8	500.8	-32.0	220.6	178.9	41.7
2016 年						
1 月	406.4	425.0	-18.6	222.0	186.9	35.1
2 月	290.2	332.2	-42.1	177.8	136.3	41.5
3 月	400.8	429.9	-29.1	227.2	182.2	45.0
4 月	413.6	417.3	-3.6	222.5	174.5	48.0
5 月	436.5	436.2	0.3	235.4	200.4	35.0
6 月	433.9	470.5	-36.6	228.9	193.1	35.8
7 月				241.2	205.1	36.1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199.9	176.0	23.9	1503.4	1427.3	76.1
7 月	166.3	160.1	6.2	114.7	100.8	13.9
8 月	163.8	138.8	25.0	127.3	124.0	3.3
9 月	162.7	140.3	22.5	125.9	115.6	10.3
10 月	177.6	149.1	28.5	121.2	111.1	10.1
11 月	157.0	133.2	23.8	111.1	115.2	-4.1
12 月	159.5	140.3	19.3	119.2	120.8	-1.6
2016 年						
1 月	142.3	129.9	12.4	104.8	104.7	0.1
2 月	135.5	117.9	17.6	113.1	101.8	11.4
3 月	163.3	135.9	27.5	118.1	113.0	5.1
4 月	157.1	133.9	23.2	114.8	108.1	6.6
5 月	148.1	140.0	8.1	115.1	111.4	3.8
6 月	162.6	149.1	13.5	129.7	121.0	8.8
7 月				95.1	89.2	6.0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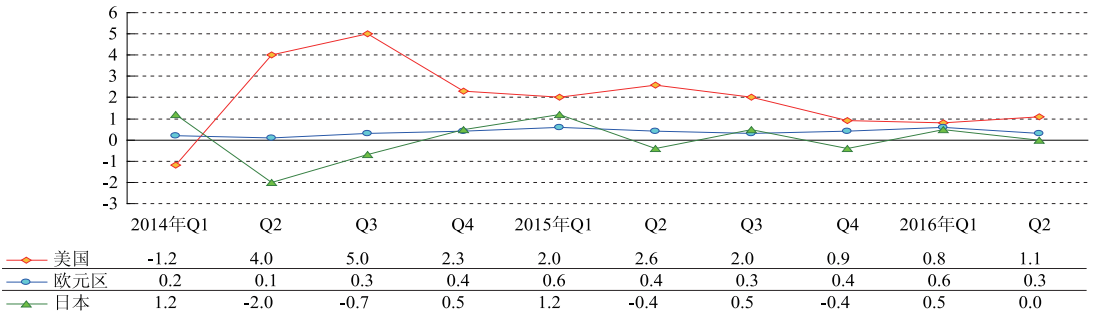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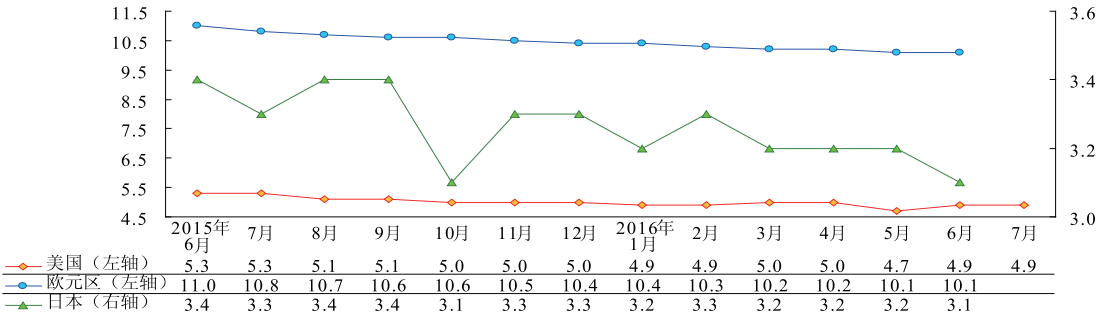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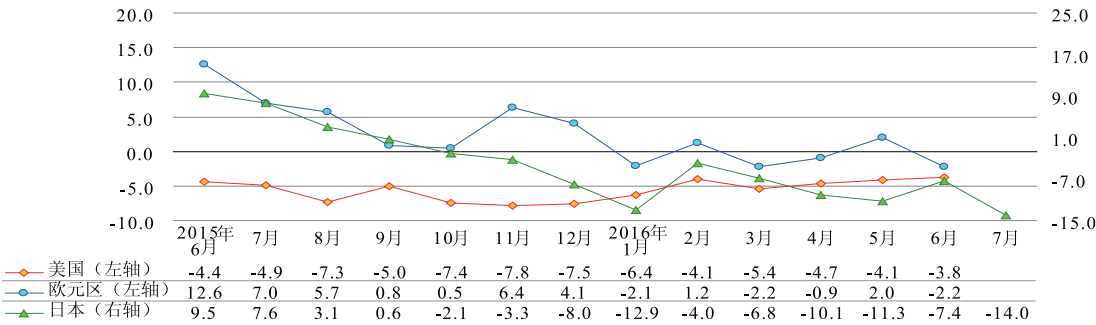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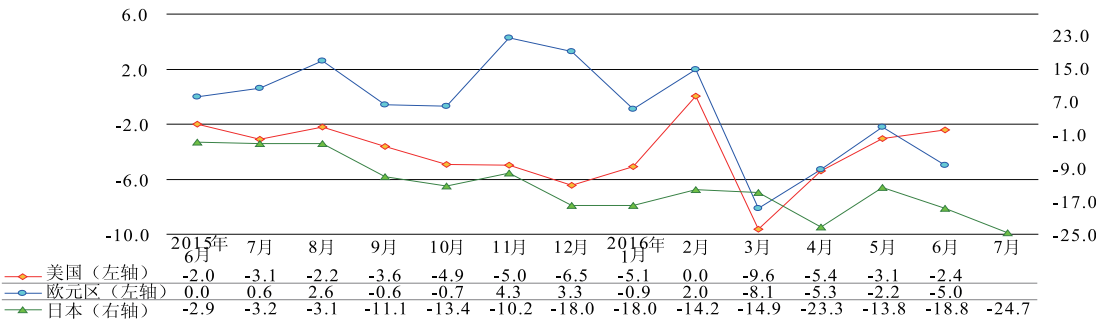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陈璇璇

ABSTRACTS

(1)Wisdom Made in China and the creation of China

Lu Yongxiang

Non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wer is not a manufacturing powe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wisdom made and China’s creation is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 not only for building a manufacturing power, but also for building a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we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s the direction for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isdom made will be a strong boost for China’s creation. To accelerate the creation of China must require strengthening basic and frontier researc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originality, and break through core technology; promoting creative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design ability; constructing the support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 China’s creation; constructing culture and reputation of China’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2)New thinking and new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y

Zhang Dawei and Chen Wenling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 – border e – commerce and 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rade is the new strategy of world’s major powers. China should seize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of the cross – border e – commerce to become E international trade, seize the initiative of China leading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modern circulation and rule – design, shape the core competition of china through improving the modern circulation ability. The recent issuance of electronic commerce policy is to us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thinking and traditional management to manage the new economy and new format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adapt to and lead the trend of the times with the new thinking and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deeply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of the new policy for cross – border e – commerce, carry out systematical correction in a timely manner,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al formats and new mode.

(3)Promoting innovation design and realizing the leap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ng Xiaohong

Innovative design has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leading an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ra of network information, and is also a major historical leap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desig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features of innovative design,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innovative design,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innovation design of major countries, analyz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novative design, major achievements and main problems during the “12th Five – Year” period, and put forward the main ideas of promoting

China's innovation design. The main ideas include the efforts to enhance the innovative design ability in key industries, bringing into play the innovative design in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vigorously heightening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implementing innovative design talent strateg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design common key technologies and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strengthening the fiscal and financial policy support, and creating good innovative desig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4)To construct the new coordination and interaction pattern of “four regions” and “three strategies”

Gao Guoli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initiated overall strateg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four areas” in succession of implementing the leading eastern part,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ing the northeast and central,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well – off society in China; at the meantime there have been a series of new problems emerging from different areas, we should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overall strateg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China has propo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 Tianjin – Hebei, constituting the “ three strategies”. Currently the related work goes smoothly, China should steadily move forward and prevent exist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of “four areas” and “three strategies”, grasp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rules of coordination and interaction, clarify priorities and measures of coordinated interaction,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synchronizat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well – off society.

(5)The ideas and tasks of China’s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Jiang Jiang and Han Qi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novation ability strengthened rapidly, innovative concept deeply rooted, and deployment of innovation run throughout every area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overall, influential innovation is still lacking, and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main developed countries is still large, and innovation – dri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long way to go.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make top – level design for the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clarify the objective and task deployment of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five years, improve the market –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for the incentive and innovation, strength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led by enterprises,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nnovation – driven talent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innovation – 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

(6)Evaluation report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sian economies in 2015

Asian competitiveness assessment task group

In order to find and evaluate the competitiveness gap among major Asian economies, to ultimately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sian economies, society, government agencies,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developed the Asia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According to this index, the ranking of competitiveness of 2015 Asia and the Pacific economies is as follows: Singapore, Hongkong,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hinese rank 1 – 4; followed by Australia, New Zealand, Japan and Israel, ranked 5 – 8; and a comprehensive ranking of China annual ranking remains unchanged in comparison to last year, still ranked in ninth. Overall, the ranking of Asian economies maintains stable.

(7)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China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G20

Li Luosha

The emerging global problems and the existing shortage in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severely test the effectiveness and fairness of the current global governance, and force the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By including the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G20 makes the platform more representative, providing a relatively equal mechanism and platform for the world’s major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 making and jointly promote world economic stability and growth. However, However, as a new kind of new multilateral global governance model, G20 is still missing some aspects of the mechanism. This article proposes G20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ssue – setting mechanism, the characteristic decision – making mechanism, inclus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secretariat.

(8) To Innovate economic theory and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Economic Forum together with Chen Wenling work conference was held in Beijing, focused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wo to one hundred years strategic objectives proposed by the China’s Communist Party, discussing extensively and in – depth exchanging China thoughts, China theories, China schemes and Chinese issues in order to innovate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deas and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road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new time. At the same time, the forum takes the opportunity of issuing Professor Chen Wenling’s publication to explore the realm and accomplishment scholars should have, the economist’s mission and undertaking and so on. No matter whether on economic theory or on the aspects of scholar self – cultivation, this forum has formed a series of enlightening views and opinions.

(9) National planning and people’s livelihood——The MemorialOf Professor Huang Guoxiong and a review on the Symposium o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ractice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 China

Hong Tao

Professor Huang Guoxiong, a famous economist, died of illness on May 16, 2016. 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circulation forum thirty”, China Commercial Economic Association, sponsored by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 Beijing daily”, the national planning and people’s Livelihood——Professor Huang Guoxiong Memorial was held on June 19th morning in Beijing, with attendees from the domestic commodity circulation industry as well as Professor Huang’s students and friends. Professor Huang is a leading authority of commercial economy theory, and his idea of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is the basic industry” shocked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and has been included into related documents,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in china.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memorial of Professor Huang expressed they will inherit his spirit, and continue to striv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irculation industry.

Editor:Huang Yongfu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 8 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